

薛焯炳 王金兰 主编
常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

红色云溪

——常州白云溪革命故事选编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赵忠和

编委会副主任：朱力工 薛焕炳 柯善学 管黎芳
朱可菲

主 编：薛焕炳 王金兰

编委会成员：

屠 江 江莉倩 徐嘉南 尤维萍 张戡炜 张浩典
范炎培 金明德 王祥元 刘鸿军 赵 欢 周 星
王伦娣 彭 悦

出 品：常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州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序



◇ 赵忠和

在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回信，对少年儿童党史学习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说：“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强调了学习英雄模范人物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

以常州的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常州市关工委一贯的做法。常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英雄模范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以及在党的领导下为常州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一直是常州市关工委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乡土教材”，特别是“常州三杰”，近年来已经成为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教材”。

《红色云溪》就是为常州广大青少年编写的一本以“白云溪”

革命英雄人物故事为主的“补充教材”。比如《云溪瞿氏四兄弟》，对我们了解瞿秋白的家世，理解瞿秋白的人生道路、革命精神，以及他在家庭中的影响，会有很好的帮助。

历史上的白云溪，包括顾塘河（今前北岸、小营前马路沿线）与白云溪两岸，面积大约两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云溪之秀，甲于郡中；水木清华，为一郡名胜。云溪两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明清时期形成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大多居于白云溪及其周边地区。人们仰慕的苏东坡、杨龟山、邹道乡、王安石、李余庆、庄存与、恽南田、洪亮吉、赵翼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也与这一河流结下不解之缘。

白云溪不仅蕴育了一大批历史文化俊彦，同样，也造就了一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红色英杰，他们当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与张太雷，有中共早期党员吴静焘、李文，有中共常州地方组织领导人恽逸群，常州工人运动先驱王寿生，东北抗联英雄冯仲云、七君子女杰史良等。

《红色云溪》的编撰者们，为把这些红色英杰的故事讲给青少年听，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对常州下一代的无限关爱。希望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同志们，在使用这本书时，和青少年的成长实际相结合，引导青少年以革命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决心，把自己的人生之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连接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贡献！

目 录



云溪瞿氏四兄弟	薛焕炳 / 001
“衔春之燕”瞿秋白	金明德 / 017
瞿秋白的故事	周 星 / 034
张太雷学生时代的故事	周 星 / 046
张太雷家风传承的故事	王金兰 / 063
柳直荀云溪机智脱险	薛焕炳 / 072
王若飞在常州	王金兰 薛焕炳 / 081
苏区女杰吴静焘	薛焕炳 / 092
李文、恽雨堂热血洒龙华	薛焕炳 / 103
王寿生匹马救工友	马 夫 / 109
恽长安变卖田产办中学	王祥元 / 118
常州中学三俊领导宜兴秋收起义	张浩典 / 127
白云溪哺育姚依林	马 夫 / 136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地委的工作	王祥元 /143
抗联名将冯仲云	范炎培 /165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范炎培 /179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冯铨	范炎培 /200
“女中豪杰”史良的故事	金明德 /209

附录：辛亥英杰

“惜阴老人”赵凤昌	王金兰 /227
“儒文侠武”的庄蕴宽	思 与 /238
屠寄：新思想的传播者	张浩典 /249
孟森：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段国强 王金兰 /258
陈范与上海《苏报》	王金兰 /268
报坛女杰陈撷芬	思 与 /278
民主斗士何海樵的故事	王金兰 /287
屠元博倡导革命	张浩典 /297

云溪瞿氏四兄弟

○ 薛焕炳

白云溪庙沿河畔有一座祠堂，名叫城西瞿氏大宗祠。祠堂坐北朝南，前后四进，东偏有数间厢房，厢房是给看祠堂人居住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瞿氏宗祠搬来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也姓瞿，主人叫瞿世玮，妻子叫金璇，他们带上家中老人与两个孩子，就居住在祠堂的厢房里。孩子一个是瞿秋白，一个是他的妹妹瞿轶群，这年秋白才4岁，轶群3岁。

瞿世玮与金璇怎么会拖儿带女住进城西宗祠里？这要从他们的家史说起。

常州城西瞿氏源于宜兴太湖之滨中准渎的瞿家村，元代至元末年（1294），瞿保三（字来苏）为避张士诚之乱，由苏州浒墅关迁居宜兴太湖之滨中准渎（今宜兴新庄镇中准渎



瞿氏宗祠旧貌

村)。明代成化三年（1467），保三曾孙瞿兰（字斯馨）来常做生意，由宜兴中准渎迁居郡城西仓桥，为迁常一世祖，至今已有640余年。瞿兰子孙继承祖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并在西仓桥周边建仓储千间，人称“瞿半城”。瞿秋白是瞿兰的十六世孙。

城西瞿氏在明清两朝为常州望族，簪缨世家。乾隆年间，迁常十一世孙瞿曾楫撰文夸耀自己的家族说：“我家自胜国至今，秀才相继，或及身通显，或子孙登榜，叠荷恩荣，自三世祖以来，至今奕奕缙绅，蝉联八代。”《瞿氏宗谱·逸事纪略》也称：“晋陵瞿氏，明季巨富，号瞿半城。西郊有覆街屋，至今犹称瞿家棚（今西仓桥一带），武进县之仓，



20世纪80年代，市委领导出席瞿秋白纪念馆开馆仪式

瞿氏之仓也。”瞿曾说他们瞿家，“奕奕缙绅，蝉联八代”，《逸事纪略》称他们瞿家“明季巨富，号瞿半城”，

甚至将武进西仓称之瞿氏之仓，可见当年瞿氏之盛。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城西瞿氏已富过了八代，到了（瞿秋白父亲）瞿世玮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全家寄

居青果巷八桂

堂，依靠在湖

北做官的叔父

瞿赓甫给济，

维持生计。

1899年1月

29日，瞿秋

白出生在八桂



瞿秋白故居



瞿秋白诞生于青果巷八桂堂内的天香楼

堂后的天香楼。

瞿赓甫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历任宜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在湖北为官30余年，曾被赏头品顶戴，三次赴京

师陛见皇上。但他也是常州瞿氏家族中的最后一位官吏。

1903年7月，在湖北做官多年的叔父瞿赓甫去世，家眷带着灵柩回到常州住进八桂堂。瞿世玮只得与母亲庄氏、妻子金璇和年幼的秋白、云白从八桂堂搬出，开始暂住在一河之隔的乌衣桥，后来寓居城西织机坊星聚堂秋白祖母家，最后落脚城西瞿氏宗祠长住，在浙江做官的瞿世玮哥哥瞿世琥常常寄钱，给济秋白全家。

金璇是家里的一家之主，她觉得丈夫正值壮年，应该出去做点事，以维持家里生计。她在征得大哥瞿世琥同意之后，于1913年秋天，把母亲庄氏送到杭州瞿世琥家里。将母亲安顿好，瞿世玮便到湖北黄陂姐夫家帮助管账。不久，大哥瞿世琥因为官清正，无意向上司行贿阿谀，被罢了官，经济

一时拮据，还要兼养母亲庄氏，所以就不再往弟弟瞿世玮家寄钱。这样一来，瞿世玮一家便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生活举步维艰。

瞿世玮，字稚彬，号一禅，道号圆初，1875年出生在湖北，从小在叔叔瞿赓甫的武昌官署中长大，是个落魄文人。家人称他“七少爷”，外人尊称他“瞿七爷”。待到他成年后，瞿氏家族已风光不再。好在瞿世玮大哥瞿世琥先后担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等知县。由于瞿世玮在家侍奉母亲，瞿世琥每月会寄回一些钱，这成为瞿世玮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现在，哥哥罢了官，家中断了经济来源，瞿世玮与金璇搬进瞿氏宗祠后，又生了5个孩子，加上秋白的老祖母，全家共有11人。生活窘境可想而知。

瞿秋白兄弟姐妹八人排行：

瞿秋白（1899—1935），小名阿双、霜，长子。

瞿轶群（1900—1981），小名群群、均均，长女。

瞿云白（1902—1958），小名阿耘，后改名昀白，次子。

阿鑫（早殇），小名阿兴，三子。

瞿景白（1906—1929），小名森，后改名景白，是四子。

瞿垚白（1909—？），小名阿尧，五子。

红红（早殇），次女。

瞿坚白（1913—1944），小名阿谷，六子。

瞿世玮信奉佛道，又好老庄之术，通医药，擅山水画，喜爱篆刻，可以说是聪明之人。但他顾家不多，一辈子玩世不恭，不务正业。这样，作为孩子母亲的金璇，身背上的压力难以想象！

秋白几个弟妹的命运是悲惨的。

三弟阿鑫，有一次上学，丢失了书本，怕母亲责问，不

敢回家，于是躲在野外露宿。因受风寒，得病致死。母亲悲痛万分，秋白也自责没有尽到哥哥的责任。

四弟景白，年幼时鼻子上生了一个疮，家中因无钱医治，只能任其溃烂，最终成了“塌鼻子”。

五弟垚白，自幼患了癫痫病，头脑迟钝。母亲自尽身亡后，



瞿秋白和母亲金璇、父亲瞿世玮

跟随父亲飘泊到湖北、山东等地，20岁时，客死在济南。

妹妹红红，3岁时患了肺炎，也因无钱治疗，最后病死家中。

瞿秋白目睹了弟弟妹妹的不幸遭遇，他与母亲一样，承受了多少次打击，为此，表示出对当时世道的痛恨，他多么想改造这个不顾穷人死活的社会！当然，少年时的秋白也有欢乐的时候，他与大妹轶群、弟弟云白、景白、坚白相继在一墙之隔的冠英小学读书，又影形不离地跟随在母亲身边。

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贤淑的女子。她出生在江阴璜土贤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金心茗曾任广东盐使，堂兄弟就是赫赫有名的金国琛，曾经追随李鸿章转战南北，屡建功勋。母亲擅长诗词，又深谙四书五经。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凄苦，依然怀有雅致的精神诉求，于是重视对孩子的教育。秋白的性格自幼受到母亲影响。

秋白天性聪颖，心底善良，又爱思考，小小年纪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悟性。13岁时，他就写出“今岁花不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样的咏菊诗。同时也耳濡目染父亲的绘画与篆刻，故此，秋白在上学时就学会了篆刻，写上一手好字。最让孩子们开心的是：家门口来往于白云溪的小船，以及觅渡桥头制作糖人的小担。父亲在常时，



瞿秋白写有一首《白菊花》诗，深得母亲赞许

经常去玄妙观修炼，秋白带着弟妹去看望父亲，也会顺便游一游东门外的红梅阁、文笔塔与天宁寺。

可是，这样的快乐时光并不长，一切都由家中沉重的负债而改变。父亲不能维持家庭，生活缺少来源，全家陷入困境。金璇为了养活孩子，只有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后来，母亲连陪嫁衣裳、首饰，父亲的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家徒四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母亲只得靠举债度日。

1915年冬，瞿秋白在省立常州中学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此时，母亲实在交不起儿子的学费，秋白被迫辍学。他痛苦极了，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同乡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此诗正是秋白心境的真实

写照。

这一年中秋节，前来讨债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欠债的账单已经有一寸多厚，母亲分明知道这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欠下，甚至还有一笔祖母逝世时欠下的买棺材钱。

讨账人言辞刻薄，甚至堵门不让人出入。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每次把讨债人打发走，母亲便回到房里，泪流满襟，不胜悲楚。她对人曾说：“看来我只有去死，我不死，孩子就不得活！”善良的母亲早已有了死的念头。

这年除夕，西门一带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红的灯笼，门上贴上了吉祥如意的春联；入夜，炮竹声声，响彻全城。此时此刻，母亲金璇还在等待身在湖北谋生的瞿世玮，希望丈夫能带回点什么。金璇与一群孩子，空守着阴森森的祠堂，左等右盼，没有等到孩子父亲的身影。全家只见愁容，不闻欢笑，这年怎么过？

大年初一，瞿世玮终于回来了，妻子金璇原指望他能带回一些钱，稍稍缓解家中的困境，哪里知道，瞿世玮行囊干瘪，两手空空，金璇见到此状，失望至极。正月初五，为了孩子不再生活在逼债的境地中，她毅然选择了自杀。她偷偷

地让云白买回一盒红头火柴。云白年幼，并不知道母亲的心思。金璇避着孩子，剥下火柴红头，用桃花纸包成小丸，伴着虎骨酒吞服自尽。直到第二天凌晨，瞿世玮才发现金璇服毒，好不容易请来一个外科郎中，但已无济于事。这天下午6点左右，金璇停止了呼吸，终年41岁。瞿秋白为母亲的离世悲痛万分，他在《哭母》诗中这样写道：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母亲去世了，全家人自此星散，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瞿轶群与瞿景白、瞿坚白投奔了在杭州的伯父；父亲带着患病的四子瞿垚白去了武汉的姑父家；17岁的瞿秋白只身去了无锡南门外杨氏小学，以做乡村教师谋生。

瞿秋白后来为什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除了家庭发生的变故外，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堂兄瞿纯白的帮助。瞿纯白是叔父瞿赓甫的儿子，当时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1916年年底，瞿秋白离开无锡，奔赴汉口，寄居在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

但没有考取。随后，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他考入了北京外交部开办的俄文专修馆。1920年秋，北京《晨报》、



瞿秋白考入北京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

上海《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与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瞿秋白因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学习过，精通俄文，于是被选中赴苏俄采访，他和俞颂华、李宗武成为我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1922年2月间，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

瞿秋白兄妹8人，活下来的有6人。在瞿秋白的影响下，除了患病的四弟瞿垚白外，另外3个弟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瞿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曾就读于常州冠英小学。母亲去世后，姐姐带着景白与坚白到了杭州。1921年夏，景白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为人正直、性格刚强，由于受

到大哥瞿秋白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年秋，师范还没有毕业，就由瞿秋白带往上海大学学习，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景白一路追随秋白，从汉口到莫斯科，直到牺牲。

1927年3月，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上，景白帮助哥哥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1928年4月，受党的派遣，瞿景白



瞿秋白：中国最早采访列宁的记者

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苏联人米夫，米夫虽

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党内斗争中，因拥护斯大林，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年，27岁的米夫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指挥和领导中国革命。当时，王明也在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支部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5月中旬，负责筹备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米夫从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在中山大学内，米夫因年轻气盛，装腔作势，在学生中不得人心。追随米夫的王明等人在学生中也很孤立。为了排斥异己，他们便造谣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在进行反革命活动。事后，便有学生相继被捕或被开除。学生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慢慢开始激化。

瞿景白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加上他的性格直爽，喜怒形于色，王明一伙对瞿氏兄弟产生了嫉恨与报复心理。不久，联共（布）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清党运动，中山大学也掀起了浪潮。王明等人收集、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的地方。瞿景白见此状况，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



左起：瞿景白、瞿秋白、瞿云白、瞿坚白

证退给区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从此没有出现他的身影……

这年他才 23 岁。新中国成立后，瞿景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瞿秋白的五弟瞿坚白，也和瞿秋白一样，为中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16 年春节，母亲去世后，坚白生活在杭州伯父家，在伯父资助下，进了学校，完成学业。坚白自幼聪明，会唱京剧，善写文章，写出短小剧评，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由于聪明能干，谋得镇海县教育局事务员一职，这可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

1935 年 6 月，坚白得知大哥秋白在长汀被敌人杀害的消

息，他克制内心痛苦，立愿继承遗志，参加革命。1938年，瞿坚白历尽艰苦，辗转武汉，由徐特立介绍，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分配在八路军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1944年，日军在武安百草坪地区“扫荡”，瞿坚白随部队英勇抗击，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瞿秋白的大弟瞿云白毕业于北京俄文政法专科学校，受哥哥瞿秋白的影响，参加过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在瞿秋白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被调派到上海总工会参加革命工作，经历了大革命时期许多重要活动。1925年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留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出版局担任翻译。

1930年，瞿云白奉命回国，继续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成为中共开展地下出版工作的重要一员。1931年，云白以开办绸布庄的名义作掩护，在上海周家嘴路绸布庄内，秘密设立中共地下印刷厂。1932年，又以一家住宅式店铺的名义为掩护，设立上海全国总工会的秘密印刷所。后来被敌人发现，逮捕入狱。

遗憾的是，云白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在敌人的“反省政策”策划下，被国民党特务组织所利用。他最终没有像哥哥与两

个弟弟一样，坚定革命立场，保住气节……

白云溪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填没，而白云溪畔的瞿氏宗祠还在，庙沿河的地名还在，这里依然能够找到瞿秋白四兄弟的影子，秋白与景白、坚白永远像顶天立地的巨人，



名垂青史，记忆永恒！
纪录片《常州三杰》在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播出

将世代铭记在人们心中。

“衔春之燕”瞿秋白

○ 金明德

在风景秀丽的“千载读书地，世代书香城”的常州，城中有一条名震中外的小巷，名叫青果巷，它宽不过三四米，长不过千米。在小巷中段一个深宅大院里，明朝著名抗倭英雄、文武双全的唐荆川栽种的八棵桂花树，和梅兰竹菊等花卉植物争奇斗艳，一种俗名叫“爬山虎”的青藤，爬满了四周斑白的高墙，大院里曲径通幽，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大院的后进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小楼，名叫天香楼。沿着古老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脚下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进入一个用“板壁”（常州话：木板墙）相隔的房间，眼前的一应老式陈设，把人们带入了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冬天里，也就是1899年1月29日那天，居住在这里的瞿姓人家，有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他睁开咪蒙的双眼，静静地、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



瞿秋白诞生于青果巷八桂堂内的天香楼

很乖。妈妈金璇（字衡玉）摸着他的小脑袋，对孩子的爸爸瞿世玮说：这孩子的头顶上有两个“顶”（头发旋涡，俗称“双顶”），

就叫他“阿双”，大名叫“瞿双”吧？爸爸认可了这个名字，这个男孩就名瞿双、瞿霜，字秋白。

小男孩长大以后可了不起：他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爱憎分明的小学童

在八桂堂里，还有个来自武进县潘墅村宿门里（今属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徐妈妈一家，也住在这里，一直帮助瞿家操持家务。徐妈妈丈夫姓羊，大多数时间住在乡下。过了两年，徐妈妈也生了一个男孩，属牛，取名牧之（1901—1999）。瞿秋白和羊牧之成为亲如兄弟的“发小”。属狗的秋白曾对羊牧之说：“我以犬耕田，力气不够，还要你这条小牛帮忙呢！”果然，长大后的羊牧之，在瞿秋白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还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干事，做过共

产党党刊《向导》杂志的校对等工作。

瞿秋白小时候常在妈妈的指导下学习古诗词。有一次，秋白背诵了宋代诗人张俞的一首五言诗《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妈妈就问秋白：“诗中那位进城的蚕妇回家后为什么哭呀？”秋白回答：“因为不劳动的富人锦衣玉食，而劳动人民却难以温饱，这不公平，所以她很伤心地哭了”。妈妈听后赞扬说：“说得很对，读书就要动脑子思考问题，不能死记硬背读死书。”从此，秋白不但好学上进，而且遇事爱问“为什么”，或者干脆大胆表达自己的看法。

秋白妈妈还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有一次讲《花木兰》从军的故事，秋白听后却问：“花木兰女扮男装，但她毕竟是个女孩子，在军中十几年怎么会认不出来呢？我有点不相信！”还有一次，妈妈讲《孔雀东南飞》的故事，秋白听完后愤怒地说：“焦仲卿和刘兰芝很要好的，可那个婆婆偏要赶走刘兰芝，真是太可恶了！”可见瞿秋白从小就爱憎分明，立场总是站在正义者一方。

1904年春天，5岁的瞿秋白进入庄氏私塾读书，这是他奶奶家办的私塾。在辛亥革命前，没有现代格局的学校，有条件的人家小孩子到了学龄，都是进入私塾念书。入学那天，秋白格外高兴，穿一件半新的蓝色长衫，外罩黑色背心，背上绿色的书包，蹦蹦跳跳地来到私塾门口，身轻如燕般地跳

过高高的门槛，穿过种满花草树木的天井，走进课堂，向老师作揖敬礼后，静静地等待上课。

第一堂课，老师教了两个词：“聪明伶俐，青云直上”，这8个字妈妈曾在家里教过秋白，但他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朗朗诵读，反复思考着词的含义。第一堂课对秋白的影响很深，后来他成为中学生，对这两个词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聪明伶俐不过是个先天优势，但也要靠后天努力才能成才；而努力成才不是为个人奋斗，要用学到的知识文化，为劳苦大众服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云直上”。这一认识就是他的著名诗句“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的思想基础。可见，同样一个词，不同胸怀的人就有不同的



5岁的瞿秋白进入庄氏塾馆读书

理解，关键是看你为谁而学习。

作文得了105分

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宣布废除了“科举制”，私塾停办了，瞿秋白就进入冠英小学堂读书，就是今天的常州觅渡桥小学。这时的秋白学习非常用功，还特别喜爱写作文。有一次，老师布置写一篇题目叫《说蟹》的作文，他就从平时细心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入手，把横行霸道的人比做面目可憎的横行的螃蟹，又一次展示了他从小就爱憎分明的优秀品质。文章赢得了国文老师谢仁忻的啧啧称赞，还作为全班的范文进行讲评。四年后，刚满10岁的秋白初小毕业，跳过了高小年级，直接考进了常州府中学堂（现省常中）上中学预科，可见瞿秋白的学习成绩是何等优秀！

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有一次老师要求以《论伯夷、叔齐》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秋白并不立即动笔，他先认真地审题，然后回忆了我国商代伯夷、叔齐兄弟互相谦让王位，商朝灭亡后“独行其志，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感人故事，认为与家乡的人文世祖季札“三让国权”的事迹有异曲同工之美。思考成熟后就伏案疾书，一气呵成。整篇文章不仅分析透彻、语言生动，而且见解独到。老师看后拍案叫绝，竟然批了少有的100分，还把作文送给校长看。校长看后兴奋地连连敲打桌面说道：“写得好！而且字迹工整，卷面清洁。”

于是挥起红笔，在 100 分后面又加了 5 分。

105 分的作文成绩，不仅在常州绝无仅有，而且在全国也是凤毛麟角。唯有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一篇题目叫《心之力》的作文，也被他的杨昌济老师批了 105 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了长大后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大贡献的人，从小必定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霸”。当然，也有人大器晚成，而且其中还有为谁而学习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

不信鬼神，热爱科学与文学

有正确世界观的人，一定是爱科学的人，瞿秋白就是这样。早在冠英小学读书时，有一位教“博物”课程的老师，在课堂上解剖了一只小狗，为的是让学生们了解动物的身体结构和内脏分布。秋白对博物课非常感兴趣，下课后兴致勃勃地在纸上画出了狗的心脏位置，然后对羊牧之说：“妈妈平时一直讲‘做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人的心脏都是偏左的，可见我妈妈与古人都不了解人的心脏位置。”

还有一次，秋白看到一副小石磨，很感兴趣，但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于是就问徐妈妈。当他得知这是磨米粉的工具后，就笑着说：“我吃饭时也是上下两排牙齿，把饭菜磨碎了再嚥下去，嘴巴也是一副磨子啦！”小秋白的比喻虽然天真，但很恰当哦。



冠英小学的“博物”课

爱科学的人更不相信迷信。有一年春节，瞿秋白和羊牧之跟随徐妈妈到常州府城隍庙去游玩。当他们进入庙堂后，看到凶神恶煞的“阎罗王”和一些“上刀山、下油锅”等“阴间”的刑罚造型时，多数孩子都十分害怕，往往躲在大人身后不敢再看。秋白却指着这些菩萨说：“这只不过是吓唬人们不要作恶而已，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神啊的，菩萨都是泥塑与木雕，没什么可怕的！”

爱科学再加爱文学，使瞿秋白的学识功底更加深厚。13岁那年秋天，秋白看到窗外菊花盛开，就作了一首五言绝句诗《咏菊》：“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他巧妙地把自已“霜”“秋”“白”的名和字都嵌入了诗中。秋白的大伯瞿世琥曾在晚清年间在浙江桐乡、

山阴等地做过知县，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当他看到侄儿小小年纪就有这么深厚的文学功底，啧啧称赞说：“秋白乃吾瞿家之千里驹也！”是的，瞿秋白后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大伯的夸奖：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里马”。

为天下穷苦人鸣不平

常州有句俗话叫做“从小看看，到头一半”，意思是说：一个人长大了品行如何，小时候的表现就能看出一半来。在这方面，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正面人物看，毛泽东小时候就忧国忧民，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就是小时候从同情和帮助穷苦人做起的，瞿秋白同样如此。

瞿秋白 12 岁前，他的大伯和叔叔都在朝廷做官，因此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小时候常常被人家称做“瞿家少爷”。这也是旧时人们对小康之家的男孩子的一种尊称。可是，每当那些食不果腹的“叫花子”围着不停地叫“少爷、少爷，给点吧”的时候，秋白总是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送给乞丐，然后大声说：“你们不要喊我少爷，我可不做少爷！”可见他对“少爷”“老爷”一类的称呼十分反感。

每逢寒暑假或节日，瞿秋白常常跟着母亲到常州东北郊的江阴璜土镇贤庄的外祖父家做客。在那里，他最喜欢与农家孩子交朋友。有两次，他看到农家小孩上身没穿衣服，于

是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回家后妈妈对他说：“你做好事没错，可是你的衣服也不多呀！”秋白听了有点不高兴，就顶了妈妈一句：“不多！不多！我的衣服总比人家多么！”秋白长大后，很后悔那次与母亲的顶撞，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很不应该！”

到了清末民初，政府依然腐败无能，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苦，瞿秋白家也不能幸免。有一年夏天，妈妈叫秋白把一堆棉衣送到典当行去当些钱用，羊牧之看到后说：“把棉衣当掉了，天冷了怎么办？”瞿秋白无可奈何地说：“天下挨饿受冻的何止我们一家，先顾一下眼前吧！”到了秋天，徐妈妈叫羊牧之拎一篮芋头给瞿家送去，秋白就留羊牧之一起吃午饭，可是中午吃的却是早上的剩粥。秋白对羊牧之说：“原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了，老百姓的日子会日渐好转，可是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老百姓更苦了。我们家还有点粥喝喝，乡下不知有多少穷人连粥都喝不上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尸骨”，是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穷人家没法活下去，只好卖儿卖女。有一天，瞿秋白和羊牧之做完功课就外出散步。走到东门太平寺时，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农，身旁站着一个小女孩，秋白说：“看见这可怜的小姑娘，就好像是在出卖自己的妹妹一样，心里多难受，我们赶快离开吧！”走了几步，秋白又指着人群中一个大腹便便、富人

模样的胖子说：“要是这类胖子也饿瘦了，天下可能就会变好了。”

每年假日，秋白常与羊牧之一起到天宁林园，去捕捉昆虫和采摘树叶标本。有天傍晚，突然飞来一只老鹰（常州话，鹰），在头顶上盘旋一阵后迅速扑进树林，抓住了一只小鸟就飞向空中。秋白看到这一幕，就对羊牧之说：“你看，多么和谐的光景就被这种‘强盗’破坏了，要是没有‘强盗’，天下就可太平了！”

这些故事足以说明，瞿秋白从小就怀有为天下穷人和弱势群体鸣不平的意识和愿望，并且经常用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来帮助穷人；而“老鹰抓小鸟”本来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可是少年秋白却把它同“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这种思考和认识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怒斥“国贼”，崭露爱国情怀

《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里的“教”，也包括学习和思考，还包括在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思想。同样一件事，由于立场不同，认识角度就不同，人的思想就有天壤之别。瞿秋白就是从许多历史和社会现象中，通过学习和思考，慢慢地培养了自己爱国家、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怀。

在学校里，瞿秋白最喜欢听老师讲宋朝末年，常州军民

英勇抗击元军的“纸城铁人”和“十八家村”（现名古村）的故事。尽管当时常州的城防像“纸”一样薄弱，但常州人民却像“铁人”般奋力抵抗，保卫自己的家园。元军破城后就屠城报复，把全城杀得只剩下十八户人家。秋白把这幕惨剧一直铭记在心间，对英雄的故乡人民更加崇敬。

瞿秋白考入省常中后，当时的校长屠元博是常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教师中也有一些同盟会员，还秘密成立一个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进步团体。屠校长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讲述邹容、秋瑾及黄花岗烈士的英雄事迹，并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响应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省常中成为常武地区反清斗争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秋白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精神大为振奋，决心要练好身体，参加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他在操场上边锻炼边对同学张太雷说：

“满清王朝奴役了我们近300年，老百姓吃尽了苦头。”他指了指脑后的辫子接着说：

“这尾巴似的



听屠元博校长宣传革命思想

东西，早晚要把它剪掉！”1911年底，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常州，他兴高采烈地跑到妈妈跟前说：“妈妈你看，皇帝倒了，我就把辫子剪了！”

在省常中，瞿秋白除了学好各门功课外，还认真阅读课外进步书籍。他经常手捧《中国近世秘史》《太平天国野史》《通鉴纪事本末》《红楼梦》《水浒》《官场现形记》等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不久，当他听到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军阀窃取后，就陷入了愤懑苦恼的沉思。他对羊牧之说：“现在要是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如挥舞双斧的李逵，但可以做酒店里的酒保，专门接送好汉。”不久他写了篇痛斥袁世凯为“国贼”的作文。国文教师看了吓坏了，就写下了斥责的评语。谁知秋白竟然在老师的评语上加了批语，不赞成老师的批评；这位老师恼羞成怒，把秋白狠狠地训了一顿，



瞿秋白将写有“国丧”的白灯笼挂在门上

秋白却作诗加以讽刺。这下闯大祸了，国文老师就拿着瞿秋白的作文本送到学监处，经校方研究后给了秋白一个记过处分，但秋白始终不承认自

己有什么过错。

不久，“双十节”到了，人家都准备着庆祝，而秋白却在家门上挂了一盏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表示抗议。妹妹瞿轶群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挂上，妹妹再摘下，他还是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妹妹。他对妹妹说：“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依靠兵权要搞复辟，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妹妹拗不过他，只好让这盏白灯笼依然悬挂在大门口。

突遇家庭变故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很多不幸，一辈子一帆风顺的人很少很少。有个西方古典哲学家叫塞涅卡，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假如你至今尚未遇到过什么不幸，这将是你的最大不幸”。这句话不仅富有哲理，也十分符合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经历。

瞿秋白也一样，原本依靠伯父和叔叔的资助，还算富足的家庭生活，支撑着他的学业，使他从一个不明事理的孩子，成长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学生，初步奠定了“为衔春色上云梢”的初心。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秋白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即1915年春节年初五，也就是所谓的“财神节”那天，尽管常州城里还是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突然一个噩耗传

来：秋白的知书达理又勤勉慈祥的母亲，因为家道中落，不堪重负，在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以后，再也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窘境下，服毒自杀了！瞿秋白闻讯后，冒着鹅毛大雪，从学校跌跌撞撞地赶到家里，扑在母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

他回忆起母亲对他们兄弟姐妹的爱，回忆起从小所体会到的母亲的伟大，看着如今日益衰败而门可罗雀的“家”，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在灵前爱子身。

这是一首读来令人潸然泪下的诗，也折射了社会的人情冷暖。

瞿秋白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再也没钱缴纳学费，即将中学毕业的他只能辍学，心情也因此变得压抑和孤寂，一度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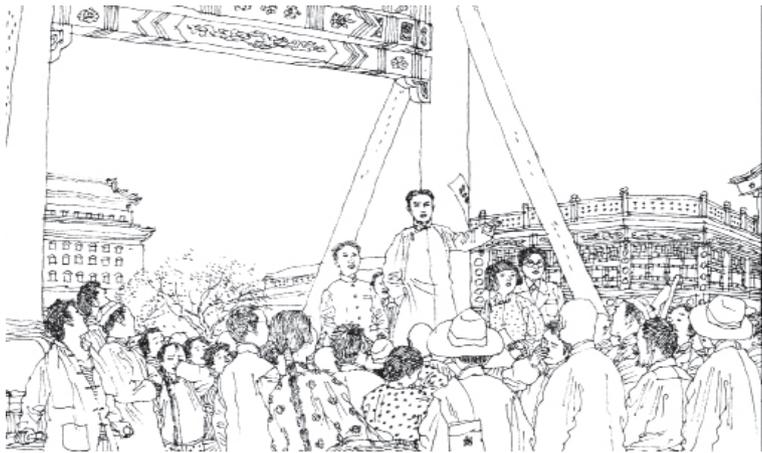
走上革命道路

喜欢读书思考又经历过苦难的人，最容易产生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清明节，瞿秋白为母亲扫墓。他对羊牧之说：“母亲自尽后，我想得很多，感到当

今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贫富不均。从中国历史看，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是为了铲除贫富不均。可见做事必须从‘均’字着手。”瞿秋白就是这样抱着为平民老百姓谋幸福的初心，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1916年12月，瞿秋白告别家乡，来到武汉，在堂哥瞿纯白的资助下考取了湖北省立外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第二年暮春时节，他又随调到北京工作的堂哥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是，北大的学杂费很高，令人望而生畏，堂哥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支援他，于是向他介绍了外交部一所不收学费的俄文专修馆，瞿秋白终于有了再次学习深造的机会。

话说那时的北京，正处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著名教授学者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刻，瞿秋白受到



在“五四”运动中，与同学们一起到街头演讲

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逐渐成为了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尤其是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瓜分中国利益的消息传来，北京成为“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主题的“五四运动”发祥地。瞿秋白义无反顾地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两次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关进监狱。但是，磨难和挫折并没有压垮他，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参加革命的决心。

1920年10月，因为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里曾和同学一起翻译过《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而名声大振，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记者去苏联采访。那时的苏联，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江南第一燕，初心街春色

铲除了剥削阶级造成的“贫富悬殊”，人民过上了平等而幸福的生活。因此，瞿秋白到苏联后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特别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省常中同学张太雷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誓将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道路。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至1935年6月18日，年仅36岁的他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江南第一燕，初心衔春色”“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伟大使命。

瞿秋白的故事

○ 周 星

在常州，只要说起文化，有两处地方总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前后北岸和青果巷，因为这两个地方颇有历史渊源。北宋



少年瞿秋白

庆历三年（1043），常州太守李余庆在外子城河东南处疏浚了贯穿城区的市河。城南青果巷的运河被称为前河，河道挖到小营前附近时一分为二，疏浚的市河又叫作顾塘河。顾塘河与白云溪在顾塘桥处分流的尖端，人称“白云尖”。因该地在两河之间，故有“前驳岸”与“后驳岸”之分，时间久了，便被统称为“前后北岸”。

前后北岸往南不远处就是青果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出生在青果巷一座叫“八桂堂”的小楼里。

秋白的父母亲

瞿秋白的父亲叫瞿世玮，有兄弟姐妹十一人，他在家排行第七，人称瞿七爷。瞿世玮从小读书就很不错，但没有考取功名，也没有职业，整天闲居在家，无所事事。不过，他的国画水平相当不错，在常州有点名气。瞿秋白的奶奶与瞿世玮一起生活，他的四伯父瞿世琥每月寄来50块大洋，这成为了瞿秋白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瞿秋白的母亲叫金璇，江阴县西乡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字衡玉，有些书上也称她为金衡玉。金璇从小聪慧，熟读过四书五经，为人善良，勤劳能干。金璇的祖父金葆仁曾经担任过安徽旌德县令，后病逝于湖北襄阳。而金



瞿世玮绘画作品《山居图》

葆仁有一位堂兄名叫金国琛，曾担任过广东按察使。金璇父亲金心芑也跟随他的这位做高官的伯父去了广东。光绪五年（1879），金国琛在广东按察使任上病故。不久，失去靠山的金心芑从广东回到江阴。因家宅破旧狭小，金国琛孙子金翰如便邀请族叔金心芑全家寓居在贤庄乐在堂。金翰如是当地一位体面的乡绅，担任十乡总董一职，他的夫人正是瞿秋白父亲瞿世玮的大姐，而为瞿秋白父母做媒的也是金翰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金璇与瞿世玮成亲，金心芑为宝贝女儿准备了很多嫁妆，还有一名婢女作为陪嫁。婚后几年，瞿世玮夫妇共生养了6男2女，但活下来的只有6个。由于瞿世玮基本不管家中事务，全家操持就由金璇一人承担。她上要伺候年迈的婆婆，下要抚养6个孩子，每天是忙忙碌碌，没有闲休的时候。

瞿秋白11岁那年，由于家道中落，瞿世玮一家受尽族人的白眼和冷遇，最后只得搬到瞿氏宗祠居住。到了1914年，全家8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勉强维持，借据日积月累，只增无减。金璇每天被债主们逼得痛苦不堪，最后，这样一位大家闺秀选择自杀逃脱苦难，这一年她才41岁。

金璇去世后，因为一直无钱买地安葬，所以灵柩放在祠堂东侧屋内，竟达10余年。直到1930年前后，有关方面才将她的遗体搬到常州东郊乱坟堆里安葬。新中国成立后，她的3个儿子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母亲最后一次给孩子们盖好被子

1962年，在常州市人民政府主持下，由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300元，将母亲金璇坟迁葬到常州西郊公墓，墓碑刻有“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太夫人之墓”，下署“媳杨之华女瞿轶群敬立”。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瞿秋白与张太雷

瞿秋白与张太雷被称为中共早期历史上的双子星座，这不是一句戏言，而是二人的真实写照。

首先，瞿秋白和张太雷都出生在常州。瞿秋白是1899年1月出生的，张太雷是1898年6月出生的，虽然阳历不是同一年，但是阴历却是同一年，都是光绪二十五年，生肖都是属狗的。根据《常州中学校友录》记载，瞿秋白是宣

统二年（1910）年春进入常州中学的，张太雷则是宣统三年（1911）7月进入常州中学的，两个人进入常州中学时间前后相差一年。

其次，他们在常州中学读书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屠元博和童伯章。这两位校长都是不寻常之人：屠校长是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童校长是举人，国学家。虽然两人出身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对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瞿秋白和张太雷经常在一起探讨国家大事，对国家未来的命运充满忧虑，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两人在常州中学读书的时候，瞿秋白以文科见长，而张太雷则是以数学和英语见长，他们成绩都很优秀。在课余时间，瞿秋白参加了学校的诗社，学习昆曲；张太雷比较喜欢体育，尤其喜欢足球。虽然学习的强项不同，但在理想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后来，张太雷由于为一位同学鸣不平而离



瞿秋白和张太雷，恰同学少年

开了常州中学，瞿秋白则因为家贫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民国五年（1916）春，张太雷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

瞿秋白在民国六年（1917）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他们先后投入五四运动，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向往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并在1920年春加入了李大钊指导的半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对于接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张太雷比瞿秋白则更早。自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后，张太雷就参与了第三国际和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早期创建活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不久，张太雷就加入其中，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瞿秋白的思想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张太雷的影响。就像他们的同学李子宽后来回忆：“太雷服膺社会主义较早，在津久已参加社会主义文献之译述工作，虽进行工作之际相当秘密，但我辈亲近同学已知其事。就我所得印象，秋白思想之转变得力于此一阶段，太雷之掖进应不在少。”从他们先后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社会，并试探寻求其出路，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是他们在俄国看到了活生生的“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特别是瞿秋白，1920年秋应《晨报》《时事新报》之聘，他作为特派员赴苏维埃俄国。一直到1922年12月21日才回国，在俄国整整呆了两年。在此期间，瞿秋白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观察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社会，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可以从他写的三本著作《俄罗斯革命论》（此书已毁于商务印书馆“一二八”战火）《俄

乡纪程》《赤都心史》得到完整的了解。

1921年初，张太雷受中共早期组织派遣，作为中共代表到达苏俄伊尔库茨克，这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在地，张太雷担任中国科书记。6月22日至7月12日，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瞿秋白则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共同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在此期间，瞿秋白与张太雷交往较多，并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8月，中共一大刚刚召开，张太雷奉命回国。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不再只负担驻外记者的工作，不久就参加了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兼教员。这是一座专门培养中国党团员的干部训练班，班上建有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旅莫支部。1922年1月，他参加了远东大会，他既是代表又是翻译。同年，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担任翻译。12月18日，旅莫支部在罗亦农主持下，讨论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瞿秋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把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工作移交给任弼时，然后回到了国内。

1927年12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中弹牺牲。瞿秋白得知此消息后，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瞿秋白在1935年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他多次提及张太雷，并提到如有可能将好好写篇《忆太雷》。

瞿秋白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刻，还如此缅怀张太雷，可见他们之间的革命友情是多么深厚啊！

秋白与鲁迅

在鲁迅的朋友圈中，瞿秋白最为特别。虽然他比鲁迅小18岁，但两人彼此欣赏和钦佩，都将对方作为最可信赖之人。鲁迅曾将清代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赠送给瞿秋白，以表达他们之间真挚的友情。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会后，因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离开，“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他又开始读书写作。瞿秋白虽然遭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而失去工作，但是他在文学的天地中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在此期间，使他感到“最惬意”的是认识了鲁迅，并与鲁迅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

瞿秋白在上海，起初住在茅盾家中，后来又搬到了谢澹如家中。这段时间，瞿秋白通过冯雪峰建立起与鲁迅的联系。1931年下半年，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要出版，有一篇俄文版的序言需要翻译，鲁迅想到了瞿秋白。瞿秋白接受这个任务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翻译了将近两万字的序文，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



瞿秋白与鲁迅

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

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这是鲁迅与瞿秋白的初次合作。

1932年春末初夏的一天上午，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了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从上午聊到傍晚，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第一次见面结束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再次会面，继续他们没有聊完的话题。同年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

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特别高兴。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那天，鲁迅全家还在瞿秋白家中一起吃了午饭。

后来，瞿秋白妻子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也开始尝试创作小说，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没有勇气。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却再三劝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这天下午，杨之华的习作终于到了鲁迅手中，“大先生”接过文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毛笔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杨之华非常感激。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的时候，战争异常残酷；国统区内同样弥漫着腥风血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3年3月到10月，瞿秋白过上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如《王道诗话》《伸冤》

《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中国文和中国人》等。这些文章都是在瞿秋白与鲁迅见面时，事先打好腹稿，经过两人交流，然后由秋白执笔。这些杂文大多以鲁迅的笔名，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1934年1月4日，瞿秋白来到鲁迅家中，两个人谈了很久。那一晚，鲁迅执意要求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而他和妻子许广平则睡在家中的地板上。这两位最亲密的朋友，两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士，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告别，也成为了他们人生的诀别！

1935年2月，鲁迅得知瞿秋白被俘的消息后，通过多种途径打听了解瞿秋白的消息，他和陈望道、柳亚子等人发起了公开营救活动，同时还请蔡元培通过国民党上层关系展开营救，但都无功而返。国民党反动派一意孤行，决定杀害瞿秋白。鲁迅知道后，无比痛惜，他在瞿秋白就义前七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海上述林》，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刷出版，他认为这是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海上述林》的署名是“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

在瞿秋白牺牲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也在病痛中溘然离世。他们可以在天堂相遇了，仍然是最好的朋友！

（参考：《漫漫求索路——瞿秋白》闫耀明著；[人物春秋]《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三迁其居话秋白——《瞿秋白家世》片断；《人物传记系列：瞿秋白与鲁迅》许京生著）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在长汀西门罗汉岭英勇就义，该照片为瞿秋白就义前遗照。

张太雷学生时代的故事

○ 周 星



张太雷在外祖父怀里

常州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城”，白云溪就像一条横卧在城中的巨龙。旧时的白云溪，东西长约 1000 米。数百年来，这里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曾相继出过 5 位状元、7 位宰相、200 多位进士……白云溪两岸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文眼、状元福地。而白云溪的源头在荆溪，荆溪来水途径西蠡河，再经石龙嘴分水，进入

城区。被誉为“常州三杰”之一的张太雷就出生于西蠡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少年时就读于石龙嘴上的西郊两等小学。

家世渊源

常州张氏祖先就是北宋的张举。张举曾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但他父母年迈，又无兄弟，所以他最终放弃功名，留下来照顾父母。他在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读书著述，校勘书籍，作诗书法，街坊四里都十分崇拜他，连著名大文豪苏东坡也大加称赞。他家中唯一值钱的是藏书，据说张举藏书楼号为中吴之最。张举去世后，葬于青山门外德义桥，赐号正素，后人在他居住地曾竖正素坊，青果巷内的正素巷缘于此。

700多年后的清朝嘉庆年间，城西西塘又有张悦与张怡兄弟，两人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张悦兄弟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兄弟俩兄谦弟恭，相亲相爱，非常和睦。后来，兄弟二人靠经商发家致富，成为一方商贾。但是他们致富不忘邻里，经常在地方做一些公益活动，深受里人尊敬和爱戴。

张悦与张怡分家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弟弟张怡认为哥哥有四个孩子，而自己只有一个孩子，财产应该按孩子总数分为五份，哥哥张悦却坚决不同意，在他想来，这是破了规矩，自古以来，分家均是哥东弟西，一人一份，所育子女不可与父一起分得财产。故此，这次分家没有分得成。后来，张怡与母亲相继过世，张悦仍将家产的一半分给张怡的孩子。此事一经传开，顿时成为世间坊里美谈。武进知县姚莹得知此事，亲题“仁让风行”匾额赠送张家，地方

著名学者李兆洛手书“仁让堂”，悬挂于张家中堂。久而久之，张氏兄弟居住地名为仁让里，后世子孙称张悦、张怡为“孝悌公”。被誉为“孝悌公”的张怡不是别人，正是张太雷的高祖。

童年岁月

大运河将白云溪与石龙嘴紧密相连，泽惠一方。石龙嘴隔河相望，有一条老街叫西仓街，这里有家专门售卖皮革的小作坊，叫薛天兴皮行。皮行老板叫薛锦元，薛老板的女儿与女婿张亮采跟随他们一起居住。张亮采原本是“仁让堂”张氏后人。只是到了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家中人口又多，



张太雷外甥冯海龙少将（右）考察张太雷出生地旧址

家里已经没有容纳他们的地方了，所以他只好和妻子一起寄居在岳父家。虽然如此，一家人倒也和睦睦，生活也勉强过得下去。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薛锦元的家中一个男丁呱呱坠地，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太雷。张太雷的降临，给薛家人带来无比的惊喜。因为在此之前，张太雷已经有了一个姐姐，父亲张亮采盼望有一个儿子，结果心想事成，所以儿子降生后，他欣喜不已，立刻借用《周易》中的“否极泰来”一词，给儿子取名“泰来”，寓意厄运到头好运来，他希望降生的儿子将来能给家庭带来好运。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张亮采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谋得文书一职，母子数人也到了萍乡，全家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张亮采看着张太雷姐弟一天天长大，想到自己也是秀才出身，满腹经纶，所以他暗下决心，要把平生所学全部教给两个孩子。于是，张亮采亲自教子女读书写字，教他们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还让他们学习唐诗宋词、天文地理等。

张亮采除了给孩子们教授文化知识，还经常给他们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给他们介绍家乡常州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典故，这也让张太雷姐弟对家乡常州充满了热爱、期待和眷恋。在这段时间里，张太雷母亲也充分利用空余时间督促两个孩子复习父亲张亮采教过的知识。



张太雷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

然而，幸福生活总是短暂的。身在异乡的张亮采身患重病，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2月去世，年仅37岁。此时的张太雷只有8岁。

父亲的去世对张太雷全家是个晴天霹雳，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母亲张薛氏只能含泪带着孩子扶着父亲张亮采的灵柩回乡，把他安葬在武进厚余马家村。

从此以后，母子三人就靠母亲一人，到处做点手工活维持生计。回常以后，居住也成了问题，此时外祖父薛锦元已经去世，回到西门已不可能。经张氏族人同意，全家搬进了南门外张家坟堂屋（丙舍）暂住。这坟堂屋只有一间小屋，只能放置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张亮采的灵位。一家人就这样艰难地生活着，虽然如此，母亲却从未耽误过张

太雷的学习。

小学岁月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地方人士在石龙嘴回秀书院旧址，建起武阳西郊两等小学堂。这年秋天，母亲带着张太雷寓居在由薛氏开办的鼎泰元冶坊处，因而有机会将太雷送入西郊两等小学堂学习。

西郊两等小学堂所授科目除了国文以外，还有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学生对这些都很感兴趣。除此以外，学校每年还组织学生进行远足（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春游秋游）。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另一方面



石龙嘴印象

也丰富了他们的课外生活。西郊两等小学校歌唱道：

湖清兮江水雄，两脉此交点。
江湖聚汇秀禅院，毓我青年。
石龙怒山寺气象万千，西郊居其间。
河水之活泼，似我学生精神兮。
石龙之庄严，似我学生气概兮。
我学生兮，我学生兮，努力进取兮。

在西郊两等小学读书期间，张太雷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发奋读书，积极进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广泛涉及各类书籍。所以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校长也特别器重他。

张太雷还经常喜欢与同学来到常州东门红梅阁古春轩游玩，这里是少年太雷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这里吟诗作画，接受艺术熏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多，张太雷喜欢上了《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他不仅把这些故事讲给姐姐听，还模仿里面的人物玩打仗游戏。每当看到大同学欺负小同学，他都会挺身而出，帮助弱小同学。

张太雷上学时，每每经过运河边，看到搬运工人肩挑背扛、纤夫拉船十分辛苦，却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些情景对幼小的他产生了很大震撼。在平日生活中，当他看到那些拉黄包车的人风雨无阻地奔跑，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人在乞



张太雷捡起帽子，帮车夫戴上

讨，他那颗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一系列想法：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困苦？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怎么

样才能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带着这些疑问，张太雷一直在苦苦地思索、追寻。在此期间，他干脆把自己的姓名“张泰来”改成了“张复”。这个改名一事要从他的老师马次立说起。

马次立是西郊小学的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有一天上作文课，马老师给学生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试论学生之职责》。有的学生写自己的职责就是以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有的学生则是写自己要升官发财，享受生活等等。张太雷想起平日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文中写道：“今日之莘莘学子，明日之国家栋梁，应砥砺品行、刻苦求学，关心民众疾苦，思考祖国前途，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马老师读到这篇文章后，被张太雷的豪气与志向所深深感动，也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他把张太雷叫到身边，亲切地询问：“如何救国救民、复兴中华？”张太雷认真思考后告诉马老师：“现在认真学习，

掌握知识，强身健体，以后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马老师听后，对眼前这位学生频频点头肯定，并提出为了牢记这个使命，建议把“张泰来”的名字改成“张复”。张太雷爽快地答应，并向马老师鞠躬致谢。

张太雷非常感激马老师，“张复”这个名字他一直用到上大学前。

中学时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911年夏，张太雷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即今天的省常中）。

常州府中学堂坐落于东门内玉梅桥护国寺旧址，当时是常州城唯一的新式学堂，也是一所名人辈出的学堂。学校环境优美，条件先进，校园墙外天宁寺晨钟暮鼓给学校增添了一份意境与韵味。常州府中学堂校歌唱道：

大江浩瀚，灌中吴万顷膏腴。
更笠泽澄波，铜峰攒翠，秀灵磅礴扶舆。
是为毗陵名郡，自延陵文物启东吴，
迄今四千余载，名誉震寰区。
峨峨讲舍，是我中学，八邑建中枢。
莘莘群彦，敦品立行，拔汇复连茹。
愿养榘楠作栋梁，擎天有柱巩皇图。

勉诏
前
徽，
为光
家
国，
宏兹
远
模。



20 世纪 20 年代，常州中学大门

正如校歌所

唱，“峨峨讲舍，是我中学，八邑建中枢。莘莘群彦，敦品立行，拔汇复连茹。”学校后来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一大批享誉中外的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向全国，其中有我党早期优秀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有才华横溢的刘半农和钱穆；有语言大师吕叔湘和周有光；有音乐大师刘天华；还有两院院士 20 多人，各类专家、教授、学者更是不胜枚举，真是人才摇篮，群星璀璨！

常州府中学堂的首任校长是屠元博。说到屠元博，他名叫宽，字元博，是著名史学家屠寄的长子，常州人，曾留学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05 年，学成回国，应天津津沽初级师范学校的聘请，他主持学校教务工作。1907 年，常州筹建常州府中学堂时，应故乡之请，出任学堂

监督（校长）之职。同时，他还聘请了几位思想进步的留日学生与同盟会会员到校任教，并亲自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主爱国思想，介绍邹容、秋瑾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事迹。武昌起义前，他组织学生进行军训，进而在校内发起组织 16 人的反清秘密团体。屠元博担任校长的时候，校内师生思想活跃，革命气氛非常活跃。学校的课程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兵操课，对学生进行军训，这在当时的中学里是非常罕见的。

张太雷对军事操练非常感兴趣。每次操练的时候，他总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所以他的军事技能进步很快，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有时候半夜紧急集合，张太雷总是最先达到集合地点。这些军事技能的学习，对他以后参加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向屠校长请教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聆听教诲。



在兵操课上

童伯章继任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了校训“存诚、能贱”，并制成匾额，悬挂在学校大礼堂。每当新生入学，童校

长都会亲自讲解校训：“存诚，就是做任何事，读书求学，知人待事，都要诚心诚意，不可有半点虚假；存贱，就是不要以为进了五中，就处处高人一等，不可一世，要学会尊重普通人，要习惯于做平常事。”童校长还亲自为学校创作了校歌，“泱泱民国，礼乐靖戈矛；多少英才硕彦……”在两位校长的鼓励下，张太雷在学习上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张太雷五年的中学求知生涯中，门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称赞和羡慕。

遇见良师，一生之幸；结交挚友，一生之福。张太雷在常州府中学堂学习期间，与瞿秋白成为校友。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读书，是同学眼中公认的好友与优秀生。

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常州后，张太雷和瞿秋白带头把后脑勺的辫子剪掉，并且向其他同学宣传：“这种尾巴留着有何意义？”他们在学校里一边拿着剪刀为同学剪辫子，一边大声叫道：“革命啦，剪辫子了！”同学们纷纷效仿，剪掉了头上的辫子。随后，张太雷还和同学们一起走上大街，和群众一起游行，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胜利了，推翻了腐朽的满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却当上了大总统，甚至还要做皇帝。特别是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后，社会各界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要求洗刷国耻。同时还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张太雷全力

投入这个运动中，他与同学一起在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支持国货，不要买日货。还和同学们自筹集资在学校建造一座“对日亭”，警示大家“勿忘国耻”！

1915年夏，张太雷好友李子宽因与老师顶撞而发生冲突，被学校除名。班上同学都认为如此处理欠妥，纷纷向校方提出质疑，希望能够改变决定，学校却不予理睬。于是全班同学罢课一周，矛盾顿时升级。

学校又开除了5名同学，这下引起广大学生不满，张太雷与瞿秋白也加入了抗议活动中，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没想到学校为了教训学生，采用杀鸡儆猴的方法，在放假前贴出告示：张太雷和瞿秋白的行为与李子宽的行为差不多，如果不知悔改的话，下学期就不要来学校了。



师生共建“对日亭”

张、瞿二人看到这个告示，既气愤又感到屈辱，张太雷不堪忍受这般屈辱，主动跑到校长室表示下学期自动辍学，不再来校读书了。

张太雷以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中学生涯。他觉得辜负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和无私奉献的姐姐，也对不起帮助自己的亲友。为此，他痛苦了好多天。

大学生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机会永远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正当张太雷苦苦地思索自己未来的出路时，他听到北京大学招收预科生，这简直是喜从天降。他立刻找到瞿秋白和李子宽，商量一同报考。瞿秋白因家境贫苦而放弃，张太雷与李子宽两人决定一起去考北大。

张、李二人凭借良好的中学基础，双双顺利通过考试，被北大录取。张氏族知道这个消息后，商议由族人筹资助张太雷上大学。1915年秋，张太雷怀着求学救国的热情，终于北上学习。

张太雷来到北大后，心情万分激动，想到自己能在中国这座著名学府求学，也算为自己为家庭争了气。更感欣慰的是，在北大还遇到了老乡好友吴南如。他们曾在常州中学一起谈古说今，畅谈国事。如今他乡遇知己，怎么会不高兴呢？

然而，张、吴二人最后并没有进入北京大学，而是进了

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原因是北大虽然出类拔萃，但学校规定预科班必须要学满三年才能转入正科，张太雷感觉自己的经济条件难以支撑昂贵的学费与生活开支。他打听到北洋大学学费便宜，而且预科为期半年便可转入正科。所以，他放弃了在北大就读。于是他兴冲冲地携好友吴南如，一起报考了北洋大学法律预科。

北洋大学是由常州人盛宣怀创办的，张太雷与吴南如有一种亲切感。宿舍虽然是由库房改建的，两个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中间用木板相隔。木板中间一端有小孔，挂着一盏公用的电灯，透过小孔可以看到对面，张太雷感到满意而有趣，他对着吴南如说：“吴兄，你我同住一间房，同点一盏灯。”吴南如回答道：“同点一盏灯，共读一本书！”在北洋大学期间，二人虽然换过宿舍，但从未分开过。

张太雷由于家庭条件限制，平时非常勤俭节约，吃饭常常吃廉价的北方伙食团。吴南如知道后，主动转到北方伙食团，陪同张太雷一起就餐。这种不舍不弃、同甘共苦的同学兼兄弟情谊，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张太雷与吴南如进入北洋大学后，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尤其是张太雷，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广泛阅读各种课外书籍，补充自己的课外知识。在校五年，张太雷的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尤其是英语，深受老师赏识。在学习的同时，张太雷也不忘强身健体，他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球场上经常

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张太雷看后深受教育，他认为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他每天利用自习时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翻译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他曾对前去看望他的北大好友李子宽说：“做人要整个儿改了，我以后不做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

1919年2月，张太雷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校内组织了“社会建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张太雷加入了北洋大学学生会，参加声援北京学生的各



参加北洋大学演讲团，宣传反帝爱国

种活动。并走上街头，参加演讲，还去北京请愿，营救爱国志士。

在这场运动中，张太雷往返于京津之间，深受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与天津爱国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周恩来、邓中夏、马骏、于方舟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20年3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人通过北洋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介绍，与李大钊在北京会晤，后又到上海访问陈独秀等人，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对外政策，也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张太雷从中担任了联络员与英语翻译的工作。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毕业，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党内最早的国际活动家，最终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



张太雷：谋将来永远幸福

张太雷家风传承的故事

○ 王金兰

家风是什么？家风，或是先辈的人生信仰、品德善行；家风，或是用文字记载的家训、家书；家风，或是收录了信息的物件……优良的家风文化穿越时空。

张太雷继承了祖辈的“求学问，远富贵”“友爱仁让”等家风，在踏上革命道路后，“为天下人谋永远的幸福”而献身。他的子女在父亲的家书、父亲为革命牺牲的浩然之气感召下，又谱可歌可泣的篇章。

白云溪的水滋润着这方沃土，养育着她的儿女。在这崇文重教的千载读书地，拥有“儒风蔚然为东南冠”的美誉。

距离白云溪不远处，有一条南北走向，长约400米的古老街巷——正素巷，常州城南张氏的先祖张举（字子厚）曾在这里居住。北宋治平四年（1067），张举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本应到青溪（今浙江淳安县）担任主簿，先生却



“正素先生”张举

没有赴任，因为父母年迈，又无兄弟，他不忍心弃父母而独求功名。此后，他居家侍奉双亲，读书著述，校勘书籍，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人生价值。他作诗立意清新，书法造诣精深，上门观墨求字者络绎不绝。张举清风素节，广为传扬，

苏东坡、范祖禹等人都举荐、称赞他。朝廷曾多次征召，他都一一谢绝。张举去世，朝廷赐号“正素”。常州太守在巷口建正素坊，巷名由此而来。赐号“正素”的张举，正是张太雷的远祖。

常州西下塘的仁让里也与张太雷高祖有关。大约在 220 年前的嘉庆年间。张悦（字如南）、张怡（字仲斋）兄弟居住这里。父亲早亡，家境贫寒，兄弟俩由母亲抚养成人。张悦、张怡兄弟非常友爱，对母亲十分孝顺。在分家的时候，兄弟二人相互谦让，成为里中美谈。

按照祖上的规矩，房屋分置是“哥东弟西，家产各半”。因为哥哥生有 4 个儿子，弟弟只有 1 个儿子，所以弟弟只肯得家产的五份之一，哥哥张悦不同意。

母亲去世后不久，弟弟张怡在 53 岁那年病故。悲痛之际，哥哥张悦将家产各半相分。张氏兄弟仁让家产的事，曾经传遍常州城。

仅长 50 米，宽 1.5 米的小巷也因此得名仁让里。这个仁让



张太雷祖居“仁让里”

家产的张怡，就是“常州三杰”之一，张太雷的高祖。

祖辈倡导好学、孝悌、仁让的传统美德，如琼浆般滋润着张太雷以及他的晚辈。

1898 年 6 月 17 日，张太雷生于常州西门外西仓街薛天兴皮行（外祖父家）。父亲张光斗原住仁让堂，因家道中落，此时寓居岳父薛锦元家。

张太雷从小立下救国救民的高远志向，要“为天下人谋永远的幸福”。1911 年 7 月，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今省常中）。辛亥革命期间，常州府中学堂是常州地区思想的大本营，校长和教师既具有丰富的学识，又倾向进步和革命。在常州中学时，张太雷接受了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16 岁那年，张太雷改名张复，取字“长铗”（长剑）。

“长铗”是有典故的。战国时期，有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冯谖，他喜欢佩带长剑，在齐国孟尝君府中当门客。在为孟尝君到封地收债时，冯谖看到当地百姓生活困苦，无力偿还债务，就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赐给欠债人，并当场烧毁债券。在孟尝君责怪冯谖时，冯谖回答：“主公您家财万贯，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仁义，我帮您收回了仁义。”取字“长铗”，表明了少年张太雷的仁义气度。

参加革命后，他改名“太雷”，寓意为警醒世人，化作击碎旧世界的惊雷。

1916年，张太雷考入北洋大学读书。在校期间，他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人生道路。

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完成学业。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曾被李大钊先生赞誉为“学贯中西，才华



出众”，完全可以走升官发财的路，但他连毕业证都未领取，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我要持一把利剑，替天下穷人打抱不平”

1921年2

月，张太雷受共产主义小组委派，离北京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临行之前，他曾给妻子陆静华写过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要选择你所最善(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

为保守党的秘密，张太雷不能说明远行的目的，他隐秘地袒露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及对幸福的理解，他要为祖国，也包括自己家庭未来的真正的幸福去斗争。

张太雷牺牲后，妻子陆静华默默挑起侍奉婆母和教养子女的重担，不管生活多艰辛，都让孩子们读书求学。尤其是在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还送女孩去读书，这让世人不可理喻。孩子们也不负母亲期望，年年都以优异的成绩和奖学金，回



张太雷烈士家书手迹

报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之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太雷与陆静华的二女儿张西蕾、儿子张一阳先后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张一阳，1923年12月23日出生，那天正好是冬至，张太雷用《易经》中“冬至一阳生”为其取名一阳，寄托着“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信念。

由于家境贫寒，张一阳从小体弱多病。为了帮助母亲维持生计，15岁时就到常州协丰油坊当学徒。1939年，在周恩来、陈毅等领导的关怀和安排下，赴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并于当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结业后，任新四军三支队学兵队政治干事。

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陆续撤离皖南。组织上安排他先行撤离，但张一阳不肯，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因为是张太雷的儿子就特殊化，我要跟部队一起行动。”



张太雷子女：张一阳、张西屏、张西蕾

1941年1月，国民党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张一阳所在部队担任掩护新四军机关突围的任务。在激战中，大部分指战员光荣牺牲，一部分被俘。张一阳也在被俘之列，被关押到上饶集中营。

在上饶集中营，张一阳受尽折磨，同时又染上了回归热，高烧不退。当敌人得知他是张太雷的儿子时，一手拿着治疗回归热病的针剂，一手拿着“悔过书”对他说：“你只要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给你打针，送你去医院治疗。”处在高烧中的张一阳，躺在地铺上，轻蔑地背对着敌人。在生与死的抉择中，他毅然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信仰，选择了做父亲张太雷的好儿子。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断绝了水、饭，张一阳被折磨而死。牺牲前，他高烧一直不退，昏迷中还不忘记奋勇杀敌，高喊“同志们跟我冲啊！杀呀！”张一阳与父亲牺牲时隔14年，他倒在了革命的征途上，年仅19岁。

1938年春，在母亲的指引下，张太雷女儿张西蕾在16岁那年，怀着继承父亲革命事业与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带着父亲当年的家书，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在组织的帮助下，最终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西蕾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受住了烽火年代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南京从事教育工作，后与化工行业结下不解之缘。

1958年，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党中央决定从在职干

部中抽调一批干部进入大学培养。得知这个消息后，已经调任化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的张西蕾踊跃报名。当时，张西蕾已经36岁，参加调干生学习需要脱产，还可能会对职务晋升造成影响。身边同事都认为没有必要去吃这个苦头。她却回答：“一个人总是应该争取生活的主动，多充实自己。”为了能直升本科学习，她通过了高考试卷测试，平均每科成绩都在70分以上。

张西蕾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毕业时门门功课都很优秀。在那段时间里，她既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又是在校的大学生。每逢期末，张西蕾与孩子们都会把成绩单拿出来比一比。她说：“我家的桌子上有六份成绩单，其中一份就是我的，成绩照样不落人后。我相信这对孩子们也是一种激励。”

毕业之后，她被任命为化工部直属北京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经过她与同事的共同努力，这里成为国家合成纤维研究领域的领军单位。改革开放时期，张西蕾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副局长、化工科技总院副院长。她所带领的科研组取得的成果，多次受到中央嘉奖。离开工作岗位后，她又连续担任了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人，张西蕾从不刻意向外人张扬自己的身世，在后来的政审调查中，有人还半信半疑地问她：“你真的是张太雷的女儿吗？”张西蕾微微一笑，不作回答。她将父亲的精神转化为追求高尚、朴实、严谨、自强不息的家风，



2010年冯海龙和母亲张西蕾在北京

传给后代。张西蕾的女儿冯海晴和冯海兰，也是有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儿子冯海龙曾担任武警学院政委，授予少将军衔。

张西蕾曾在《烛光前追思父亲》一文中说：“从幼年起，就有一团烛光在我心中闪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烛光愈加明亮灿烂，它给我温暖，给我鼓励，给我信仰，给我支撑。追寻着这烛光，我走着自己坚实、无悔的人生……”至今，张太雷烈士的后代们，依然追寻着先烈足迹，继承太雷的遗志，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

柳直荀云溪机智脱险

○ 薛焕炳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

这是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5月11日写给李淑一的一首（填）词，名《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的“杨柳”是指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与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两人都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

1898年11月，柳直荀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高桥镇中兰村。



柳直荀与李淑一的结婚照。前排左三为李淑一，左四为柳直荀。他的父亲柳午亭是位大学者，学贯东西，融会古今，曾执教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柳直荀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父亲严格指导。

1912年，柳直荀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寄居在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家；后来考入雅礼大学预科，期间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等优秀学子，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经何叔衡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在湖南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与地处江东的常州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大革命失败以后，柳直荀受党的指派，是来苏南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并且在常州白云溪上机智脱险，最终到了江西苏区。

大家知道，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



柳直荀 (1898-1932)

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同年8月，瞿秋白在武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理论。会议以后，中央派大批优秀党员奔赴各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举行武装起义，柳直荀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8年3月，身为中共领导人的瞿秋白，在沪西隐蔽地秘密约见柳直荀，秋白告诉柳直荀：自己即将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近日已与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等商定，决定派你与杨度潜往苏南，在太湖地区联络革命力量，争取打开局面，以掩护和接应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瞿秋白还告诉柳直荀，如果在苏南遇到困难与危险，可以去常州，向薛迪功寻求帮助。

瞿秋白提到的薛迪功是谁？他是瞿秋白的表兄，在常州算得上是一位开明人士。此人曾做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又在武进县教育局担任过会长，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

瞿秋白安排陪同柳直荀的杨度又是谁？是柳直荀的同

乡，湖南湘潭的一位奇人。说他是奇人，我们看看他的经历就一目了然：杨度早年中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朝廷四品官员；与康有为、梁启超、黄兴等人友好，同汪精卫、蔡锷又是同学；杨度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共和，加入过国民党，又同情共产党，营救过李大钊；入过佛门，还做过上海滩上杜月笙的师爷。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北伐时就曾预言：“毛泽东将来能得天下！”你说此人奇特不奇特？！

话题回到柳直荀的苏南之行：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指示他前往群众基础比好的苏锡常一带，继续发动农民运动。柳直荀化名柳志远，装扮成药材商人；杨度则仍用原名与真实身份，掩护柳直荀一路前往。

柳直荀和杨度开始先到无锡堰桥，暂住在杨度朋友华振家。华氏兄弟并不知道杨度与柳直荀二人来无锡的目的，但出于友人情谊，依然为他俩提供了许多帮助，还介绍了地方上的一些政治局势。

大革命时期，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受到上海革命运动的影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这里相当活跃，各地都建立了工会、农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革命力量曾蓬勃发展。“四一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在苏南实行清党反共，查封工会与农会。虽然有一批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逮捕杀害，但白色恐怖程度没有上海、南

京那样严重。在常州与周边地区，徐水亭、恽长安、王寿生、与无锡严朴、陈叔旋等共产党人，依然坚持地下斗争。

此时的杨度，年岁较大，体力也差，平日外出联络和发动民众，一般都由柳直荀出面。柳直荀与严朴、陈叔旋等同志接上头之后，几个月内就恢复了 20 多个乡镇农会的活动，还在纺织工人比较集中的吴江盛泽镇建立了三个工友文化补习班。这些补习班名义上是文化补习，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柳直荀的活动卓有成效，但也很快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团防部吴江分部头目秘密派人打入盛泽工友文化补习班，甚至混在工人中间，一起听柳直荀讲课，柳直荀全然不知。团防部密探发现这个带湖南口音的年轻人，居然在“宣传共党过激思想”，吴江分部立即向县政府和县党部报告，请求拘捕这个赤色分子。

吴江县当局接到这个情报，请调驻军一个连，迅速开往盛泽镇。幸好，柳直荀事先得到一个地方绅士的通风报信。此人同情革命，痛恨反动派在乡里横行霸道。柳直荀得到报信，情急之中，立即烧毁身边的重要文件，并由两个工友带路，逃到太湖边的芦荡深处。敌人搜索了半天，没有搜到柳直荀的半点影子，只得快快离去。尔后，柳直荀几经辗转，安全脱险，向武进奔来。

这一时期的武进地区，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较量比无锡、苏州更为激烈。但武进的革命基础还较扎实，这

里曾是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家乡，仅武进恽氏就有恽逸群、恽雨棠、恽玉棠等 20 多人参加共产党。1928 年 10 月，柳直荀选择在常州城南 50 里的漕桥镇落脚。

10 月的常州，秋高气爽，金桂飘香，水稻呈黄，丰收在望。柳直荀顾不上欣赏这里的美景，他乔装打扮，化名刘湘杰，希望早日与常州同志接上头。

漕桥是武进南部的重镇，地处三县交界：往东是无锡雪浪、胡埭以及武进潘家、雪堰、南宅，往西是宜兴万石、和桥、配亭和一望无际的溇湖。漕桥一镇又分属两县，镇以漕桥河为界，河之南属宜兴，河之北属武进，而且距离太湖仅有 7—8 里路，这对开展革命活动极为有利。

柳直荀自称是薛迪功久未谋面的朋友，由于有了这一关系，他很快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急于打听薛迪功的下落。未曾想到，此时薛迪功并不在常州，他在南京就任江苏水上警察总队文化教官。柳直荀别无办法，只好暂时留下，在武进一家由吴氏开办的私立小学，以代课老师作掩护，并在漕桥、鸣凰、郑陆、卜弋桥以及丹阳皇塘等乡，联络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重新集结革命力量。

薛迪功为何会去南京担任警察总队文化教官？个中是有原因的。由于薛迪功保释过被国民党关押的恽逸群等友人，也资助过表弟瞿秋白，于是上了武进县当局的黑名单，南京中统方面也派员来武进作过秘密调查。国民党当局为什么没有贸然剑

指薛迪功？薛迪功也是有社会背景的：他的表舅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此人深得蒋介石器重。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一向左倾而又同情共产党的薛迪功，数次遭到武进反动势力的联名控告，依然未被追究。尽管是这样，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很危险，于是听从友人劝告，去了南京。

再说杨度，来苏南不久就患病，不得已而返回上海，但他的心里一直牵挂着身在常州的柳直荀。为了帮助柳，他数次卖掉珍贵的字画，所得钱款作为柳直荀的活动经费。

柳直荀在常州的行踪，已被武进县当局发现，这年11月底，当局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危险分子“刘湘杰”。柳直荀为不连累他人，悄悄离开漕桥，本想去宜兴太华山区隐蔽。但宜兴城乡也贴满了缉拿布告，军警又设了三道卡口，严防“刘湘杰”过境。柳直荀万般无奈，只好东行，前往当年瞿秋白教过书的无锡溪桥镇私立杨氏小学。柳直荀在此躲了几天，考虑再三，他索性化装成商贩，折返武进县，进了常州城。

柳直荀面对到处张贴的缉拿告示，沉住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东拐西绕，来到白云溪南岸早科坊43号。早科坊43号是何人居所？这正是薛迪功府邸。柳直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来武进一直想联系薛迪功，不经意间竟然踏进了他家门槛。

宅院大树参天，宅后云溪绕屋，显得非常幽深。说来也巧，薛迪功在南京因水土不服，又看不惯水上警察集训总队的所

作所为，于是辞职，刚刚回到常州。他正在家里款待前来探望的表弟瞿云白与刘宜静两对夫妇，同时还有上海的弟弟薛迪莽。薛迪莽是沪上“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二女婿，大公司高级职员，来了这么多的至亲好友，薛迪功在家忙得不亦乐乎。

柳直荀得知这里就是薛迪功府邸，径直而入。薛迪功见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有些吃惊。柳直荀拉薛迪功于一旁，作了自我介绍，又谈了自己与瞿秋白的关系，说明来意。薛迪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他二话没说，慨然应允给柳直荀帮忙。薛迪功对柳直荀说：“在这里暂住几天，然后与我弟弟、弟媳妇一同乘坐火车回上海，谅军警特务还不至于上门搜查抓人。”柳直荀点点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定了下来。

然而就在次日，武进县团防队带上中统驻武进工作站站长白某等特务，突然前来薛家，声称接民众举报，有身份可疑男子躲在这里，要求例行检查。

薛迪功事前有所提防，见有动静，急中生智，立即叫人打开后厢房停放的一口寿材，让柳直荀



瞿秋白的表亲薛氏父子

藏在其中。待白某等特务进屋，柳直荀已经藏匿得无影无踪。白某等从前到后，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所谓“可疑男子”，他们哪里会知道棺材里藏着玄机！特务搜查无果，只好向薛迪功赔个不是，怏怏而去。

薛迪功让柳直荀在家躲了一个星期，见城内没有动静，这才送柳直荀登上白云溪的乌篷船，经水路到达无锡北门码头，再下船去火车站，乘车去了上海……

柳直荀在常州白云溪脱险后，1930年由上海去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此后，柳直荀先后受命组编红二十五师、鄂西北独立团、洪湖独立团，后合编为红八师，一直兼任政委一职，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此期间，柳直荀坚决反对党内“左”倾错误，因此被撤销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更为不幸的是，1932年9月，湖北监利一带开展“肃反”，一批优秀的党内同志因扩大化被错杀，柳直荀亦在其中，牺牲时年仅34岁。

三年后，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瞿秋白也被国民党逮捕，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年仅36岁。

瞿秋白与柳直荀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英勇事迹，人们永远不会忘却。

（根据2013年5月16日人民政协报黄禹康《柳直荀与杨度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一文改编）

王若飞在常州

○ 王金兰 薛焕炳

1946年4月8日下午，一架由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突遇浓雾，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其中有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



山西省兴县，“四八”烈士纪念馆

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女，以及4名美军驾驶人员。恶劣天气夺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四八”空难震惊中外。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王若飞是中共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有关问题。1925年，王若飞回到国内，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负责筹建中共豫陕区委，后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领导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1926年，王若飞到达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指挥南市区的起义工作。1927年，他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农委书记。

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中，党的组织遭受极大破坏。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苏南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会后，作为江苏省委常委与省农委书记的

王若飞到江苏各地巡视工作，调查研究，探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

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回放至1927年10月16日。“寒露”之时的常州，天气晚来秋。因是星期天，白云溪畔，局前街上的公立武阳小学，少了往日的琅琅读书声，街上的人流明显增多，福音医院门前有黄包车夫在兜揽生意。局前街与北



青年时代的王若飞

后街、新丰街相通，成为常州火车站到客的主要留宿地。与公立武阳小学一路之隔的楚记大成旅馆、交通旅社等坐落附近。

这天，楚记大成旅馆来了一位身着长衫、头带礼帽的教书先生，洒脱不俗，他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书记王若飞。此行目的，是来巡视常州工作，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破坏，领导相继牺牲。6月上旬，王若飞被派回上海参加江苏省委常委工作，在白色恐怖中，他英勇顽强地领导省委，向敌特、叛徒作坚决斗争，并且侥幸逃过了好几次搜捕。

此时的常州，同样笼罩白色恐怖之中。4月14日，国民党武进县反动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封闭了左派领导的武进县党部和县总工会，收缴了县公安局和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县总工会委员长王寿生、工人纠察队长赵四等人被捕，县公安局局长杨锡类等被通缉，武进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7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顾修（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回到武进开展工作。9月下旬，中共武进县委（亦称中共常州县委）在雕庄顾家塘正式成立。

历史镜头重新转到局前街。10月16日下午，中共武进县委领导恽长安、徐水亭等10余人，先后到达楚记大成旅馆。王若飞首先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他说：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但能明了这问题的为数很少，在从前有提出土地革命问题的，往往被视为笑话。那末到了什么时候始知土地革命之重要呢？就是由湖南农民抗租税种种暴动，始觉察到土地革命的重要。这次中央紧急会议，特别提出革命的农民政纲，坚决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农民革命从抗租抗税起，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自己；消灭农村的封建关系，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

恽长安，时任武进县委宣传部长，他在会上作了《武进县委工作纲要》的工作汇报，重点汇报了农民运动的情况。当时，武进县委正在武南地区发动和领导农民，向天宁寺开展抗租斗争。为了掩护革命斗争，武进县委在都家桥创办了

觉农小学，张云鹤任校长（后为党支部书记）。就在几天前，县委已组织位于武进东南的谭庄村天宁寺佃农，联名呈文向县政府控诉天宁寺冒粮收租、剥削佃农的罪行，要求清算历年浮收。同时在10月12日的武进《中山日报》公布《天宁寺佃户泣告全县父老书》。听取汇报后，王若飞就常武地区农民运动现状提出了意见。他指示武进县委，要充分利用“抗租、抗债、抗捐”动员群众，在“三抗”斗争中，待机发动武装暴动。

在这次常州巡视之前，王若飞已根据江苏省委的决定，制定了第一次《江苏农民运动计划》。计划分析了江苏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江苏农民是要革命、要暴动的。《计划》指出农民暴动应该特别注意江北方面，因为江南交通便



南夏墅乡都家桥，觉农小学旧址

利，反动军队容易进攻，资本家、豪绅地主的组织也较严密，暴动等行动较易失败。江南应努力发展减租抗租运动，有可能组织暴动的地方，当尽量发动，尽量扩大土地革命的宣传。

根据王若飞的指示，武进县委作出具体部署，成立了中共武进县委军事委员会，吴维中任书记。随后又在东门外红庙举办“三抗”（抗租、抗捐、抗债）斗争训练班，近40名党员参加。县委书记顾修主持了这一活动。

王若飞巡视常州的20天后，武进县委领导下的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产生了变化：从之前的报刊联名控诉，升级为



在红庙举办“三抗”训练班

集体抗租。11月6日，天宁寺钦峰和尚率领法警、伙子100多人，到升西乡都家桥一带强行收租。前黄公学党支部书记徐秋蝉、都家桥觉农小学校长张云鹤、教员时章生和杨锡类等发动农民300余人，聚集猛将庙，与钦峰展开说理斗争。提出清算浮收条件。所谓“浮租”，就是

地主将出租田亩以厘进分计算，如一亩三分二厘，按一亩四分计算，多收的八厘田租为“浮租”。钦峰被迫立下字据，暂不收租。

中共武进县委领导的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以“清算浮租”为突破口。天宁寺佃户的抗租斗争先后持续三年之久，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成为苏南农运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

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王若飞在江苏工作的日子里，他经常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农村：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装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或化装成皮毛商人，带着“伙计”，风尘仆仆赶至暴动地点；或下车后独自雇一匹马，到达就近街镇；或乘上一条木船，船上放了纸钱、香烛一类的迷信品，化装成去上坟祭祖的样子……

江苏农民秋收暴动，在火与血的交织下留存史册。让我们读取当年在常州周边地区发生的农民暴动史料，穿越时空，回顾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宜兴起义：1927年11月1日11时左右，参加起义的各路农军陆续隐蔽进城，分散在各处等待行动。此时，新任县公安局局长正举行就职典礼，副总指挥万益在县署前的高台上连发三枪，发出开始起义的信号。2000多起义农民，臂缠红布，手持刀枪、锄耙、棍棒等武器，在一面面红旗的导引下，分头进攻县署、县公安局、商团团部、水警队，国民党县长、



宜兴起义：农民革命胜利万岁！

公安局长闻风逃逸，商团、水警亦作鸟兽散……起义队伍很快占领全城，一面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飘扬在宜兴县城上空。

无锡起义：1927年11月9日上午10时，农民三四千人集会于南石园……农民革命军身衣短衣，颈围红布，手持手枪、盒子炮、勾镰枪、鸟枪、手铳、军刀、锄耙、木棍、铁尺等类，以警笛的高低徐疾，分进退散归，动作整齐，英气勃然，勇敢果断。各处满贴“农民暴动起来！打倒南京、武汉、北京的反革命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拥护农民委员会！”等标语。

江阴起义：1927年11月15日，江阴第一次后膛暴动揭开了江阴农民起义的序幕。从1927年冬延续到1928年底，

江阴农民暴动大小 10 余次，震动了大江南北。武进北乡部分贫苦农民也揭竿而起，参加了以江阴为中心的农民暴动，江阴地区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



江阴后塍农民暴动

王若飞在领导江苏农民武装暴动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把农村的革命斗争逐步引向深入。与苏南农民暴动相呼应，泰兴、如皋、海门等地在次年举行“五一”暴动，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苏南、苏北革命斗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在江苏的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特别是江阴的工农红军，其中的西路支队活动于江阴西部、武进北部一带，



如皋：红十四军纪念馆

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1934年底，历时7年多。他们经受住腥风血雨的考验，在江苏红军革命史上留下了壮丽的篇章。

王若飞在江苏的时间不长，1928年6月就赴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但他在土地革命初期组织开展的江苏农民运动，点亮了革命火种，永远载入党史册。王若飞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他为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殉难，人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为纪念一代英杰王若飞，我们将《王若飞在狱中》最感人的片断，作为本文结尾：

夜里。几个特务闯进牢房，掏出手枪，对准王若飞的胸口：“现在只要你说一个‘招’字，就放了你；不说，马上送你回老家！”

王若飞：“什么‘招’字，早从我的字典里抠掉了！”

包头北郊野外。一排枪口对准王若飞的后背：“再给你



包头：王若飞纪念馆

几分钟，好好考虑一下！”

王若飞整了整衣领，迎着深秋的晚风，望着巍峨的大青山。他挺直身子，从容地说：“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

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等了好几分钟……敌人没有开枪。王若飞厉声喝道：“开枪吧！混蛋们！”还是没有开枪。

王若飞忽地转过身来，敌人吓得后退了几步。王若飞轻蔑地说：“你们这套把戏，对共产党人是没有用的！”

（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常州历史大事记（1919-2012）》《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同志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9月26日）》王若飞于1927年9月根据江苏省委的决定主持制定的《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第一次）》《王若飞自传》等。）

苏区女杰吴静焘

○ 薛焕炳



吴静焘（1904-1933）

光绪二十九年（1904），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许多与常州人有关的重要事情：

3月11日，由商务印书馆创办、徐柯与孟森等编撰的《东方杂志》创刊；5月15日，由盛宣怀担任会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创立；5月21日，由陈范开办的《苏报》案了结等等，孟森、陈范、盛宣怀就是其中的当事者。而在这一年，一个

叫“蔷薇”的女孩在武进嘉泽镇呱呱落地，“蔷薇”就是后来成为苏区女杰的吴静焘。

吴静焘出生在嘉泽，后来居住白云渡东侧的县学街 143 号，这里是父亲吴卓如在城中的房产。

吴静焘家境殷实，有家学渊源。父亲吴卓如（1877—1944），武进地方乡绅，曾任上海法院推事，后抚养吴静焘幼子虞蜀江长大成人。母亲许氏（1876—1922），因患肺疾病故于南京，年仅 46 岁。大哥吴学仁（1901—1953），字原逊，就读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于震旦大学商科。二哥吴维中（1902—？），又名芎生，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1925 年进上海大学学习，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妹妹吴蔷薇（生卒待考），少年时病故于江西。弟弟吴舟生（1914—？），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抗战胜利后赴美实习 3 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机械工业部担任高级工程师。

吴静焘的故事要从常州白云溪讲起。宜兴荆溪来水由城西小西水关注入白云溪。溪水一路向东，流经觅渡桥、渡仁桥、甘棠桥、惠民桥、大浮桥、世丰桥、润之桥，直至白云渡。渡仁桥北堍就是有名的府城隍庙。常州奇女子李静姍在民国元年（1912）创办女子职业团，自任总理（经理或校长角色）。次年正式成立女子职业学校。民国六年（1917），她又在府城隍庙内创办武进县第一所女子刺绣专业学校。吴静焘就在此年进入由李静姍创办的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武进女子职业学校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说起这座学校，首先要介绍李静姍这一位奇女子。



嘉泽老街

李仁（1868—1922），字静姍，号息尘，常州武进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或者说是中国女子职教第一人。李静姍世居常州城内青果巷，与《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同出一门。舅舅汤润之是江南有名的画家，静姍从小受到舅舅的熏陶，

因此擅长诗词书画，创立的象真绣驰名于世。武进女子刺绣专业学校的绣品还在巴拿马、费城等地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出口展览会上获得过金奖、银奖及奖旗、奖状百余件。“五四”运动后，李静姍奔走各地，筹募从日本收赎胶济铁路储金。由于积劳成疾，于1922年病逝。吴静焘少年时遇上李静姍这样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又致力于女子教育的好老师，对青少年时期的她产生过重要影响。

吴静焘（1904—1933）原名蔷葆，1912年进入常州女西小学读书，1917年转入半工半读的常州职业团学刺绣。次年，父亲在南昌经商，因母亲患病，吴静焘只得休学，前往南昌，

护理母亲。赴赣不久，母亲病逝，静焘回到常州，转入崇真女子学校读初中。

崇真女校位于城隍庙后面的鸣珂巷，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于1909年的教会学校，校长是美国人罗淑君女士。女校办有高等小学，同时办了一个半工半读的初中班，学习英语、音乐、手工、实用技术等，吴静焘在这里读完初中。

“五四”运动兴起后，吴静焘在学校和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活动，上街宣传和募捐，支援各大城市的学潮与工人运动。1923年考入南京汇文女中，就读高中。

1925年，吴静焘在汇文女中将要毕业，父亲吴卓如要她嫁给一个钱庄老板。具有新思想的吴静焘，怎么能接受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她当然要挣脱这一束缚，争取婚姻自由。情



鸣珂巷

急之下，她与二哥吴维中商量，争取得到他的帮助。

哥哥吴维中（名芑生），1925年进上海大学学习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维中少年在嘉泽小学读书，后随父去南京。中学毕业后，在1923年前后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因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校方开除。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同年下半年，进入黄埔军校。1926年7月，吴维中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某部军需官。起义部队转移到达海陆丰，他辗转回到上海。1927年10月，吴维中、朱根宝等5人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来到常州，成立中共武进县委军委，吴维中任县委常委兼县委书记。1933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陆军监狱，度过了将近5年的狱中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维忠获释出狱，曾回家乡武进小住10余天，后又踏上革命的征途，在奔赴延安途中不幸遇难，这是后话。

吴维中对父亲包办妹妹婚姻一事非常反感，他当然会鼎力相助吴静焘。在吴维中的帮助下，吴静焘离家出走，并由二哥介绍，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

上海大学是中共领导的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干部的学校，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肖楚女等在此任教，瞿秋白还担任了行政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及社会系主任等职务。在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启发

指导下，吴静焘在这里阅读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等，思想豁然开朗，她立志要为劳苦大众谋生存，图幸福。

“五卅运动”中，吴静焘经过了革命的历练。事情要从1925年5月15日说起。这天，中共党员顾正红为抗议日商纱厂资本家撕毁与中国工人达成的协议，带领工人群众冲进工厂与之交涉，被日商举枪击中大腿。他依然振臂高呼，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刽子手连开两枪，又用刀猛砍头部，顾正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顾正红被杀害的消息立刻在上海工人中传开，引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上海大学学生在中共党员、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余泽鸿等人组织指挥下，上街宣传募捐，声援工人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吴静焘成为“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



吴静焘进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与同学余泽鸿结为伉俪

吴静焘的爱国行动与积极表现，受到中共上海大学特别支部的重视，1926年春，她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以自己的表现和非凡的组

织才能，赢得党组织与革命群众的高度信任。这年10月，中共上海区委领导的上海区劳动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吴静焘被选为妇委委员，负责杨树浦、小沙渡工人区的妇运工作。她经常深入到女工中，组织劳动妇女委员会，并在工厂、学校组织宣传队、救护队，举行夜班女工上工前的飞行讲演会或谈话会，成为上海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此时的吴静焘，自己身背的婚案还没有结束。同年12月下旬，父亲带着有关人员追到上海，强令她回家结婚，吴静焘断然拒绝。为此，父女之间因这桩婚姻事件还闹到警察署，幸好经上海妇女联合会出面调解，方算了结。事后，吴静焘在1926年1月5日出版的《中国妇女》第6期上，发表了《旧婚制下的一个逃生女子》的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呼吁20世纪的青年要为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奋斗。

1927年的春天，虽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伴随着血雨腥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抄封，余泽鸿与吴静焘等一路遇到追杀，他们只能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斗争。在革命最危险的关头，余泽鸿与吴静焘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革命信心。

1928年初，吴静焘义无反顾，与余泽鸿这位群众运动的领袖在上海结婚，自此成为革命伴侣。他们肩并肩、心连心，为党积极工作，先后在中央组织部、天津中共北方局、上海

中共中央机关等重要部门，日夜奔波。

余泽鸿是位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原名世恩，笔名因心，晓野。1903年2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长宁县。1922年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时，经恽代英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进入成都外语专科学校，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1930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机关决定，将一批在上海的同志转移到江西苏区，余泽鸿与吴静焘被列入其中。当时，女儿余怀渺渺只有2岁，儿子阿兴（虞蜀江）出生仅几个月，正嗷嗷待哺。怎么办？为了不给组织增添麻烦，他们毅然把孩子送回常州，寄养在嘉泽外祖父吴卓如家。吴卓如虽然与女儿在婚姻问题上有过结，但孩子毕竟是自己的外甥，他毅然接受了幼小的阿兴……

阿兴送到嘉泽后，夫妻俩还不放心，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儿子改名虞蜀江。改名有两个目的：一是避免国民党特务追查迫害，为自己留下后代；二是让儿子牢记父母是谁。在儿子改名的事情上，吴静焘与余泽鸿动足了脑筋：“虞”与“余”同音，表示父姓；“虞”字下面是母亲吴静焘的吴姓，又是父母双姓的结合。“蜀”是四川简称，代表父余泽鸿的家乡；“江”是指江苏，代表母亲的家乡。

吴静焘母子分别的情景是揪心的：阿兴抱住妈妈的脖子，

大声哭叫，不肯松手。吴静焘只能忍痛割爱，扳开儿子稚嫩的手，捂住泪眼，远远离去，不敢回头。这一去，吴静焘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去，再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

1930年8—9月间，吴静焘与余泽鸿到达江西，余泽鸿安排在瑞金县委工作，吴静焘则安排在宁都中心县委，后来调到南广中心县委做妇女工作。为了巩固和发展建黎泰（建宁、黎川、泰宁）革命根据地，她留着短发，扎着绑腿、挎着驳壳枪，深入各区乡和重点村，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组织妇女会，动员妇女送子送夫参加红军；同时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主力红军反“围剿”。

在建宁当地，吴静焘经常夹着课本，拿着粉笔，教人们识字，讲革命道理，唱革命歌曲。全区流行的那首《妇女同志歌》就是吴静焘亲自教妇女们唱的，歌中唱到：“油菜开花一管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告声妇女同志哟，没了髻子也甘心！”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建黎泰苏区局面焕然一新。各乡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妇运会、儿童团等各级组织，建宁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10个区及其72个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全县发展党员280余人，发展地方武装独立团1000多人，扩大红军30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此，吴静焘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嘉奖，《红色中华》报也给予表彰，在中央苏区被称为最有威望的妇女干部之一。

1933年1月，余泽鸿调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吴静焘担任常委、宣传部长兼妇委书记。吴静焘认真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成绩显著。

就在此年4月2日，吴静焘为中央苏区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天，她与妇女部长刘志敏前往江西瑞金（一说宁都）参加省委扩大红军会议。归来途中，在建宁双溪口黄泥潭遇上一股溃藏在山上的残匪，正下山行劫。吴静焘一见此情，顾不得个人安危，掏出手枪，对准敌人射击，掩护乡亲撤离。吴静焘、刘志敏二人打死打伤匪徒多人，被匪徒团团围困。群众高喊：“红军同志，赶快跑呀！”匪徒们发现是两位红军女子，立刻集中火力向她俩占据的山头扑来。在激烈战斗中，刘志敏身负重伤，吴静焘寡不敌众，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山间的杜鹃花，她的芳龄永远定格在29岁。

吴静焘遇害的噩耗传到建宁，丈夫余泽鸿正在中心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他强忍悲痛，继续传达中央文件，布置工作。当吴静焘的遗体运回建宁时，余泽鸿再也忍不住悲痛，一边落泪，一边为妻子洗净身上的血迹，穿上红军军装入殓。

山在哀鸣，水在悲泣，建宁百姓永远失去了这位常州女中豪杰！4月29日，建宁百姓将吴静焘葬在建宁县城后山，为烈士树立了墓碑，以志缅怀。新中国成立后，吴静焘遗骨迁至建宁烈士陵园。

吴静焘牺牲后的第二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余泽鸿随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到达贵州后，为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四渡赤水”，余泽鸿参加了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先后担任游击纵队宣传部长、川南特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在川滇黔边区的崇山峻岭中，游击纵队与强于数十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

吴静焘与余泽鸿夫妻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双双捐躯，他们的儿子虞蜀江送回常州后，由外祖父将其抚养成人。新中国成立后，虞蜀江一直不知道父母牺牲的消息。直到1983年，才得知父母早已牺牲，虞蜀江悲痛万分，先后前往四川长宁、福建建宁，祭扫父母的英魂。



余泽鸿故居

李文、恽雨棠热血洒龙华

○ 薛焕炳

1950年4月，在上海龙华路2501弄1号，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在地下挖掘出18具完整的遗骸和数具头骨、身骨及肢骨。18具遗骸中，就有常州的恽雨棠与李文。



恽雨棠（1902—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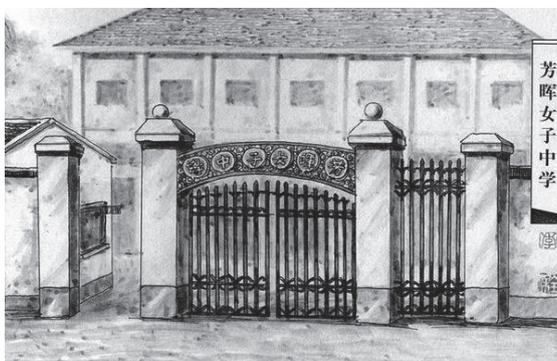
李文（1910—1931）

恽雨棠与李文是一对革命伴侣，他们的遗骸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原来这里曾是当年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1931年2月7日夜，恽雨棠与李文夫妇被秘密杀害，直到此时，遗骸才被发现。

李文出生在武进湟里（埠头）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姐妹8人，6人相继夭折，仅剩李文和一个姐姐。李文为幼女，自幼才貌出众，活泼机灵，在家中特别受宠，坊间邻居也特别喜欢她。李文在乡下读完高小，进城就读于西门的私立芳晖女中。

芳晖女中位于白云溪西段河之南岸，由常州城西庄氏创办。这里曾是庄氏的芳晖堂。芳晖女中是一所新式学堂，当时的校歌这样唱道：“兰陵古名邑，灵秀多毓钟；巾幗蒙教化，私立不让公；欲窥绝学先普通，萁路蓝缕见奇功，顾名思义，芳晖常驻，欣传誉望隆。”

此时的常州城，正处于革命的高潮时期，芳晖女中遂有中共等进步人士存在。李文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芳晖女子中学

1927年春，在这里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李文在武进前黄公学任教期间，经时任武进县委书记徐水亭介绍，结识了同邑西夏墅人恽雨棠。

恽雨棠是1923年由武进董逸湘介绍进入中共的早期党员，弟弟恽玉棠也是共产党员。李文与恽雨棠一见如故，很快坠入爱河，结为夫妻。就在这一年，他们一起到了上海，恽雨棠先后在《红旗》杂志发行部、上海市市政工会工作，而李文则担任机要秘书。不久，他们的宝贝女儿也降生了。

就在此时，恽雨棠因反对极左路线，遭到王明迫害被撤职，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失去工作后的夫妻俩，没有了经济来源，无法养活孩子。再加上二人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生怕孩子牵累，恽雨棠主张把孩子送掉，李文则主张把孩子送到武进母亲家寄养。恽雨棠对李文说：“身为儿女，我们不能孝敬父母，还要他们承担风险，孩子的事就别去连累他们了。”最后，恽雨棠含泪把孩子送到了上海育婴堂。当恽雨棠回到家时，李文已哭成泪人，嘴里念叨着：“孩子是我们的心头肉，哪个人没有骨肉情……？”

孩子送走以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从此没有了消息。1931年恽雨棠与李文牺牲后，恽雨棠弟弟恽玉棠专门去上海寻找孩子，但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多方寻找，仍然没有孩子下落。

话题回到1930年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民国首都南

京更为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先后遭到6次破坏，许多同志牺牲在敌人屠刀下。就在这时，恽雨棠临危受命，出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文本想跟他一起去南京，但考虑到安全，恽雨棠没有同意她同行。

二人相隔两地，见面的机会不多。终于到了来年初（1931年1月21日），恽雨棠去上海开会，李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地点在新闻路福康里623号。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党内却出现了叛徒，情报很快被敌人掌握。敌人将开会地点团团包围。当时情况紧急到何种程度？文件都来不及销毁，敌人就冲了进来，并在开会地点搜出手枪和俄文版革命书籍，与会人员的身份都被暴露。李文与恽雨棠被双双逮捕，押送至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许多朋友读过周文雍与陈铁军的故事，读者常常被“刑场上的婚礼”一幕深深打动，潸然泪下。而李文与恽雨棠就是常州的陈铁军与周文雍。狱中的李文、恽雨棠十分坚强，夫妻二人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敌人没有在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恼羞成怒，于是对恽雨棠夫妇下了毒手。

2月7日晚，恽雨棠身穿长衫，拖着沉重镣铐走向刑场，身边伴随着身怀六甲、即将待产的李文。按照国际惯例，对于怀孕的死刑女犯应从轻处理，起码要待孩子出生后再执行。而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过李文，也没有放过李

文就要出生的孩子。他们从容地向难友一一告别，一路上高呼口号，走向刑场。在敌人的排枪声中，双双倒在雪地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皑皑白雪……

李文、恽雨棠牺牲八天后的2月7日夜，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五位年轻左翼作家，同样在敌人密集的枪声中，倒在了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刑场。

这批英杰牺牲后，鲁迅写下著名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缙衣。

鲁迅先生又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他这样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鲁迅的一字一句，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国民党暴行的强烈抗议。

1934年，囚禁在龙华狱中的革命志士，在牢狱墙上写下



龙华千古仰高风，烈士身亡志未穷
诗篇，悼念恽雨棠、李文等二十四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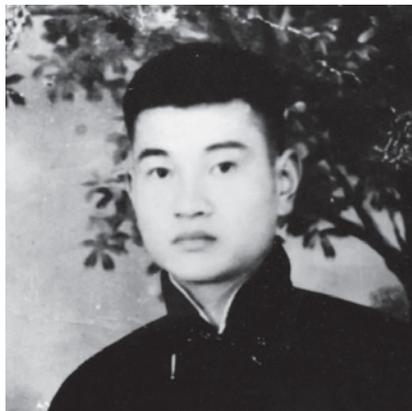
龙华千古仰高风，烈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人民没有忘记李文与恽雨棠，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专程来到武进，给恽雨棠（李文）家送来一石大米、两袋面粉，慰问烈士家属……

王寿生匹马救工友

○ 马 夫

常州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是中国最早形成工人阶级队伍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早开展中国工人运动的城市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常州的工人阶级就发动罢工、罢市，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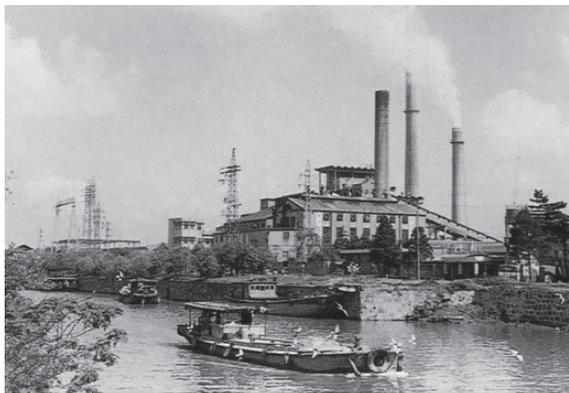
王寿生（1906—1945）

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常州支部成立，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得到了中共的领导。1927年1月，因为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中共上级党组织决定

把中共常州支部提升为中国共产党常州市独立支部，中共江浙区委把富有领导工人运动经验、智勇双全的王寿生，任命为中共常州独立支部干事，领导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

王寿生，二十多岁，在浙江宁波地区的手工业工人家庭长大。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人的种种卑劣行径，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十五六岁时就到工厂做工，受尽剥削压迫。成年后，他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接触到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思想为之一新。当时王寿生的工作单位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就是在电厂，他寻找到了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为了培养王寿生，党组织派他到高昌庙兵工厂学习。经过工人运动实践的考验，王寿生光荣入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崭露身手，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6年
10月，王寿生来到常州后，以常州震华电厂（戚墅堰电厂的前身）外线工和变电间值班员的身份作掩



20世纪70年代的戚电厂

护，秘密开展工人运动。这里要介绍一下民国时期常州与武进的关系。1912年中国民国政府成立，撤消了常州府，因武进县位居常州府之首，称之首县，府县长期同城，所以当时常州就称武进，城仍叫常州。仅仅两个月时间，王寿生凭借国共合作的大好机会，组建了武进县总工会、武进县工人纠察队。并在白云溪附近的仁育桥畔交通旅社，秘密成立了工人运动指挥部，领导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在王寿生等中共骨干的努力下，当时常州重要的工业企业，都建立了工会组织（分会），工人纠察队的骨干成员发展到400多人。

组建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的意义，是把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普及到工人队伍中，激发工人的革命斗志，从而更好地领导与推动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同时，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组建的革命队伍北伐军，兵锋如刃，势不可挡，队伍已经接近常州，需要常州的工人兄弟配合，为攻下常州作军事准备。

1927年3月19日晚上，王寿生接到上级通知：明天北伐军第十七军一师骑兵连及第四先遣团将攻打常州，请常州工人纠察队予以配合。王寿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立即将这个喜讯，通过地下交通系统，通知到全体纠察队员与各分工会负责人。大家按捺不住，纷纷要求连夜行动。王寿生决定召集50名精干队员，趁着夜色，摸到老西门敌军岗哨处。

仔细观察了一下，守军仅有四、五个人，因为是下半夜，

除了一人懒洋洋地倚在城门口，其他人都在边上的岗亭里横七竖八地呼呼大睡。王寿生与另外一个工友轻轻摸到城门口，迅速拿下了站岗的，从他身上搜出4颗手榴弹、一枝步枪、一个装满子弹的武装袋。然后挥手让50名工友把岗亭包围住，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那几个守军睁开睡意惺松的眼睛一看，乌泱泱一片杀气腾腾的人，为首的用步枪指着他们，四五颗手榴弹弦已经拉开，立即瘫倒跪地，乖乖地交出了枪支弹药。

此时，东方曙光初起，一轮朝阳正喷薄而出。王寿生打开常州城老西门。按事先约定，常州地下党的同志们，早已出门十里之外，到江阴地界，接引北伐军。此刻，北伐军第十七军一师骑兵连，披着清晨的霞光，在清脆的马蹄声中，疾风卷地般冲到常州城下，为首的骑兵连连长李长贵大喊一声：“寿生兄弟，我来了！”原来，这个骑兵连连长李长贵，当年与王寿生同为兵工厂的工友，后来被组织上安排去了黄浦军校。今天老友重逢，那是格外的亲热。

控制住常州城里的局面后，1927年3月20日上午，武进县总工会在白云溪边大庙弄原城隍庙旧址挂牌办公，武进县工人纠察队同日挂牌。经中共常州独立支部批准，王寿生同志担任武进县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武进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常州市的工人阶级，首次有了自己的组织与武装。

阳春三月，白云溪边桃红柳绿、轻舟和风，常州的工人

们聚集在大庙弄，喊着革命的口号，打出革命的旗帜，整个常州城沸腾了，万人空巷前来助阵。王寿生在白云溪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报社记者评论说，王委员长代表全市工人的演讲，犹如一块巨石抛进古运河，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常州白云溪中水，今日高歌向东方。

第二天，北伐军一师第四先遣团也进入常州，骑兵连奉命向上海方向进发。白云溪边、大庙弄口，王寿生与李长贵依依惜别，相互勉励等到北伐成功，战友聚首，再痛饮庆功酒。分手时，李长贵说：“寿生兄弟，你现在是武进县的领导人之一了，我没有别的贺礼，送你一匹东洋高头大马，让它陪伴你，永踏革命征程。”说完，留下洋马，挥手而去。王寿生骑上战马，威风凛凛，沿着白云溪策马奔走，常州工友顿时为之自豪不已。

资本家对工人无尽的剥削与压迫，对利润无尽的索取与压榨，早就让常州的工人兄弟怒在心头、恨在胸中。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没有革命的带头人，一直压抑着无边的怒火。自从武进县总工会在大庙弄挂牌办公，常州的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争取8小时工作制、要求废除童工与包身工、提高工人福利与薪水，成为常州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

资本家们当然不愿意放弃利益，他们慑于工人运动的大势，不敢公开对抗，但暗中却相互勾结，用各种手段，企图

瓦解工人队伍，破坏工人运动。4月4日夜间，王寿生等工运领导人，正在武进县总工会里商量如何打击资本家破坏工人运动的有关事情时，一位工人兄弟急如风火般冲进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王委员长，不好了，总工会派到通成纱厂的代表，被老板抓起来了！”

王寿生说：“兄弟不要急，有话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报信的工人说，自己是通成纱厂（即大明纱厂）的，总工会代表到厂里，发动厂里工人兄弟与资方谈判，要求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废除侮辱工人的下班抄身制度，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等。没想到资方老板张伯桂，胆大妄为，竟然勾结丁堰地区的恶霸毕幼泉，纠集了近百名流氓，把工人队伍驱散，打伤多人，还把总工会的两个谈判代表抓了起来，说是要工人们立即停止闹事，否则就要这两个代表的命，杀鸡儆猴。

王寿生听完情况，浓眉紧锁，陷入思考。时值深夜，无法及时召集工人纠察队，身边只有几个工友，办公室也不能没人值班。但被抓的工会代表，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出事，责任在谁身上，可能无法说清。此事若不及时处理，明天消息传出，各厂资方争相效仿，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肯定会因此受挫。怎么办？

思考再三，王寿生决定孤身上阵，营救工友。他对报信的那位工友说：“这样，你赶快回去，叫上些可靠的工友，

到工厂边上等我，听到我开枪，就跟着喊口号，然后冲进去营救代表。”说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工作后，牵过系在河边柳树上的战马，飞身而上，向通成纱厂方向火速奔去。

来到通成纱厂，王寿生看到有几个流氓站在厂门口，装模作样地做出保卫人员的腔调，驱赶围观的工友。不见则罢，一见如仇，王寿生掏出手枪，朝天就是一枪，大喊一声：“赶快释放工会代表！”然后策马冲向流氓。工友们看到王寿生，如同见到亲人，立即跟着大喊：“释放工会代表，不准欺负工人！”

那几个流氓哪里见过骑马挎枪的真家伙，以为是北伐军来了，吓得屁滚尿流，逃得无影无踪。厂里还有一些守夜的流氓，见到门口的守卫连滚带爬逃进厂来，连忙关上厂门，企图顽抗。王寿生策马上前，用骏马前蹄一脚踢开，冲进厂内。又大喝一声：“张伯桂、毕幼泉，把总工会的代表交出来！”

听到王寿生的怒喝声，身边的工友都跟着大喊口号，厂里上夜班的工友们也全部冲出车间，向关押工会代表的地方奔去。那些原来神气活现的流氓们，一见这阵势，立即作鸟兽散，跑了个一干二净。张伯桂与毕幼泉正在办公室里得意洋洋地喝茶庆贺，听到王寿生的马蹄声，毕幼泉知道不是对手，连忙从窗户里跳出去，想要逃跑。张伯桂见大势已去，也想跳窗户溜走。王寿生朝天一枪，喝道：“哪里逃！”张

伯桂与毕幼泉立即瘫倒在地，不敢动弹。

工友们把关在黑屋子里的两个工会代表救了出来，把张伯桂、毕幼泉拿住，押到工厂院子里，王寿生对工友们说：“工友们，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现在我们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组织，武进县总工会就是咱们工人兄弟的主心骨。张伯桂不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勾结地方黑恶势力，非法拘禁我总工会代表，拒不承认工人的合理要求，现在，我代表武进县总工会、武进县工人纠察队宣布，我们要在总工会门口，公审不法资本家张伯桂和黑恶势力头子毕幼泉，保证工人兄弟的合法权益，把工人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

这时，夜幕褪去、曙光初现，正是太阳初升的时辰。通成纱厂的工友，在王寿生委员长及总工会代表的带领下，迎



20世纪80年代，戚电厂立起一座王寿生的石雕像

着万丈霞光，把不法资本家张伯桂与恶霸头子毕幼泉，押到了武进县总工会门口，就在白云溪边摆开审判台，公审了这两个破坏工人运动的首恶。

王寿生匹马孤身救工友，在常州城里传为神话，大大增强了总工会的威信与力量。而白云溪边公审恶霸的举动，让常州地区的资本家和黑恶势力，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再也不敢公开搞破坏了。常州地区的工人运动，从此开展得如火如荼、不可阻挡。

恽长安变卖田产办中学

○ 王祥元



恽逸群铜像（1905—1978）

常州城内曾经河流众多，其中的白云溪一路西流到白云渡，又拐了个弯穿过迎春桥和北水关桥，向北继续流向城外。迎春桥和北水关桥之间的河边有两条弄堂；一条是周家弄，一条是药庙弄。药庙弄因弄内有一座药皇庙而得名。寻常巷陌，人道恽长安曾办学于此。

恽逸群，字长安，武进县马杭乡上店人也。生于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幼熟读诗书，年轻时到上海大同大学求学。1978年12月10日病故，享年73岁。

恽长安曾经变卖田产，开办逸仙中学于药皇庙。他为什么要变卖田产办学校呢，事情的原委要细细道来。

1924年，孙中山先生倡导新“三民主义”，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那时候，国民党员可以参加共产党，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当时，恽长安在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一年后，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被迫辍学，到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技术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又毅然前往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随即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奉命回武进县组织第一区支部，任执行委员。他回到常州城南老家上店，创办都家桥觉农小学，指派共产党员张云鹤任校长，学校作为一个落脚点，接纳从上海、无锡、宜兴等外地秘密转移来的一些中共党员。国民党武进县党部成立后，恽长安担任执行委员、常委、宣传部长。1926年8月，他又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他以国共党员的双重身份从事革命斗争。

1927年1月底，为了加强城乡党组织的统一领导，由徐水亭、恽长安、王寿生三人组成中共常州独立支部。徐水亭任书记，恽长安负责国民党工作，王寿生负责工人运动。同年春，北伐军到达了常武地区，恽长安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身份领导革命斗争。

正当北伐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

共产党员遭杀害。4月14日，驻扎在常武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也挥刀斩向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公开通缉徐水亭、王寿生等人。“清党”后的国民党武进县党部，恽长安身份尚未暴露，仍担任商人部长兼青年部长，公开身份仍是国民党县党部的核心人物。

为了更好地开展隐蔽斗争，恽长安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身份，留在武进县党部特别行动委员会。他又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作为职业掩护，一来可以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二来可以掩护和安置一些革命同志。但是，要创办一所学校，谈何容易，至少要先解决四个问题，即学校办何处，钱从哪儿来，聘请什么人，当局能否批。思前想后，他想到一个主意：把学校办在药皇庙。

药皇庙原称神农庙，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到了近现代，医药事业发达了，祈求神灵保佑的祭祀慢慢淡出人们生活视线，已少有人光顾祭祀。与药皇庙一墙之隔有座恽氏宗祠，也已破残不堪。恽长安想到了此处房屋可以利用，以减少办学成本。于是把药皇庙大殿、厢房、戏楼都做成教室。

校址选定了，学校也开办了，日常的运行费用又从哪儿来？由于当时中共组织不健全，上级组织没有能力下拨办学经费，恽长安只得自己想办法。他背着可能被族人给以“败家子”的骂名，把上店祖上留下来的80亩田抵押出去，筹到1000多银元；个人又借了数千元，作为办学经费。



逸仙中学旧址

校址选定了，经费也有了，学校能不能批准，又是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恽长安是以私立中学开办，当局控制很严，必须经武进县教育局核准才行。他想了一个办法：以国父孙中山的号“逸仙”作为校名，借以表达追随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愿将其精神发扬光大，这样当局就不能轻易反对。果不

其然，武进县教育局核准了他的申请，逸仙中学终于办了起来。

逸仙中学开办了，聘请谁来掌舵，聘请哪些人来当教员呢？这里需要说说筹办时期的社会形势。1927年4、5月间，到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乌云压城。到了6月，常武地区革命形势有了转机，原来武进县长由顾树森来接任了。此公原是中华职业学校校长，曾经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上任后，他就委任原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教师徐震（又名徐哲东）为武进县公安局长。顾、徐二人都主张“好人政治”，认为“好人联合起来，反对坏人，不管什么党什么派”。中共常州独立支部书记徐水亭，曾经是徐震在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执教时的学生，与县公安局督察长陆宝龄又是同学。到了7月份，

中共江苏省委派顾修回家乡筹建中共武进县委，而顾修也是顾树森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执教过的学生。这样一来，恽长安在常有了人脉。

逸仙中学校长人选，恽长安首先想到了教育界知名人士陈一梦。陈一梦曾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学生，由此人执掌学校，无话可说。他又聘请北大理科毕业生黄竹箴为教务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杨锡类为事务主任。杨锡类本来是反动派通缉的对象，顾树森接任县长后，全部解除了前任内通缉的中共党员名单，杨锡类又可以公开出面了。恽长安让他进了逸仙中学，不仅解决了他在校内的落脚点，同时还有合法的身份作掩护。恽长安自己则担任训育主任。

逸仙中学还聘请了三个国文教员，其中一位叫李渺世，是武进县党部宣传部长，曾经毕业于北大文学系，让他来执教，可以麻痹反动当局。另外聘请了英文教员，理化教员，生物教员，艺术教员，史地教员。这些教员中，有的毕业于北大，有的毕业于南方大学，有的是民国大学；也来自省立第五中学（即现在的省常中）、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和苏州女子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从这些教员的毕业学校来看，逸仙中学的师资力量是相当不错的。20余位教职员工中，有6位是中共党员。社会学教员沈伯英就是中共江苏省委派来的，由他讲授经共产党修改过的《新三民主义》课程，恽长安讲授由恽代英编写的《国民革命》《政治学概论》课程。

逸仙中学共设4个班，招收学生120名，而且特别之处在于男女生合班上课，开了辛亥革命后常州教育的先例。初一初二初三各一个班，高中一年级一个班，于9月1日正式上课，恽长安聘请的校长陈一梦和其他教员及时走马上任。

逸仙中学教学课程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通行学制确定的，讲授的具体内容上却有别于其它学校。例如“党义”课程，初中班重点宣传“新三民主义”，讲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高中班课程内容则按照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所编的《政治教材》讲授，并向学生介绍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内容。

逸仙中学校园内充满了朝气。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涨，他们在校园内高唱《国际歌》，歌声飞出校园。逸仙中学同时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恽长安担任支部书记。学生们不仅在校园里开展有进步意义的文娱活动，他们还经常外出宣传革命主张，散发向剥削阶级开展斗争的传单。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策划并唆使成衣工会秘书戴天道、徐联如印制了“反共产主义铁血团警告书”，准备向社会散发，并在传单中直指武进县青年协会和逸仙中学是共产党机关，陈一梦、恽长安、杨锡类是共产党。10月23日，这批传单在青果巷一个姓金的成衣铺被发现。逸仙中学党支部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先发制人，以“妨碍社会秩序暨各个人安全名誉”为由，提起诉讼。结果，诉讼赢了，戴天道逃离常州，徐联如被收押等候处理。这一诉讼斗争有力地打击

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一个月以后，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又迅速恶化。县长顾树森和公安局长徐震受到指责与排挤，11月25日，被迫离职。接任的武进县长一上任就流露出反动嘴脸。12月30日，新任命的武进县公安局长在到任的第二天晚上，就组织全城大搜捕，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会骨干，逸仙中学也被搜查。

在此之前，恽长安已得到风声，国民党武进县当局将要到逸仙中学采取行动。为了掩护逸仙中学，他在报上发文，声称自己因病离开此校，学校交由校长陈一梦全面负责，他与一些中共党员随即离校，转移到乡下，幸免于难。

国民党当局在逸仙中学并没有搜查中共活动的“罪证”，但仍不死心，继续对学校进行监视。1928年2月初，中共武进县委书记顾修辞职，恽长安接任县委书记。2月20日，江苏省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给武进县公安局发指令：“查办逸仙中学，系恽长安、陈一梦等。”“拿获恽长安……等十名”。在此之前，已有人向反动当局供述：“共党机关常州共有两处，一处设在逸仙中学，一处设在电话局。”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于中共常州党组织来说是致命的。

2月24日，武进县公安局侦查到恽长安等将在常州城内露面的信息，采取夜间偷袭的办法，将恽长安、陈一梦等逮捕，第二天，就急不可待地将他们押送到南京报功。陈一梦在南京拘押了一段时间，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担保，在3月7日释放；

恽长安也由亲属向国民党上层疏通，也于3月22日被释放。自此，逸仙中学被迫停办。

陈一梦回常州后，担任了江南中学校长，逸仙中学部分教员学生转到了这里。1929年，江南中学也被勒令停办，其罪名是“宣传过激言论”。校长陈一梦等一再申辩，未能挽回，不得已只能在青果巷另立辅华中学（市第三中学前身）。

再来说说恽长安的情况。他在3月22日被释放回到常州，在4月8日，被中共武进县委连任为县委书记，一直任职到1931年。后来由于形势需要，党组织派他到上海，于是改名为恽逸群，进入上海新闻界，以笔代枪，写出许多新闻报道，成为著名的新闻界的抗日战士。

私立逸仙中学从创办到被迫停办，虽然只存在了6个月时间，但恽长安变卖田产办学校，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恽长安借办学校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地方革命骨干力量。

今天的中山路小学，就是当年逸仙中学旧址，



中山路小学校园一角

现在成为局小教育集团的核心成员，也是常州市知名的小学之一，正培养着一代代莘莘学子和革命事业接班人。

恽逸群是常武地区革命斗争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担任过中共武进县委书记，担任过中共宜兴县委书记、浙江省萧山县委书记、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担任过华中新闻学校校长、《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随解放军部队进入上海，担任《解放日报》总编和社长，还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解放，他已走过了二十三年不平凡的岁月。期间两次坐牢，多次险遭暗杀。终于等到抗战胜利，等到新中国成立，恽逸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功不可没。



恽逸群在《解放日报》与干部谈话

常州中学三俊领导宜兴秋收起义

——万益、史砚芬、陈伯麒在宜兴暴动中

○ 张浩典

泱泱民国，礼乐靖戈矛。
 多少英才硕彦，热心作育费绸缪。
 我延陵旧治，十字碑，二泉水，长桥剑，文物炳千秋。
 中有峨峨讲舍，中校髦士咏薪樵。
 更农林工化，步趋欧美，膏晷可勤修，
 庶他日珍奇辉媚，铜峰笠泽导源流。
 勉兹学子，毋贻祖国羞。

这是江苏省立五中校长童伯章为学校创作的校歌歌词，校歌描绘了常州（包括府属无锡、宜兴诸县）的风光，歌颂了家乡的光辉历史，充满了对莘莘学子的无限希冀，勉励学生“毋贻祖国羞”。这铮铮作响的教诲，怎能不激起学生为中华崛起而发奋学习的热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白云溪东端的玉梅河畔，常州府利用护国寺旧址，创建了常州府中学堂。民国建立后，先后易名江苏常州中学校、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学校一经创立，校务如日中天，校友人才辈出。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国学大师钱穆、刘半农、刘天华、吕叔湘、周有光，等等。其中，还有来自宜兴的三位校友万益、史砚芬和陈伯麒，在大革命时期，他们犹如歌中唱到的是一把“长桥剑”，刺破黑暗的夜空，迎接黎明前的曙光。

这是一座有着革命传统的常州名校。当年同盟会会员屠元博留洋回国，被聘为监督（校长）。屠元博利用学校这一阵地，向学生灌输民主爱国的新思想，让学生树立报效祖国的新观念，在全校师生中产生很大影响。尽管屠元博后来离开学校，但民主爱国的校风在省立五中形成气象，万益、史砚芬和陈伯麒就是深受影响的优秀份子。1927年11月，三人成为领导宜兴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在江苏革命斗争的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

万益（1902—1927），宜兴宜城镇人。1917年考入省立五中，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甚一日。万益经常与同学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说：“要救中国，雪国耻，只有建立新式的军队。”于是，他利用课余时间，练就一手好拳术，

为将来从军作准备。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发动全校师生罢课，召开五四纪念大会，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利用暑假组织同学们到宜兴，演出话剧《假洋鬼子》，宣传新思想。他扮演了其中的朝鲜人，演得惟妙惟肖。当演到他被日本侵略者打得口鼻流血时，侄女看到后急得直哭。事后，万益对她说：“哭是最没用的表现，将来等你长大了，去参加反抗斗争。”

1921年，万益在省立五中毕业，在苏州医学院找到一份工作。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和孙逊群、陈叔璇等到江阴周庄等地组建国民党区分部，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7月，受党组织委派，以宜兴中学图画、体育教师为公开职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1月，又受中共上海区委委派，到川沙、奉贤等县和法南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到常熟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同年10月，万益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江南秋收暴动行动委员会”会议决定，回宜兴担任了农民暴动总指挥。

史砚芬(1903—1928)，又名余晨华，江苏宜兴人。早年丧父，家境贫穷。1923年在常州市立五中毕业。他原本希望在家乡普及乡村教育，以祠产的一部分，办一所小学。没想到的是，同族中的史姓豪绅横加阻挠，未能如愿，于是萌发改革社会之念。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宜兴，在与北伐军的交往中，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转为中共党员。

陈伯麒，宜兴丁蜀镇人。陈家是丁山一带的大窑户，除经营窑业外，还在丁山开设了“陈德隆”窑货行。他的岳父是宜兴有名的地主。1917年，陈伯麒在常州省立五中毕业。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将发动各地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中共江苏省委召



宜兴农民秋收暴动纪念碑

开会议，制定了以宜兴、无锡为重点，首先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中共宜兴县委随即成立了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的最高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万益与史砚芬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起义行动委员会决定于11月1日举行起义。

1927年11月1日上午，万益、史砚芬等人按照原定计划，指挥各路农军以分散隐蔽的方式，陆续进城。上午10时，暴动民众数千人在县立中学操场集会，宣布举行暴动。起义民众迅速占领了国民党县政府，宣布废除旧政权，提出6条新政纲，建立了革命的农民县政府——宜兴工农委员会，并推举万益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会场上一片欢腾，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这天中午12时，万益登上县署门前的一座高台，举起手枪，连发3枪，暴动队伍闻声而起，高举红旗，臂缠红布条，手持刀枪、锄、耙、棍棒等武器，高呼“农民革命万岁！”“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暴动部队相继攻下县署、公安局和商团团部，县城基本被暴动队伍占领，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县署上空高高飘扬。

暴动队伍占领县城后，陈伯麒和其他同志组成了宜兴县人民法庭，对捕获的土豪劣绅进行审判，并处决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4名地主。此外，还当众烧毁了田契、租簿和借据，劳苦群众无不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宜兴秋收起义(油画)

第二天，国民党南京政府闻知宜兴农民暴动，火速调遣军警，赶往宜兴进行镇压。11月2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面临的严峻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定不再困守孤城，而是主动撤离宜兴，退往浙江长兴，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继续与敌人斗争。

11月3日凌晨，万益率领起义的骨干队伍100余人，转移到宜兴南部张渚山区和浙江长兴县境。尚未站住脚跟，却因人告密，11月5日，万益、陈伯麒、蒋三大3人在长兴县访贤村被捕。

万益、陈伯麒等被捕后，敌人恨不得立刻将他们处死，但害怕群众再次起事，于是待到11月22日再动手。凌晨4

时左右，敌人将万益、陈伯麒、蒋三大押解到公共体育场。途经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时，万益深情地说：

“这是我的母校。”

临刑前，万益、陈伯麒等高呼“中国共产



宜兴起义时的臂章

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响亮的口号回荡在黎明前暮色中。此时枪声响起，烈士的献血染红了大地。万益年仅25岁，陈伯麒年仅30岁。

万益牺牲后，省立第五中学校长童伯章，用篆体书写墓碑“万益之墓”，纪念为革命牺牲的学生，墓碑至今竖立在宜兴革命烈士陵园。

万益的宜兴同乡、省立第五中学同学储师竹，得知自己的挚友遇难，万分悲痛，作一曲《西城柳》以纪念，创作手稿中如是记述：“万益不幸被捕，在宜城西城角（体育场）英勇就义。知友遇难，耿耿于怀，遂作此《西城柳》一曲，以志纪念，而励来者。”限于当时险恶的环境，歌词含蓄，寓情于景：

西城柳，弄轻柔，思良友，泪凝眸。

记自离亭分手，忽忽春将旧。
空有青山如绣，空有青溪似酒。
我这漠漠的心波呀！几曾被春风些儿吹皱？
春将旧，君知否？
碧野朱桥当日事，梦一般不堪回首，
只云树悠悠……

再说另一校友史砚芬，宜兴秋收起义失败后，他辗转至上海，被分配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担任沪宁沿线巡视员，不久，担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活跃在南京各大校园内，领导大学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大学支部会议时，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化名余晨华，严守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多次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史砚芬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于是在狱中给弟弟妹妹写了两封感人肺腑的诀别信。

1928年9月27日，史砚芬挺胸昂首，一面向难友挥手告别，一面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主义胜利万岁”，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史砚芬牺牲后，亲人冒着危险前去收殮遗体，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了没能寄出的那两封血色家书。诀别信字字句句迸发出烈士深邃的光华，表达出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

想献身的崇高精神，以及对革命事业坚定的信念：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抵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灭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解我的苦衷而原谅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姐姐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她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固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白云溪哺育姚依林

○ 马 夫

1917年12月，江南地区已经百花落尽，但人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当时叫作“琼崖”的首府海口，还是鲜花盛开。人们在温暖的海滩边捕鱼晒网，享受收获带来的喜悦。日常生活的快乐，本来是大家都拥有的幸福，可是，琼崖警察厅的办公楼里，却乱成了一团。居民们好奇地去打听，原来，前任广东省警察厅厅长、现琼崖水警厅厅长、陆军中将姚捷勋，因病身亡，年仅36岁。

姚捷勋于清末时，官至江苏候补道。清末民初，出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后因警务出色，调任北京，出任顺天府督捕局总办、京兆巡防营务处处长。辛亥革命前夕，出任广东警务处处长兼广东省警察厅厅长。孙中山发起“护法革命”时，因护法有功，授三等文虎章和三等嘉禾章，荣膺陆军中将军衔。为了整顿琼崖地区，又出任琼崖水警厅厅长。劳累过度，

英年早逝。

于琼崖海口的日常生活，姚捷勋的去世，不过是某一个早晨的不幸事件而已，对于姚捷勋的家庭来说，却是一场灭顶之灾。由于姚捷勋为官清廉，且一直资助孙中山革命，身后没有留下财产。姚夫人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儿子姚克广，只有三个月大。生活立即失去了依靠。捱过了旧年春节，1918年初夏，姚夫人扶老携幼，抚柩北上。费了三四个月时间，其间历尽艰难，才来到了江西姚氏老家，把姚捷勋安葬于南昌邓家埠小桂花山。

葬礼上，姚捷勋的兄弟亲属都来了。姚家是个大家族，代代英才辈出。此时，姚捷勋的二哥姚绍枝，清末进士，刚刚出任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县长。五弟姚国桢，曾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中华民国交通部次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六弟姚震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司法总长等职。姚捷勋逝世后，几位兄弟都邀请姚夫人到自己家中生活，帮助抚养姚家后代。最后，姚夫人选择跟随姚克广的二伯父姚绍枝生活。

为什么姚夫人选择到常州生活呢？是因为姚绍枝介绍说，常州城市处在上海与南京之中，揽长江扼太湖，称“中吴要辅”，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宜居之地。因为历史上名人辈出，又称是“千载读书地”。武进县与常州府同城，县衙设在城中著名的白云溪边。这条白云溪，明清以来，沿

河出过五个状元、七位公卿。半湾都是诗人屋，人称“江南文脉”。王安石当年做常州太守，住在溪边，写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形成了变法思想。大文豪苏东坡的终老地，就在河边。如果在这条溪边培养孩子，那真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有话说”的事情。

1918年年底，姚夫人带着孩子，投亲来到常州白云溪边的武进县衙里，跟着孩子的二伯、时任武进县知事姚绍枝生活。常州城中白云溪，不但是一条著名的江南文脉，也是常州城中



白云溪上人家

风景绝佳之地。眼见着年底一过，江南的春天就来了。白云溪边的柳树是柳垂金线，桃树是桃绽胭脂，河水是碧映白云，轻舟是画中墨点。姚夫人是第一次到典型的江南地区生活，被白云溪边的景色吸引，经常带着孩子在溪边玩耍，享受江南春色。

姚捷勋留下的孩子中，姚克广长得最讨人喜欢，团团脸胖乎乎的像个年画中的胖娃娃。长大后，姚克广还有个绰号

叫“姚胖子”，这当然是后话了。刚会走路的、胖乎乎的孩子最令人怜爱了，所以大人们都喜欢去抱抱。某天，姚夫人带着姚克广在溪边闲步，一个人走过来，对着孩子看个不停。姚夫人感到奇怪，说先生你看这孩子……那人说，这孩子长得讨喜，我可以抱一抱吗？姚夫人就把姚克广递给那个人。那人抱了抱，把孩子还给姚夫人，说这孩子好好养，将来会有大出息。

姚夫人听出话来，就说谁家的孩子不好好养呢？这孩子怎样才算好好养，还要先生指点。那人说，天机不可泄露，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孩子的好好养，就是要在白云溪边住满5年以上。至少5年之内，不要离开常州，不要喝别处的水。用白云溪的水养他。说完，飘然而去。姚夫人体会了一下，心想，这是个高人吧。白云溪水养5年以上，与二伯姚绍枝说的白云溪是江南文脉，大概是一个意思。这孩子三个月就没了爹，要想有出息，就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好好读书，就要多喝白云溪的水。道理是通的。

从1918年年底，到1925年年底，姚克广在常州住了7年。白云溪的水，姚夫人让他足足喝了7年。1926年，姚绍枝卸任武进县知事，到上海去生活，姚夫人带着姚克广也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学校的考试，一举中的，被上海几个学校同时录取。姚夫人心想，那位高人说话真是有用，7年白云溪水，不是白喝的。

白云溪水不是白喝的，体现的效果，还不是上海的学校。1934年，姚克广考中了北京清华大学，举家欢庆。何也？那年小克广只有16岁，简直就是神童了。更神的是，1935年，17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阴谋，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个17岁的学生，有此成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但白云溪哺育的孩子，成就肯定不止于此。1936年5月，姚克广到天津，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领导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克广调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宣传部长。1938年，他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1939年2月，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7月，出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这一年，姚克广只有22岁。



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汽成立 30 周年之际，陈祖涛陪同姚依林（前排左三）参观

白云溪边风景谱，半河都是公卿家。喝了 7 年白云溪水，在名人辈出的常州城里养育了 7 年，后劲当不就此止步。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姚克广先后出任贸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商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1978 年年底，姚克广出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1979 年 7 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引进智力领导小组组长。1987 年 11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没有姚克广同

志的名字，这是因为，按姚氏家谱排列为“克”字辈的姚克广，参加革命工作后，为了地下工作的原因而改了名，改名后的姚克广叫姚依林。人们未曾想到，姚依林就是当年常州白云溪水哺育过7年的姚克广。

千载读书地，悠悠白云溪。姚依林同志的生平，姚克广在常州白云溪边7年的幼时生活，以及其后的革命生涯，可以说，又为常州城中白云溪、为这条千年江南文脉凭添了一段传奇。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地委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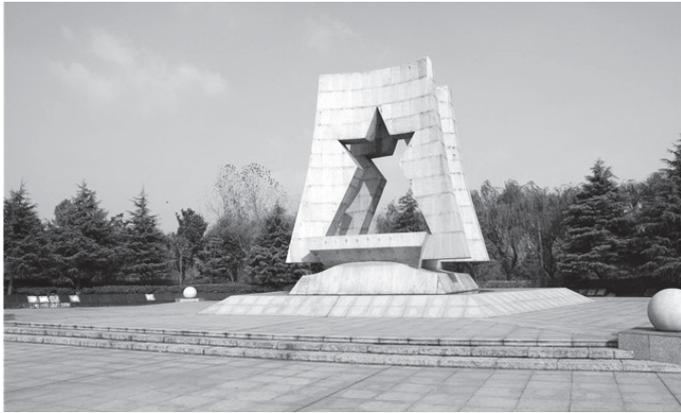
○ 王祥元

说起英雄群像雕塑，也许你瞻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也许你拜谒过雨花台烈士纪念碑，也许你曾伫立省常中青年广场赞美过“二杰”纪念雕塑。我这儿说的英雄群像雕塑，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塑造出来，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用热血和汗水，在龙城大地上，在常州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他们就是常州地委、专员公署的一群人民公仆，名字叫吴觉、辛少波、李干城、梁岐山、张一樵、陆平东……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 72 年前常州地委、专员公署的同志们的一些往事。

解放常州城 建立新政权

1949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过江后，



解放常州第一仗潘墅之战烈士纪念碑

三野二十八军在武进舜过山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激战；4月22日凌晨，解放军二十三军在武进潘墅遇到敌军抵抗，我军一举打进敌军师部，击毙敌军师长，敌军向南溃逃，潘墅老街留下的“弹洞前村壁”就是历史的见证。

隆隆的炮声响了一夜，4月23日清晨，三牌楼附近的私立淹城中学（后改三初中，今少年宫处）工友朱德全走出校门，到旁边的体育场门口，想打探一下虚实，发现驻扎在体育场附近的国民党部队连夜逃走了。而人民解放军华东警备第六旅的先头部队进入常州城，并与中共武进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讨论做好接管城市的的各项工作，驻扎的地点就在今天的大观路（今武警支队驻地）。当时，二十三军侦察营也穿越常州城南下，常州城宣告解放。

4月28日，常州市军管会和常州市警备司令部同时成立，

吴觉任军管会主任，张克辛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同一天，中共苏南区常州地方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州地委）、苏南区常州行政专员公署（以下简称专署）同时成立，吴觉任地委书记，陆平东任公署专员。常州地委、专署设在白云溪畔的大庙弄内，这可是常州市（县级）及武进、无锡、江阴、宜兴、溧阳和金坛6个县的首脑机关。

28日这一天，中共常州市委和常州市人民政府也成立了，地委副书记辛少波兼任市委书记，诸葛慎任代市长，常州市区的龙城、名山、青山、荆川等八镇设立了镇人民政府。

常州城乡解放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百废俱兴的局面。事情千头万绪，从何抓起，常州地委按照上级指示，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全面接管城市，重点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为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做好准备工作。



解放军进入常州城，部队行进在局前街上

话分两

头，先说说地委干部从哪儿来。

地委书记吴觉是个高个儿四方脸的淮阴人。当他率领华中六分区 2000 多名南下干部接管常州时，这个 37 岁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1949 年 2 月中旬，华中六分区开始着手抽调各级干部，于 3 月 9 日到淮阴集中培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



解放常州“第一船”锦旗

守则，以提高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这批南下工作队中，有 200 多名准区级以上的地方干部，配备了 5 套县级班子和 40 套区级班子。4 月底，华中工委又从六分区抽调各级干部 426 名，在淮阴小营集中培训，准备派往苏南的有关县、区、乡三级；另外一批准备接管常州市的南下干部，在 1949 年 3 月下旬，集中在泰州东南的张甸，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接管城市的政治、社会情况。

接着要说地委副书记辛少波，他同时兼任常州市委书记，时年 35 岁。辛少波是山东莱阳人，长得又高又瘦。别看他年轻，

却有着非凡的革命经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家乡毅然加入共产党，后来在胶东参加开辟南海敌占区的敌后武装工作队。解放战争期间他已经担任南海地委书记。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他不怕牺牲，机智灵活。现在进城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了，他又一头扎进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繁重工作。

再了解地委副书记李干成吧。他是江苏涟水县人。旧中国的涟水县是苏北最穷最苦的地方，他儿时深受封建社压迫和剥削，后来在新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投身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的他，奉命于1930年进入苏北一带，组织农民暴动，历任宿迁县委书记、兼红十五军三师管区政委；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1937年抗战爆发，曾由于叛徒出卖而入狱，后被释放回乡。1938年李干成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他发起成立了涟水县抗日同盟会和抗日义勇队，任理事长和队长。后义勇队编入八路军，成为抗日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淮海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淮海战役中，他大力发动群众，日夜为前线部队运送物资。过江后进入常州，担任起常州地委副书记一职和后来的代理书记。地委、专署一班人马又为建立新政权而忘我工作，日夜操劳。

解放军一进城区，随即到处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委、专署、



音专管弦乐队与青年联欢，庆祝常州解放

军管会的命令和指示象雪片一样从地委驻地飞出，庙沿河边，大庙弄口，军管会里，人来人往，一片忙碌紧张的景象。

在进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地委、专署和军管会采取了哪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呢？现摘录进城后第一个月大事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吧。

4月30日 市军管会发出银字第一号布告，规定市场交易以人民币为本位币；5月12日前暂准金圆券流通。

5月3日 市军管会接管全市公立中小学及国立音乐院，取消公民、军训等课程。

5月6日 市军管会决定恢复交通警察，维护交通秩序。

5月8日 长途汽车恢复行使。

5月11日 召开常州市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常州市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同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常州市筹

备委员会成立。

5月15日 召开常州市首届学生代表大会，成立常州市学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同时，开展支前献粮活动，10天内各界献粮166.91万斤。

5月22日 市收容所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1703人。

到5月底，常州市的城市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军管会成立清查物资整理委员会，将收缴的资金、财产分别转交有关部门，武器弹药军队器材上缴警备旅供给部，房产家具上缴军管会房产管理处，其它物资上缴军管会仓库。

在接管的初期，地委、军管会分别举办职工训练班、青年训练班、财经训练班，培养干部，壮大积极分子队伍，做好建立基层人民政府的准备工作。

基层人民政府的改造和建立从取消保甲制开始。解放初期，户籍管理基本沿用解放前国民党武进县城区的8镇114保1326甲建制。5月26日军管会公布《暂行户口管理规则》，对城区的保甲长采取集中受训、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教育，继续沿用原有户籍管理模式。1950年1月，则采取户籍制度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开。

保甲制度废除后，在城市建立居民小组，在居民小组的基础上，根据地段，又建立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居委会主任。在农村，则建立村委会，基层民主政权逐步得到巩固。

稳定金融物价 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期，全市的财经、金融、物价形势十分严峻。一是物资奇缺。当时政府掌握的物资严重不足，而献粮支前任务却相当繁重，财政收支不平衡，人民币币值不断下跌；加上投机商兴风作浪，造成物价连续上涨。二是金银黑市猖狂，金融市场混乱。解放伊始，市场上一切计价以黄金银元和实物为主，银元投机活动猖獗，大小工商业几乎无不卷入。银元价格直线上升，1949年4月29日，城内一块银元由金圆券45万涨到100万。

面对险恶的金融形势，常州地委、军管会采取果断措施，巩固人民币币值，稳定金融物价。4月30日，市军管会发出银字第一号布告，规定市场交易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后又发出第五号公告，下令禁止银元买卖及用银元标价，5月12日前暂准金圆券流通。6月，军管会作出平抑物价的四项紧急决定。刚成立的国营建中贸易公司向职工、老师、学生及机关工作人员配售平价口粮。8月1日，市人民银行奉命实行米、面粉、布、食油、硬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按折实价格计算，并且承办折实储蓄。打出一套“组合拳”后，市场迅速稳定，6月15日以后，物价逐渐下跌。

投机势力在“银元之战”失败后，又把投机活动转向棉纱、大米、面粉方面，接连掀起棉纱米面粉跟涨风，引起第



1950年10月1日，全市各界人士在省常中操场集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

二次物价大波动。地委、军管会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平抑物价。投机商和不法资本家在“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失败后，从此一蹶不振，国营经济与投机势力在反复较量中发展壮大，逐步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

在稳定金融物价的同时，常州地委、专署、军管会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开展了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的艰苦斗争。

解放后，遗留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活动猖獗，由华东警备六旅改编的常州军分区和警备司令部坚决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抽出相当兵力剿匪肃特，恢复城乡秩序。1949年7月，常州军分区派部队对太湖地区的匪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清剿，共毙伤匪特47人，俘虏1246人，120名匪特投诚，收容散兵游勇3300余人。

逮捕的匪首张少华于1950年3月17日被公审枪毙。《常州民报》刊登此消息后，广大市民拍手称快，称赞共产党为老百姓消灭了匪患。至1952年底，常武地区的剿匪肃特基本结束。

1950年10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常州地委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这场运动。

首先是舆论造势。在人民民主专政和舆论压力下，有516人在限定时间内办理了登记，同时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而拒不登记被检举揭发的5名证据确凿、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被公审判决死刑。

其次是发动群众。1951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地委组织全体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纷纷写信检举揭发。4月27日，苏南各市统一行动，集中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4月29日，驻常部队及全市公安干警、民兵1万多人举行检阅和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反革命。同日，公审判决了3名罪犯。5月3日以后，全市又成立了115个基层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和290个肃反小组。随后又举办了人民反对敌特展览会，展出了许多实物和100多幅图片，先后有8万多群众参观。镇反运动中，许多行业分别举行控诉反革命分子大会，受害者本人或者亲人的控诉，激发了大家的仇恨，继续检举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光常州市公安局就收到1

万多封揭发信。常州市政府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市公审大会，枪毙了一批恶霸、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首。地委所管辖的县都同样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四面楚歌，纷纷落网。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常州地委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常武地区的一贯道活动最为猖獗，危害最大。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地委、专署、常州市委已基本调查清楚了一贯道会门的组织、活动情况，摸清了其上层分子的活动场所，比较系统地整理出他们的罪恶历史与现行反革命罪行。

1953年2月7日，市军管会颁发取缔一贯道等5个反动会道门的布告，宣布予以取缔，逮捕法办了作恶多端的反动道首30人，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反动会道门彻底崩溃。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反动会道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有力地配合了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被侵略的威胁。中共中央随之果断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常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8月1日，各界市民4万余人冒雨游行，声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常州各界群众更时刻关心着战局的发展。

1951年4月18日，应常州市抗美援朝分会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来常州，受到4万多各界市民的热烈欢迎，群众冒雨并自发地聚集到14个欢迎站，挥动标语、燃放鞭炮，表示欢迎。19日，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市人民体育场隆重举行，各界群众代表5万多人参加欢迎会。董乐辅在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他向市民通报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情况，赞美了志愿军将士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



1951年1月，在省常中操场，召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民动员大会。图为被光荣批准参加志愿军的青年。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天下午，董乐辅不顾疲劳，又参加了常州工人与地方驻军举行的欢迎大会，人数达到5万人。当天，各界群众代表献锦旗31面，慰问信100余封，书籍7000余册，慰问品不计其数。很多不能到欢迎大会现场的市民，就通过广播收听实况报道。

在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鼓舞下，常州城乡掀起了参军参干支援前线的高潮。据统计，武进县先后有587名青年参军，溧阳有4436名青年参军，金坛青年入伍也有2403名，其中一部分入伍青年，直接编入志愿军序列赴朝作战。

在参军参干的热潮中，常州在校青年也踊跃报名，常州师范学校3天就报名226人，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苏南常州中学（省常中）报名483人，私立淹城中学50届毕业生朱宗亮等16人报名被批准，51届又有16人参军参干。此外，常州红十字分会首批赴朝医疗队有13人赴朝战地救护，历时8个多月；常州火车站有11名铁路员工和54名汽车司机赴朝支援运输前线。常州军分区以成团、成连建制编入主力部队赴朝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近700名常州子弟兵的英灵长眠于三千里江山。

1951年初夏，常州市抗美援朝分会等多个人民团体及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抚军烈属的“三大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人民志



1951年12月27日，常州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参加“誓师大会”。

愿军。共捐款251.36万元，折合16.5架战斗机，超额完成原定12架计划，充分体现了常州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热情。

在响应“三大号召”中，还开展了“拥军优属月”活动，热情接待安排到常州的志愿军伤病员，先后组织30个慰问团、16个文艺演出小组到医院、休养所慰问演出，鼓舞了伤病员的斗志，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停战以后，局前街小学多少少先队员仍然给志愿军战士写信，志愿军战士也纷纷回信，寄来照片和年历片。

完成土地改革 推进各项民主改革

1950年7月，地委、专署在认真调查、充分发动群众的

基础上，依靠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前，武进县和常州郊区共有 23 万农户，103 余万人，耕地 126 万亩。其中地主与富农 11303 户，占有耕地 30 余万亩，户均 26.54 亩（其他农户户均 5.48 亩）。天宁寺是常州地区最大的“地主”，在武进各乡占有耕地 9500 亩。金坛县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93.11 亩，是贫雇农的 23 倍。溧阳县地主阶层占全县人口 4.67%，占有土地总面积的 21.4%，人均近 12 亩，而占人口 53.8% 的贫农，人均仅有 1.12 亩。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靠地租剥削，武进雪堰、前黄、鸣凰一带的地主，不论年成好坏，地租一律为全年收成的 40% 到 70%，并且采用肥田加租等诸多形式进行剥削。许多贫雇农为此不得不另谋生计，如从事苦力、小商、小贩及圆木等手工劳作。1950 年春天，中央要求苏南行署调查山区土地和人口情况，苏南行署把任务交给了常州地委。地委副书记辛少波率领段辉鹏、刘伯祖、陶之明、彭忠孝等 16 位同志奔赴溧阳，住在西山的一个茶馆。这次调查，为开展土地改革作了准备。1950 年 6 月



《土地改革法》受到农民欢迎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地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苏南行署的指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文件，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武进县在新安、厚余、鸣凰、万塔、卢家巷等10个乡进行土改试点；郊区城南乡在3月中旬就进行试点，金坛从8月开始进行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了整个土改工作，土地改革法受到农民欢迎。

同年11月，苏南行署又派土改工作团深入乡镇，开展农村情况调查，协助土改工作。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发动群众，帮助农民以村为单位，成立土地、耕牛、农具调查组、多余房屋登记组。各乡从户籍入手，核实登记土改对象的土地情况和人口财产情况，并且召开出租户、收租户会议，讲明土改政策。登记工作结束后，认真统计和核实，制订具体土改方案。为彻底摧垮以地主为代表的农村封建势力，各地土改工作队纷纷召开反封建斗争大会。1951年1月20日，武进卜弋区在礼河乡召开大会，到会人员有3万多人，其中有28位农民上台诉苦。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改工作的关键，地委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依据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通过划分、自报、互评等方法，划分阶级成分。成分划分结束后，工作队以村为单位，建立没收征收等小组，迅速开展重新分配土地、房屋、农具、

家具和粮食等。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纷纷表示：翻身不忘共产党，一定按政府要求，不荒田，不卖田，不出租，不转让，努力耕种，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土改结束阶段，地委又做了许多深得民心的工作，如颁发土地证，当众销毁地契、债券、契约，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分得土地、房屋所有权。政府又发放贷款，提供种子，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农村土地改革一年以后，城市企业民主改革和其它各项改革也逐步推进。企业民主改革是以教育为主，团结职工，消灭封建管理制度，改造企业，促进生产发展。方法是采取先国营后私营，先产业后行业，先大后小，先主要工厂企业后次要工厂企业。1952年7月19日，在试点的基础上，地委与常州市委召开全市国营、公私合营和百人以上私营工厂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部署“以增产节约，结合生产改革”，全面开展民主改革工作。

民主改革开展后，大、中型工厂企业以党组织为核心，成立民主改革委员会，以工会和团组织为主，建立职工代表会。企业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管理制度，摸清了职工的政治历史情况，改选了工会组织，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确立了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工人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

在城市企业民主改革的同时，地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推进了社会改造在内的多方面的民主改革。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地委、专署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宣传、贯彻实施《婚姻法》。常州锡剧团创作了《丁兰华翻身记》，连续演出50场，广大群众深受教育。常州西区文化馆编排了锡剧《柳树井》，共演出18场，观众达12000人（次）。《婚姻法》深入到每家每户，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的斗争，也是扫除旧社会弊病、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统治时期，常武地区烟毒流行。1927年时，仅武进焦溪镇就有烟馆43处。抗战胜利后，毒品更加泛滥，常州城内拥有11家毒品公司，烟馆、吸售所100余处。毒品在社会的传播，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民身心健康。而由吸毒引发的偷盗等刑事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

1949年11月，苏南行署公布了《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地委、专署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大力发动群众，召开控诉、宽严大会，基本摸清了全市贩毒、制毒和吸毒者情况。11月17日，常州市委召开宣判大会，处理烟毒贩513人，管制124人，教育释放305人，到年底，常州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

1950年初，地委又开展了取缔娼妓工作，通过教育改造和安排劳动的方式，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从而使妓

女在社会上绝迹。

恢复经济 发展各项事业

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常州地委、专署就组织恢复经济。依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建立国营经济的同时，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首先帮助大厂复工，从而影响和推动小厂。在团结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同时，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派出工作组深入主要产业和重点工厂，教育工人群众，推动劳资协商，建立劳资协商制度，签订劳资合同，具体规定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这些措施不仅保障了工人的合法利益，也促进了私营企业改善



民族资本家、纺织巨子刘国钧先生（左一）毅然离开香港返常，积极恢复生产，并在私营棉纺织业中率先实行公私合营。

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工厂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愿意延长劳动时间，降低工资，减少福利，借以维持、恢复和发展生产。1951年底，常州市私营商业户增加到799家，全年零售总额上升到557万，约占总额的一半。

此外，地委、专署加大了城乡物资交流，解决物资购销问题，组织工商企业积极参加苏南区内外交流大会。仅1951年上半年就组织参加29次，交易额900万。1952年8月15日至20日的苏南片常州专区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交易额达850万元，其中现货交易占总额的50.35%，工业品占56.74%。交流大会解决了物资购销问题，密切了城乡关系，巩固了工农联盟。经过调整、管理，常州工业生产、商业经营情况显著好转，市场重新出现供销两旺的新局面。

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繁重任务中，常州地委还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党内出现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而开展的群众运动，历时半年多，于1952年10月结束。“五反”运动主要是针对私营工商业界出现的“行贿、偷税漏税、骗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严重现象而开展的群众运动，历时10个月，于1952年10月结束。“三反”运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廉洁奉公为荣，以贪污腐化为耻。“三反”运动让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1950年6月18日，常州市纺织染技术协会成立。

“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间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

1952年冬天来临了，这是常州迎来解放后的第四个冬天。地委机关依然像往常一样，呈现一片忙碌景象。当年华中六分区的南下干部到常州后，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的要求，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了地、县、区、乡各级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初步建立和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在这1460天的日子里，地委、专署干部起早摸黑，挑灯夜战，殚精竭虑，常州城乡“旧貌换新颜”。常州市的国民经济已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此期间，吴觉于1950年调离常州地委；1951年，辛少波调

离常州市委，由李干成接任地委书记。两年后，李干成也于1953年调往上海。常州地委、专署存在时间虽然不长，领导干部也常有变动，这一代干部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却始终牢记在常州人民心目中。

说一个市长管饭的小故事吧。1952年底，常州地委、专署撤消，常州市成为江苏省辖市。市长于春开一如既往，从西大街住所出门步行上班。有几次，他的孩子看见老爸带了陌生人回家，见他们既不是老爸战友，也不是他的同事，却很热情地管陌生人吃饭。孩子后来才知道，群众要向市长反映民生问题，于春开索性把他们请到家里，边吃边谈，了解情况。市长的这一做法至今听来有点陌生，但确实确实是发生在于春开市长身上的一件小事。“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民生问题的。



地委机关设在大庙弄内

抗联名将冯仲云

○ 范炎培

冯仲云简介 冯仲云（1908.2—1968.3）江苏常州人，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



冯仲云（1908—1968）

三路军政委。抗战胜利后担任苏军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6年3月至1952年9月，任东北松江省政府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52年6月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54年5月任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1955年9月

27日，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曾当选为“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少了一个数学家 多了一个革命家

1908年，冯仲云出生在常州城东余巷镇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少年时，曾经在常州冠英小学（现常州市觅渡桥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杭州私立蕙兰中学（今杭州第二中学）。在校期间，冯仲云受《新青年》《向导》的影响，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挠，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

1926年，冯仲云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当年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说起熊庆来，许多人对其并不清楚；提到华罗庚，几乎人人皆知。熊庆来就是曾经发现和培养华罗庚的教授，冯仲云是继华罗庚之后的又一个高材生。

冯仲云不仅是个莘莘学子，而且是个富有进步思想的热血男儿。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国民党反对派在上海制造了4·12反革命惨案，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样，在北京的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迫害了一批共产党人。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危险时刻，冯仲

云于同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后来所以有人说，中国少了一位数学家，却多了一位革命家。

哈尔滨的地下党斗争生活

1929年秋，在清华学习三年的冯仲云即将毕业，此年却因参加党的集会，被驻防北京的阎锡山部逮捕。冯仲云在狱中受尽磨难，革命意志始终没有消沉，反而更使他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1930年10月冯仲云出狱以后，由于身份暴露，无法再呆在北京。经清华大学教授介绍，冯仲云到了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

到了东北的冯仲云，肩负党的重托，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此时的冯仲云，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感觉到应该有个家庭主妇作为掩护，于是写信给尚在北平读中学的薛雯。冯仲云与薛雯从小青梅竹马，又是表亲，而且同住一地。冯仲云在信中说：“你不要再念书了，你到我这儿来吧，我很需要你，你在这里的收获会比念书更多……”

薛雯一收到冯仲云的来信，她怀揣着对表哥的思念，更因为那份自小形成的敬慕与信任，毅然放弃学业，独自前往哈尔滨。多年后，薛雯始终记得她初到哈尔滨见到冯仲云时的情形：“在我依着云等待渡江的时候，像是迎接我们，突

然下了一阵暴雨，洗净了大地上的尘埃，不多时雨过天晴，松花江上风平浪静，碧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我和云把这一幕看成是我们彩虹下的婚礼。”

在冯仲云的引导下，年轻的薛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革命事业为起点的爱情，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中。白色恐怖下的他俩，以夫妻为掩护，东躲西藏，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他们往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撰写文稿，印刷文件。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弄哭出生不久的孩子，掩盖他们秘密从事的活动。1933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由马家沟河沟街搬到了小戎街2号，此时的秘书长正是年轻的冯仲云。

1933年至1934年间，冯仲云身处小戎街2号，这里既是满洲省委，也是他与薛雯的家。没有人知道，这里成为满洲省委的秘密联络点与工作站，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总指挥部”。省委秘书长的工作日理万机，19岁的薛雯实际上成为他的秘书，负责省委的文书、交通工作，而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客厅的大沙发靠背里。

当时的薛雯，负责文件的发行与传递。她常常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竖起领子，戴着豆沙色的宽边毡帽，手里通常拿着一个点心包或点心夹，在夜色朦胧中，扮成日本贵妇的模样，穿梭在道里、霓虹桥和日本领事馆等受到重点盘查的地区。当时，冯仲云每月有260元大洋的收入，而党组织

的经费却异常紧张，冯仲云把全部收入作为党费上缴，组织上只发还5元钱作为一家的生活经费。

此时的薛雯，对内是北满省委秘书处的一名交通员，对外是东北商船学校冯教授夫人，而在两年前，她还不过是在校的中学生。寒冬腊月，薛雯穿着借来的外套，脚下却没有袜子。薛雯为何不穿袜子？原来日本女人有不穿袜子的习惯，那些伪满军、日本兵一看，以为是日本女人，薛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躲过检查。

1932年，冯仲云与薛雯有了他们第一个孩子冯忆罗，幼小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数惊喜与欢乐，她的出现，又成为薛雯担任省委交通员重要的掩护。她常常把文件包在孩子的衣服里，提一个小包，提个药瓶子，人家一看，啊呀，这是你孩子啊，她有病呢！

提起冯忆罗，其中还有一段故事。1934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小戎街2号，秘密地点暴露，日寇与伪军到处辑拿冯仲云与薛雯。为了避开敌人搜查，冯仲云被派往注河县抗日游击队。而薛雯则带着女儿和4个月大的儿子准备转移上海，寻找党的组织。离别之时，从交通员口中得知，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早在一年前就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悲愤之下，冯仲云夫妇把女儿媛媛改名冯忆罗，表示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罗登贤。

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提到东北抗联，人们一定会想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抗联英杰，他们的英名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冯仲云活到了抗战胜利，看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他受党中央的指示，不遗余力地回忆东北抗战的艰难历程，写就《东北抗战14年》一书，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抗联烈士的英名传向全国。

冯仲云是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是指“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整整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冯仲云在东北，数次死里逃生。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日本关东军张贴布告，四处通缉，甚至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



战斗在白山黑水间

原。在那里整顿组织，发展党员，领导秋收抗租，还办了一期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重建了受到重挫的汤原游击队。游击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是老百姓提供的帮助，使游击队得以在艰难困苦中生存。冯仲云一直念念不忘朝鲜老奶奶李在德舍身救他的故事：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帮人扛枪的人要抓共产党，老奶奶急中生智，赶快把他的眼镜藏起来，叫他装扮成哑巴。面对敌人，李奶奶说他是他的二儿子，是个哑巴。敌人不信，要拖出去枪毙。周围的群众齐口同声地说：“这真是他的哑巴儿子！”冯仲云之才逃过一劫。后来，冯仲云一直说道：“我的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如果没有李在德奶奶，早就没有我的今天。”

组织上安排冯仲云去汤原指导县委抗日武装，而薛雯继续留在了哈尔滨，负责给当时北满军委书记老季送文件。有一天，薛雯带着女儿忆罗去送情报，她发现一向热情的老季表情不对。此时，老季告诉薛雯说：“省委现在与仲云同志很长时间联系不上，也派人去找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季接着说：“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中间交通出现问题，另一个可能是仲云同志牺牲了。”冯仲云去了汤原后，这是薛雯结婚以来第一次长时间与丈夫分离。当听她到老季的此番话，全身顿时发木，禁不住流下眼泪。当她从老季家离开时，大脑里仍是一片空白，走在路上也感觉是软绵绵的。

走了一段路，突然她发现有人在跟踪。快到秋林百货公

司时，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薛雯从前门进去，绕了一个门以后，再从秋林公司里头转了出来。她发现跟踪者紧跟不舍，知道情况紧急，走出秋林公司，一下子冲过马路，连忙叫停过路的一辆“三缺一”的出租车，挤了上去。当时哈尔滨的出租车是散座制，只要车上坐满四人，司机就可关门开车，她终于把“尾巴”给甩掉。

过了些日子，冯仲云在老交通员的带领下，步行 1000 多里，终于回到了哈尔滨，到了自己的家。此时的冯仲云，身上满是虱子，棉袍破旧不堪，与乞丐已无区别。而老交通员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叫冯仲云终身难忘：“只要你领着我们抗日打鬼子，我一辈子给你带路。”

1936 年，冯仲云担任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赵尚志任军长；1939 年，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



1943 年 10 月 5 日，东北抗联教导部分干部于北野营合影。二排左起第二位为冯仲云。

李兆麟任总指挥、许亨植任参谋长。第三路军在嫩江、讷河、德都、北安一线作战，是当时东北抗日队伍中

力量很强，打击日寇影响很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第三路军的活动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12年的忠贞爱情

1934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小戎街秘密地点暴露，薛雯带着冯忆罗和4个月大的儿子，转移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

“那是一次难忘的生离死别。”当时，日本宪兵在哈尔滨大街小巷四处搜捕薛雯。临别时，冯仲云嘱咐薛雯：“这可能是长期分离，也可能是永别。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无愧于革命。”

这一别竟是12年。冯仲云战斗在白山黑水间，无数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曾染过伤寒，负过重伤，吃草根，吞树皮，在零下40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方的妻儿。

在那艰苦的岁月



冯仲云与爱妻薛雯

里，组织上默许与爱人失去联系3年以上的同志，可以组建新的家庭。而冯仲云与薛雯失去联系12年，二人彼此等待，不离不弃。也有人曾给冯仲云介绍过新的对像，或有抗联的女战士追求过冯仲云，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为此，他还专门写过一首小诗，以表达自己心迹：

从军伍，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
家成灰烬，墓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
兄仲云，妹妹薛雯；十年前，同居于太阳岛。
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
风凄凄，雪花霏霏；夜朦胧，寒鸦觅巢回。
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

据抗联老战士、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敏说：“每当冯仲云深情地吟唱这首诗时，我们就问他，是否想薛雯了，他都毫不隐讳地回答：是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终于胜利了。从苏联回到东北的冯仲云，立即通过组织寻找自己的妻儿。1947年2月，他一连写了五封信寄往武进老家，依然没有收到妻子的回信。实际上，此时的薛雯，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区委党校。她的同事都知道，她在苦苦等待冯仲云。

后来，薛雯终于收到冯仲云的来信。冯仲云在信中简略

地告诉自己在东北 14 年苦斗的经历，他给妻子写道：“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你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 12 年，我相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够得到结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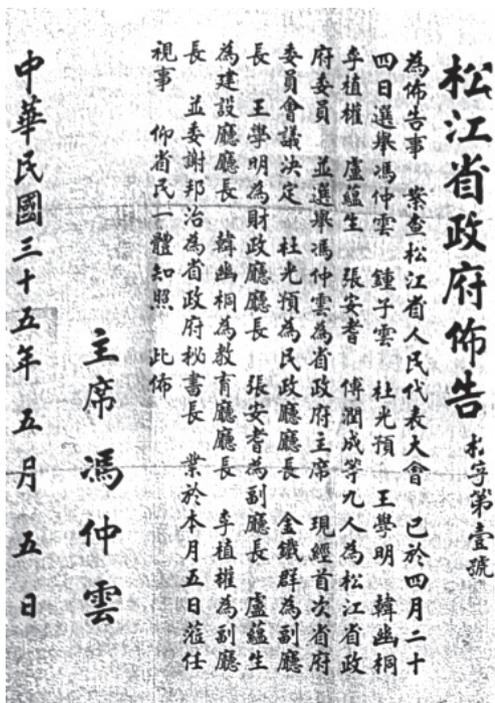
薛雯听了这番话语，热泪盈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下定决心，带着已是新四军战士的女儿冯忆罗和侄女前去东北，与丈夫团聚。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苏北、山东，渡海到达安东，在萧华同志的帮助下，绕道朝鲜，经过 2 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 1946 年 8 月，全家终于在哈尔滨重逢。

冯仲云知道薛雯他们要来哈尔滨，但什么时候来到，他并不知道，所以没有一点准备。薛雯在回忆这次重逢时这样写道：“仲云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往楼上走，激动地走不下来了，这别离了 12 年的苦思，终于到了尽头，经历这样长苦难和战斗的岁月，雯居然还活着，女儿这么大了，还能和他相叙，多么不易。”

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对薛雯与冯仲云的团聚感到欣慰，并在道里区一家小饭馆聚餐表示欢迎，大家共同赞扬冯仲云与薛雯的忠贞爱情。

关怀抗联烈士遗孤

1946 年 5 月 15 日，《东北日报》报道了一则消息，标



1946年5月冯仲云签署的松花江省政府成立公告

是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各界 20 万群众举行盛大的集会与游行，冯仲云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提议把哈尔滨 3 条主要街道改名为靖宇街、尚志街与一曼街。后来又直接关心和指导电影《中华儿女》《赵一曼》的拍摄，为宣传抗联英勇业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战争胜利后，冯仲云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家人，为了让烈士遗孤生活好，教育好，冯仲云

题是：《五百万人民朝夕盼望下松江省民主政府成立，抗日英雄冯仲云当选省主席》。松江省政府成立后，冯仲云当选主席（省长）。刚刚建立的松江省，百废待兴，身为一省之长的他，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没有忘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捐躯的英烈们。

1946年7月7日，

一家一户寻找烈士们的后代，先后找到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的后人，并建立了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招收烈士遗孤近 300 人。

冯仲云与东北抗联著名将领周保中共同提出，并经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在哈尔滨专门设立“东北烈士纪念事业管理处”，建成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与烈士纪念碑，让革命先烈精神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唯一不穿军装的受勋将军

1955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表彰人民解放军战功卓著的将领，举行了隆重的授衔、授勋仪式，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等将帅授衔、授勋。在授衔、授

勋的这些人当中，身着便装冯仲云，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冯仲云为何身着便装？这是因为冯仲云当时已离开部队，



毛泽东主席与授勋的将军握手，左起第 5 人为冯仲云

所以不能被授予军衔。但由于功勋卓著，党和国家给了他极大的荣誉，在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主席紧紧地握着冯仲云的手说：“你是冯仲云，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你们东北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难、艰苦。”授勋以后，冯仲云回到家里特别激动，手里捧着两枚金色的勋章，与薛雯说：“这不光是给我的荣誉，也是给我们满洲地下党省委和东北抗联的同志 14 年浴血奋战的一份荣誉。”



耸立在常州栖凤山的冯仲云纪念铜像

中国大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

○ 范炎培

姜椿芳简介：1912年7月28日出生在江苏常州市，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革命文化战士；我国当代著名翻译家、新中国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事业、外语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首倡者和第一任总编辑；华东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校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首任校长。



姜椿芳（1912-1987）

“闯关东”的常州人

常州城区有一巷叫颇园弄，后来讹名为破园弄。常州解放后，有关部门将破园弄改名新园弄（今局前街新园弄），

文革后，北后街与局前街也统称局前街。姜椿芳老家在武进县西林镇，出生地就在曾经称为破园的小弄内。

小时候的姜椿芳，在常州城内读了5年私塾，后插班进入白云溪畔的基督教会恺乐小学二年级就读。恺乐小学创办于1926年，是美国人的一所教会学校。姜椿芳居住地又近在白云溪上的迎春桥畔，可以说，他自幼与白云溪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姜椿芳的父亲姜岳安是西林（俗称西横林）老街的小店员，姜椿芳16岁那年，姜岳安迫于生计，携全家离开常州，北上哈尔滨谋生。姜椿芳在哈尔滨考入了省立第三中学，进入初一（六）班。母亲帮他请了一位白俄侨民格拉祖诺夫教俄语，而这位俄语教师不懂汉语，只能用生硬的英语来解释俄语。姜椿芳之前在常州恺乐教会学校曾学过一些简单的英语，靠翻阅英语辞典来弄懂格拉祖诺夫的俄语解释，其学习



白云溪上迎春桥

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1930年初，姜椿芳就靠从格拉祖诺夫那里学习的俄语，进入哈尔滨光华通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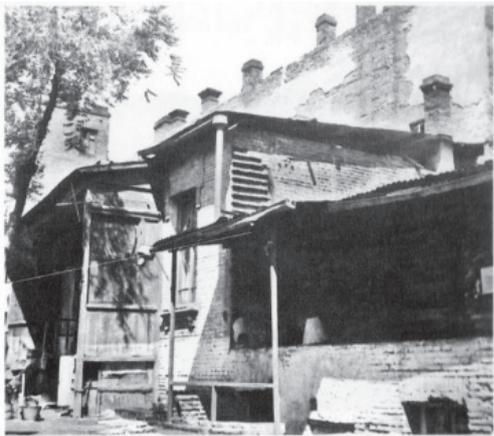
1931年底，日军侵占哈尔滨，光

华通讯社停办，姜椿芳失业。“9·18”事变前夕，他受李大钊同学楚图南的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哈尔滨团市委及中共满洲省委的宣传部长，开始了革命生涯。

光华通讯社停办后，姜椿芳转入英吉利亚细亚通讯社担任俄文翻译和编辑，专门发送哈尔滨当地新闻。每天下午3点，当他一拿到《俄文晚报》，立刻浏览，找出适合中国读者的消息，并赶在傍晚七点截稿前，翻译出新闻稿。然后经过编辑审阅修改、刻蜡纸、油印，至晚上九点分别送到各大报馆。由于埋头苦译，译报工作延续了近两年，俄文水平大大提高。

英亚社（英吉利亚细亚通讯社简称）是苏联塔斯社的化身，姜椿芳一边做中共的党团工作，一边靠业余翻译来维持全家的日常生活。

这一时期，所有东北的各种消息，尤其是关于各地义勇军和抗日部队的消息，以及来自上海、天津等地工人斗争、农民运动、社会名流营救被捕共产党人的消息，都



姜椿芳故居，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会址

是他通过英亚社这个渠道编发出去。同时，他还负责《满洲青年》《满洲红旗》（后改名为《东北人民报》）编辑工作。

姜椿芳在哈尔滨寓居地一度还是省党委与共青团省委的秘密机关，跟随他生活的父母充当放哨员、交通员。这个革命家庭，为了斗争需要，曾经 13 次搬家，无数次遇险，但凭姜椿芳的机智勇敢，一一化险为夷。其间，李兆麟、李实、何成湘、杨靖宇、冯仲云，赵尚志等人都在他的家里开过会，宿过夜。

说起姜椿芳革命家庭的成员，不能不介绍一下他的母亲张长生。母亲出身贫寒，擅长女红针线，特别善于梳头，会梳各种各样的女人发型。有钱人家的夫人、小姐常常请她去梳头，特别是新娘出嫁，更会请她去梳头打扮，同时担任喜娘的角色，因此成为常州城中有名的“梳头娘”。后来，母亲随儿子到了东北，在姜椿芳参与抗日地下斗争时，母亲主动要求担任地下交通员。姜椿芳进行地下斗争，母亲非常担心儿子的安全。那时，姜椿芳尚未结婚，独身青年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母亲常常陪儿子去基督教堂做礼拜，以此来掩护。后来，姜椿芳的母亲认识了牧师张海云的岳母，而张海云就是姜椿芳在常州恺乐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得知张海云有个妹妹张安英在上海松江，通过张海云的岳母，成就了他们的亲事。1935 年，姜椿芳与张安英在哈尔滨结婚，张安英冒着风险，默默地支持着丈夫的革命活动。

姜椿芳与杨靖宇

1931年底与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杨靖宇担任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和东北反日总会会长，住在姜椿芳家。



杨靖宇（1905-1940）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来东北后化名张贯一，姜家人亲切称呼他老张。“老张”傍晚回来不是帮姜父担水，就是帮姜母洗菜做饭，打扫卫生。还经常与姜椿芳谈论国际形势和苏区情况，使姜椿芳开阔了眼界，从杨靖宇身上学到了许多地下工作的经验。

1933年农历五月，对于姜椿芳来说是个极不寻常的日子，满洲省委决定利用端午节请客作掩护，在姜椿芳家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议，届时北满地下党的主要领导都将来这里，讨论贯彻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研究下一步对敌斗争的计划。为了更像请客过节的样子，引开敌人的注意，姜椿芳母亲建议前来开会的领导带着妻子与孩子，省委领导觉得有道理，同意了姜母的这一建议。

端午节那天，姜椿芳父母忙里忙外，等待着“贵客”到来。上午10点多钟，省委书记魏抱一（李一）、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相继带着妻子、孩子赶到，军委负责人李兆麟和省委领导李耀奎夫妇也来赴宴，杨靖宇则从吉林磐石南满游击队赶来参加会议，这是他第二次住进姜椿芳家。这天，姜椿芳父母故意在院子里宰鸡杀鱼，拣菜洗菜，忙进忙出，一会儿上街买点葱蒜，一会儿又上街添点油盐。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向街坊表明家里正在忙着过节待客，另一方面也不时借机到街上望风，防止意外情况突然发生。

就这样，一次重要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姜家顺利召开。会上大家提出建立由党独立领导的正规军，同时发展地方游击队伍，全民武装，齐心抗日。杨靖宇向省委汇报了他到南满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省委对杨靖宇的工作表示满意，决定正式将杨靖宇调往南满，领导南满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将已有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为正规部队。同时还提出建立地方游击部队和农民自卫队，责成杨靖宇立即对游击队进行扩编。会议还通过了省委接受中央指示信的《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下午四五点钟，会议结束，姜椿芳家的端午请客也就“散席”。

杨靖宇这次来哈尔滨，是以商人身份前来的，在姜椿芳家住了一个多月，姜椿芳与杨靖宇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正是这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姜椿芳更加了解杨靖宇的不平凡的斗争经历。在杨靖宇面前，姜椿芳无话不谈，无话不说。杨靖宇在姜家还帮着做家务，同时抓紧读文件。有一次，杨靖宇在姜椿芳家偶然发现一张《国际歌》词曲，于是低声的学唱起来。每唱一遍，杨靖宇就说：“太好了，唱着这样的歌，就觉得浑身长力气。”杨靖宇接着又对姜椿芳说：“我要把这首歌带到部队，带到抗日前线，教战士们唱。”

杨靖宇不仅唱《国际歌》，他决定自己创作一首《东北人民军军歌》来鼓舞战士士气。正当他动手为军歌写词时，省委来了通知，要他赶紧归队，接受新的任务。

杨靖宇就要走了，姜椿芳全家恋恋不舍，姜椿芳父母反复叮嘱“老张”：“回到哈尔滨，就到家里来住！”杨靖宇临走时，把自己的一件大衫和一条褥子送到当铺，换成路费。当票委托姜椿芳代为保管。当票一年到期时，姜家按时拿钱将杨靖宇的衣服赎回，悉心保存。从1936年到1952年这16年中，从哈尔滨到上海，姜椿芳父母每年夏天都要拿出来晾晒，等待杨靖宇回来取走。老人哪里知道，杨靖宇早在1940年壮烈牺牲。1952年，姜家把这两件杨靖宇的遗物交给了吉林通化的杨靖宇烈士纪念馆（现存哈尔滨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

革命文化斗士

1935年5月，姜椿芳与金剑啸等地下党员利用哈尔滨口

琴社，团结了一大批爱好音乐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斗争。1936年4月，金剑啸到日本人办的《大北新报》担任主编。姜椿芳与金剑啸认为，这是利用《大北新报》作掩护，开展宣传工作的好机会，于是在副刊上相继发表了不少日伪当局不能容忍的图片与文章。日本社长怀疑编辑中有共产党，日本兵包围了编辑部。

编辑部除编辑外，还有来登广告的和订报的，恰巧姜椿芳来找金剑啸，姜椿芳等10余人被抓走。金剑啸几天后被押往齐齐哈尔，这年8月15日，英勇就义。姜椿芳被日军抓捕后，由于日本特务机关没有抓到姜椿芳秘密抗日的证据，还有姜家所居住的大院内居民及包括一名日本人的全力相保，说姜椿芳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没有暴露身份。经过党组织及各方面的营救，姜椿芳在关押了30多天后被释放。姜椿芳虽然被释，已不能再在东北哈尔滨继续从事抗日斗争了，党组织指示：全家转移上海。

1936年8月初，姜椿芳带领全家到了上海，在上海文化界继续秘密从事抗日斗争。1937年底，姜椿芳担任《译报》翻译工作。这份由夏衍主编的《译报》，是了解国际及苏联国内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1938年，上级安排姜椿芳担任上海地下党戏剧支部书记，后又任文化总支部书记，负责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的工作，为此，他与戏剧界知名人士如梅兰芳、周信芳等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姜椿芳，

成为上海革命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

姜椿芳在上海时期，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文艺作品，如《祖国进行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我的艺术生活》、果戈理的《赌棍》、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列宁在十月》等等，成为专门的戏剧翻译家。

1941年，在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进步报刊均被封杀的情况下，姜椿芳根据党的指示，在上海开始创办时代出版社，先是以苏联人的名义创办中文版《时代》周刊，姜椿芳任主编。《时代》是当时整个沦陷区唯一能够公开出版的反映我党观

点的中文刊物，也是我党宣传工作突破封锁的一大成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姜椿芳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立即扩大出版范围，又创办了《时代日报》，利用苏商的特殊身份，公开刊载新华社战讯、军事述评等，传播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声援国统区内人民民主运



《时代日报》（1945-1948）

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时代日报》的宣传，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948年6月3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1949年4月18日，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策划暗杀姜椿芳，妄图制造一起车祸加害姜椿芳。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及时获悉这一情报，党组织通知姜椿芳马上离开上海。他西装革履，伪装成草帽商，在夫人陪同下通过了关口检查，转移至香港。

与鲁迅的交往

1936年8月初，姜椿芳进入专门经营苏联电影发行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主要翻译苏联影片的说明书、影片中的对白（字幕），因此有更多机会观看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的



鲁迅（1881-1936）

影片，他的文化视野也随之扩大。由于有了这一经历，他感觉到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上海发起成立中苏电影工作者协会。

姜椿芳与鲁迅的交往是从电影开始

的。1936年10月16日下午，鲁迅抱病带了全家前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上海大戏院位于四川北路的虬江路口，离鲁迅居住的山阴路很近。自从大戏院上映苏联影片后，鲁迅改变了他不常看电影的习惯，以后放映苏联影片，每部必看。这天放映的是根据普希金同名小说改编的《杜布洛夫斯基》，中文译名《复仇艳遇》。开映前，姜椿芳向鲁迅介绍了情况，并说：“为了配合电影放映，走马出版了《纪念普希金100周年纪念册》，这是根据您主编的《译文》月刊中有关资料整理辑成的。”鲁迅听后频频点头。姜椿芳又向鲁迅介绍说：“国民党政府电影检查会对这部影片一再挑剔，译名所以改成了现在的样子。”鲁迅带着愤慨的口气说：“检查官就是要把作品题目，改得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作品。”

影片即将开映了，姜椿芳送两张赠票给鲁迅，请他下次再来看电影，二人分手作别。没想到，三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便与世长辞了，这部电影竟成为鲁迅生前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与赵朴初交往

姜椿芳与赵朴初有着50余年的深厚友谊。抗日战争初期，从事慈善事业与佛教研究的赵朴初，到上海难民所开展工作，并认识了从事中共地下党文化工作的姜椿芳，二人从此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

1937年上海“8·13”抗战后，赵朴初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当时，赵朴



赵朴初（1907-2000）

初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千方百计救济和安置难民。上海沦陷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克服重重困难，并冒着生命危险，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送往苏南、苏北参加抗战，履行他“上马杀敌，下马念佛”的名言。

为了革命需要和安全，赵朴初经常帮助中共地下党在一些寺庙举行秘密会议。姜椿芳当时是上海地下党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的总支书记，后又任文委书记，由于这一原因，姜椿芳与赵朴初的接触自然更多。

许多年以后，姜椿芳对家人说：“那时在上海，地下党在赵朴初的帮助下经常到寺庙开会，现在闭上眼都能走到一些寺庙的每个角落。”赵朴初也曾多次对姜椿芳的女婿纪恒俊说：“你岳父在上海，看上去文质彬彬，话不多，但因懂

俄文和肚子里东西多，讲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革命理论数他最好，搞文化工作很在行。”

“文革”中，赵朴初被扣上有严重问题的帽子在家接受审查，姜椿芳被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近七年。1975年4月19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姜椿芳终于出狱，赵朴初赶往姜椿芳家看望，二老潸然泪下，紧紧拥抱……

周信芳、梅兰芳的入党引路人

姜椿芳被称为“文化灵苗播种人”，也包括京剧事业方面的文化大业。解放前他在上海担任地下党文委书记，上级党组织指示姜椿芳在戏剧等文艺界做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设法把抗战救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戏曲文艺界，在戏曲文艺界发展党员。姜椿芳以京剧爱好者的身份参与进步艺人发起的艺友座谈会，传播新思想，为党争取了戏剧艺术领域的思想阵地。在上海，姜椿芳通过各种方式与梅兰芳和周信芳结为至交，成为梅兰芳与周信芳入党的引路人。

梅兰芳是一位爱国艺术家，在抗战时期蓄须停演，显示了高贵的民族气节，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敬重。俄国音乐家阿甫夏洛穆夫（第一个为“义勇军进行曲”配乐的作曲家）带领姜椿芳到梅兰芳家中拜访。他们交流中国民族音乐的改革，京剧在表演和服装方面的成就，邀请梅兰芳观看《古刹惊梦》的排练，请梅兰芳为演出的说明书题词。由于经常有茶会和



梅兰芳（1894-1961）

演出，姜椿芳与梅兰芳一再见面交流成为好朋友。

周信芳则以另一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姜椿芳与周信芳的关系，要从上海“孤岛”时期说起。当时的上海，环境极为恶劣，党的地下组织指派姜椿芳同志设法结识周信芳，有意识地进入他的艺术生活乃至家庭生活。姜椿芳是一位有经验的正直而能干的老党员，

很快就得到周信芳和周夫人的信任，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和周的家庭顾问。

当时，姜椿芳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上海文化方面的领导人，而周信芳是享誉文化界的名人。组织上派姜椿芳与周信芳取得联系，争取先生参与抗战宣传活动。姜椿芳在多次观看周信芳演出之后，决定先从戏入手。他找到曾为周信芳编过戏的尤金圭先生，姜椿芳开始学习编剧。在尤金圭的帮助下，写了《史可法》一剧的分场提纲，并通过尤金圭的介绍认识了周信芳。

在与周信芳多次接触后，姜椿芳向先生建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结合上海当时情况，京剧即使不能演出直接反

映抗战的剧目，也可在戏里宣传重节气、反屈辱的思想。”周信芳欣然采纳，就在他演的连台本戏《文素臣》中穿插情节，突出这一思想。

当时，新编历史剧《文天祥》《史可法》已被禁演，借《文素臣》这样娱乐性较强的连台戏，可以避免日伪干涉。周信芳在故事编排中，通过剧情细节，人物唱词、念白，增加除



周信芳（1895—1975）

暴安良，伸张正义的内容，在时称“孤岛”的上海，观众内心的压抑得到宣泄。加之演员演技高超，演出深受观众欢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连编连演6本，每本能上座2—3个月，成为旧上海连台本戏中艺术水平最高的。当时有“不看文素臣，不算上海人”之说。电影界还拍摄了同名古装故事片。

新中国成立后，姜椿芳与周信芳一直保持着关系。1959年初，周信芳去北京开会，前去探望姜椿芳，姜椿芳与周信芳深谈了一次关于他的入党问题。周信芳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顾虑自己不够给格，怕参加了党的队伍后，会因个人而影响党的威信。姜椿芳与他的一次长谈，打消了他的顾虑。周信芳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在上海京剧院吴石坚、

丁毓珠等人的帮助下，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5月，经刘厚生与丁毓珠介绍，周信芳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位京剧大师入党的引路人却是姜椿芳。

创建上海俄文学校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姜椿芳与部分同志在香港停留了十几天，听从党中央的指令回到北京。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他们说：“你们这些老上海要协助陈毅同志去接管上海。”

于是，姜椿芳同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等人回到上海，并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姜椿芳接受一项新的任务：迅速组建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1949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以姜椿芳校长的名义发布了一则上海俄文学校招生广告，招生名额200名。



上海俄文学校内，姜椿芳塑像

而前来报名者大大超过招生限额，最后借用山海关路育才中学为考场，录取学员 389 名。

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师和工作人员、三无教材的情况下，姜椿芳白手起家，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做好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谈何容易。姜椿芳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多年来建立的人脉资源，借到了办学的校舍，尽管学校教室和学生宿舍破烂不堪，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姜椿芳深信，一切都会如同他翻译的《列宁在十月》影片中的对白所预言的那样：“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校舍基本解决了，俄语教员从哪里来？姜椿芳想到了苏联侨民与国内俄语界前辈夏仲毅教授。学校聘用具有较高学历的苏联侨民为教员，聘请夏仲毅教授担任俄语教研室主任。教材采用南京中央大学俄文专修科曾使用过的《俄文读本》。许多同学就靠这一读本掌握了俄语基础，而这套署名贺青的《俄文读本》编著者，其实就是姜椿芳。

1950 年 2 月，上海俄文学校开学典礼在位于上海宝山路原暨南大学的礼堂隆重举行。时年 38 岁的校长姜椿芳，西装革履，戴着一副白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气宇轩昂地登上主席台，发表了精采的演讲，用词遣句，自然流畅；演讲节奏，快慢有度，在座师生员工惊叹不已。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姜椿芳在俄文学校既是校长，又是教员，他亲自担任俄语翻译教师，同时又十分重视提高学生政治和文化素养。开

学第一天，他请来陈毅市长，给学生上了第一堂政治课。以后又请夏衍、冯定、柯蓝等专家做各种专题报告。

当时位于南京的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曾专程来到上海俄文学校参观，亲自听课，对学员的俄文水平感到十分满意。在征得姜椿芳校长同意后，刘伯承把学习了半年的两个俄文班的学生，全部调到南京，充实解放军军事学院。

上海俄文学校建立以后，发展迅速，1950年增设了英文班，1951年成立东语系。学校从云南、广西一带招来一批归国的华侨子弟，开设了印尼语、缅甸语、越南语班，为我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姜椿芳作为新中国俄语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功不可没。

奉调北京

1952年，姜椿芳离开上海俄文学校，调到北京履行新职。1953年1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姜椿芳担任副局长。从此，他把全部精力用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

中央编译局的创建和发展，为马列著作的编译工程创造了条件。为完成《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大翻译工程，作为编译局副局长的姜椿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亲自拟定工作规划，制定翻译条例，物色编译人才，总结翻译经验，统一翻译思想，为这项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姜椿芳不仅积极参与三大著作翻译工程的组织领导，作

为俄文翻译家，他亲自主持《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的翻译和定稿工作。中央又指定他为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翻译定稿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又经常点名由他担任俄语翻译，参加有关外交活动。1960年，《毛泽东选集》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译成外文，姜椿芳具体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他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国际共运的国际会议。

姜椿芳生前最后的贡献是提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中央领导作出了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批示。并任命姜椿芳为社长兼总编辑。姜椿芳为编辑出版这一宏伟工程而忘我勤奋工作。

任何国家的百科全书都是那个国家文化学术水平的最高标志，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理解、积累与创造。《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几部百科全书之一。197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2万余名专家学者，取精用宏，历时15年，终于编纂成《中国大百科全书》这部煌煌世制，于1993年出版。

1980年8月，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邀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团访美，团长为姜椿芳，团员有刘尊棋、阎明复、汤季宏和梁从诫。8月12日，姜椿芳和美方董事长斯旺森分别代表中美双方签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

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关于合作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中文版的协议书”。

经中美双方协商同意，很快建立了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成员为：主席



姜椿芳代表编委会向邓小平赠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至三卷

刘尊棋（《简编》主编），委员钱伟长、周有光（承担语言文字条目的终审工作），秘书徐慰曾（副主编）；美方成员为：主席吉布尼（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太平洋盆地学会主席），委员索乐文（美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主任、后任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金斯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秘书何德乐（《不列颠百科全书》总编辑）。中国有 500 多名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部书的翻译工作，这部书的出版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合作的成功典范。

1985 年 9 月 10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姜椿芳及国际友人。姜椿芳代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联合编审委员会向邓小平赠送了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一、二、三卷。

1987年12月17日，姜椿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新华社播发了姜椿芳逝世的消息中这样写道：“中国大百科全书刚刚屹立在世界百科之林，中国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却与世长辞了。”赵朴初先生亲笔写下挽联：“魔氛谷里，捷报遥闻，最难忘万暗孤灯时代传声手；文化园中，灵苗广种，不独是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

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冯铨

○ 范炎培

上世纪 20 年代末，位于白云溪东面的武进县立初中，来了一位来自余巷小镇的少年就读于此，他就是后来成为隐蔽战线斗士的冯铨。

冯铨原名冯鼎铨，化名肖立，1915 年出生在武进县横林镇余巷里，与抗联名将冯仲云是叔侄关系，不过，冯铨仅比叔叔小七岁。



冯铨（1915-1986）

冯铨幼年时，父母双双病故，成为孤儿，被寄养在从祖父家。冯铨的从祖父冯德选（冯仲云父亲）是位仁义之人，他一手将冯铨抚养长大。为了让冯铨将来有出息，冯德选将他送进村上的余巷小学。这是一座由南通张謇幕僚薛秉初出资创办的乡村学校，曾题写“跂于实，勿伤质”的校训。少



冯铨母校武进县立中学（凯乐中学旧址）

年冯铨读书十分勤奋，小学毕业后，竟然考入了有名的武进县立中学，冯德选又承担了他的寄宿费用。对于冯德选来说，他既要负担儿子冯仲云在清华读书的费用，又要承担侄孙的费用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冯铨不忘从祖父的养育之恩，他经常回余巷探望冯德选，每年寒暑假，他总是依偎在从祖父身旁听老人的教诲。1929年夏与1930年夏，冯仲云从北平两次回家探亲，已为共产党人的冯仲云就向冯铨讲述革命道理，宣传思想。1930年秋，冯仲云毕业于清华数学系。由于身处危险境地，毕业证都未取的他，由老师介绍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教书，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得知冯仲云已在哈尔滨，16岁的冯铨也随之而来。经叔叔冯仲云介绍，考入哈尔滨电业局所属电工学校，在学校加入了少年共产国际，时任书记。而后在电车公司工作，先后当上电车售票员和电车司机。由于受冯仲云革命思想灌输，他很快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冯铨在哈尔滨的表现是出色的，1933年6月，年仅18岁的他已作为中共培养的对象，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主要学习军事与情报。他的许多苏联同学，后来都进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冯铨在苏联期间，接触了各界人士，能讲流利的俄语，为他以后从事情报与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冯铨作为少共国际代表参加了大会。1936年，冯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滕代远、冯铨、段子俊、李春田等离开莫斯科，由新疆霍尔果斯入境回国，迎接西路军。冯铨作为陈云的助手，在乌鲁木齐负责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成立了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设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根据中央的指示，西路军总支队决定利用盛世才军官学校里的教员、设备和苏联教官，为八路军培养现代化军事技术骨干，让新疆成为中国安全的军事基地与八路军培养训练特种

兵的基地。

陈云还选拔了一批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兽医和情报等一系列军事技术，既为我军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兵种的优秀人才和军事骨干，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准备了人才。冯铨在此受命出任“新兵营”政治处主任，负责与中央机要的联络工作。自己又亲自担任教员，讲授联共党史与数学。

1937年秋，陈云向“新兵营”全体官兵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要大家“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学好本领，准备回到抗日前线。周恩来来到苏联治伤路过迪化（乌鲁木齐）时，作了短期停留，专程看望了冯铨和新兵营的400余名官兵。他说：“现在敌人用坦克大炮打我们，我



新疆乌鲁木齐“新兵营”

们也要用坦克大炮来打击敌人，不要看现在底子还小，很快我们就要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周恩来还强调：“党中央要求你们利用新疆安定的环境和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认真学习好文化，掌握各种军事技术，夺取抗战和革命的最后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得知大家学习得很好，非常放心，相信不久，我们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冯铨与全体官兵深受鼓舞。

1938年底，一部分新兵营成员开始陆续返回延安，第一批返回的是学习无线电技术的人员。1939年11月，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和抗战需要，除参加航空队的学员留在新疆，其余西路军总支队全部成员回到延安。

冯铨是1940年4月经兰州回到延安的，中央给他的任务是参与创建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改设，管理和领导情报与保卫工作，对内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冯铨先后担任社会部办公处处长和社会部一室主任，还具体负责国际共运联络工作。当时，苏联《塔斯社》有“记者”驻于延安，这是中苏两党情报系统之间联系的渠道。而这一情报交往就由冯铨负责。为了让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掌握对内对外的情况，冯铨创办了《书报简讯》内部刊物，通过《书报简讯》传递信息，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多次表扬这个刊物办的得好。

抗战胜利不久，冯铨受中央指派，于1946年1月调到

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秘书处处长。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破裂后，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冯铨于1947年初，辗转千里，行军到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四野前身）汇合，在这里碰到了多年不见的从叔冯仲云。

同年5月，冯铨被任命为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1947年3月担任新组建的中央情报部直属大连情报处处长，旅大区党委委员。由于东北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所以，他绕道朝鲜，到大连赴任。冯铨在大连情报处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东北野战军，收集重要情报，策划国民党部队起义，例如：他们成功将大连情报处的两位地下党员，打进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充当机要参谋；大连情报处又成功策动了国民党营口驻军王家善的暂编58师起义，受到了东北野战军总部的嘉奖。东北野战军领导曾经这样夸奖：“东北社会部的情报工作能顶上个主力纵队。”

冯铨与东北社会部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一方面将自己的同志打入国民党内部，另一方面，要



1949年，冯铨与军委联络部天津局的同事们在一起（前排左起第二人为冯铨）。

保护民主爱国人士回到革命的阵营。当时的大连，还是苏军管辖区。冯铨根据周恩来的电示，积极设法将香港民主人士安全护送。于是，他积极与苏军交涉，利用他们的轮船，护送民主人士从香港出发，北上至大连，然后转道去解放区。这些民主人士中有沈钧儒、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李济深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大连情报处整体转移至天津，改编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冯铨担任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冯铨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联邦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冯铨于1950年12月8日在伯尔尼向瑞士联邦主席彼蒂爱提交国书

联邦首任特命全权公使，以后又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继续从事国家安全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

1963年4月，刘少奇和陈毅将要访问柬埔寨，就在此时，收到有关情报：



余巷冯氏宗祠

盘踞台湾的国民党企图暗害代表团。他们策划在代表团必经的路上埋设地雷，并派枪手持无声手枪前去行刺。中央调查部负责此案的侦破，毛主席还作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指示。冯铨与调查部有关部门在柬方埔寨政府配合下，及时侦破此案，并捕获了所有国民党特务，保证刘少奇与陈毅的访问成功。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就如何加强对外工作问题进行研究。会后，冯铨综合讨论结果，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2月30日，毛主席亲自审阅了这份报告，并写下200余字的批语，全面肯定了这份报告，随后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

导小组，冯铨成为小组成员之一。

上世纪 70 年代，冯铨调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担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后兼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负责我国的对外宣传及对外出版发行工作。曾当选为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十一大中顾委委员。

冯铨一生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在隐蔽战线工作长达 40 年之久，始终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954 年在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冯铨和夫人李斐仪与周总理在一起。

“女中豪杰”史良的故事

○ 金明德

在中国古代，城市都建有高高的城墙，就像常州现存的“西瀛里明城墙”，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人们进出城市，都要通过“四城门八水关”。而每个城门都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比如常州城过去的大南门就叫德安门，大北门叫青山门。为什么取德安门这个名字呢？因为“德高则安”，也就是说品德高尚是安居乐业的前提。



史良（1900-1985）

古时候，从德安门向北进入常州城后不远，有一条小巷叫“观子巷”，如今这个巷名不复存在，现在的路名叫和平路。在观子巷东首偏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三进院落（现门牌号

是和平南路 143 号)，这里就是史良故居。

史良是什么人呢？原来她就是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赞扬并题词称赞的“女中豪杰”！能被毛主席题词的女英雄并不多见，除了刘胡兰就是史良了，可见她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史良是著名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长，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更是位从“不出卖灵魂的”著名大律师和法学家。

书香门第的艰辛童年

常州自古以来就是“千载读书地，世代书香城”，人文荟萃、人才辈出。在中国长达 1300 多年的“科举制”中，常州一地有 3000 余人考取进士，入仕做官。史良的前辈中连续五代人考取过“举人”，即在省级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史家因此成为常州的名门之一。

1900 年 3 月 27 日，史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五代举人，名门翘楚”的书香门第。

话说史良的祖辈都受“科举制”的影响，大都“为人和善、性情儒雅”，而且追求功名利禄，所以她祖上一直是生活比较富裕的。可是到了史良父亲这一代，生活却越来越贫苦。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她的爸爸史刚（又名史子游）却与上代人不同：他“性情耿直，洁身自好”，具有一种反叛思想。

他认为“科举制”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束缚人思想的工具，因此不再像前辈那样去考功名做官，而是靠饱读诗书的深厚文化功底甘当一名“教书匠”，凭着每月10个银元的收入抚养一家10口人，过着“两袖清风，一窗明月”的清苦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父亲曾从床上拉下一条被单，叫史良去当铺当了一元钱来购买柴米油盐。但是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父亲却毅然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史称革命党。

史良的母亲刘璇也是一位既有文化，又会琴诗绣织的贤淑能干而且富有“勇敢精神”的女子。母亲曾作过一首题为《梦中游》的五言古体诗：“抱琴独上山，四围皆峭壁。人生天地间，何如此岩石”。母亲还任劳任怨地协助丈夫操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没有钱买菜，每年深秋季节就腌上一大缸咸菜度日。由于营养差，孩子们经常生病，也无钱医治。所以史良的二姐、三姐和七妹分别因患浮肿病、肺病和癌症而夭折。尽管生活艰难，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却抓得很紧，而且教育有方，使她们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曾为史良母亲的逝世而撰赠挽联：“为大众之母，遗天下之悲”。可见她母亲的高风亮节和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非同一般。

史良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自然是自幼便饱读诗书，比一般同龄孩子“先知先觉”；再加上艰苦生活，更逐渐培养了她顽强而倔犟的爱憎分明的个性品格。

好学上进的女“学霸”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前，孩子们到了学龄，一般都到私塾里读书。私塾是什么样子呢？在常州怀德北路上的“椿桂园”里，有一个私塾的铜质雕塑场景：在一间不太大的屋子里，摆着几张长桌和板凳，桌上摊开着书本，孩子们有的看着黑板，有的在打瞌睡；而读不起的书的穷孩子则趴在后墙上悄悄地旁听；黑板前一个穿着长衫的老师在摇头晃脑地讲着《三字经》或《千字文》；讲台上摆着一把戒尺，谁不好好听课，老师是要用戒尺打手心的。这就是旧时的私塾情景。



史良故居

辛亥革命后，私塾逐渐停办，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学校。但是，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到新式学校去读书的，尤其是女孩子。史良就是这样，14岁之前根本就没机会上学，只是在家里跟着父母和大姐史伯随学习。

史良5岁时就在父亲和大姐的指导下，学习基础课程。父亲让大姐每天给她布置“作业”，她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姐姐；姐姐也一直充当着她的家庭教师，对她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因此她非常崇拜姐姐，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像姐姐一样到现代学校去读书。

父亲史刚知识渊博，经常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民族英雄，还有宋末元初发生在家门口的常州人民奋力反抗元军入侵的“纸城铁人”和“十八家村”等故事，史良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入耳入脑，甚至热血沸腾。小小年纪就被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所打动。

史良14岁那年，姐姐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下称“女师”）当了国文老师，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史良终于有机会进入“女师”附属小学读书。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的她，一进小学就跳到四年级，而且门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那时的小学分初小与高小，“初级小学”，是指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教育阶段，五、六年级就属“高小”，而那时的“小升初”要通过升学考试选拔的。

史良小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女师”。这个学校是当

时常州最高学府之一，“女师”开设在一条叫“西庙沟”的巷子里。从此，史良的人生旅途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她开始认识到，像她这样的家庭情况，能进入像“女师”这样的学校读书，机会是多么来之不易！因此，她非常感恩父母亲和姐姐，长大以后她在给姐姐的信中说：“我是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大姐，如果小时候不是您帮父母度过穷日子，让我们上学读书，我也没有今天。因此您的仁慈、和蔼、朴实、诚恳的态度，永远是我坚强愉快的动力。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您的培养。”

史良报答父母和姐姐的最好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她回忆自己在学校用功学习的情景时说：“我在所有的求学时光真可以说是一个死用功的学生了，那股用劲是没法形容的，心里只有书本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她连续14年坚持每天写日记，不是记当天的天气如何，发生了什么杂事，而是详细地记载自己用功学习的经过与心得体会，做到“日三省吾身”。因此，她的各门功课平衡发展，绝大多数都是优秀，唯一较差的是刺绣课程。按理说女孩子一般都喜欢刺绣，擅长“女红”，史良却因性格和兴趣使然，所以这门副课学得不太好，她自己做了检讨。由于她其它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被推选为正级长，相当于整个年级的“大班长”。史良爱好体育，还是学校球队的女队员，由于积极参加学校运动会和其他各项有益活动，大家选她当了学生会会长。可见少

年时史良，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学习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霸”。

爱憎分明的巾帼青年

史良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年代。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所谓“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但依然是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闹得社会民不聊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再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目睹国家的空前劫难，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图强。此时的史良，虽然在学习日记中说自己“心里只有书本，其余的什么也不留意”，其实并不是这样。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面对国难和民怨，她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成长为一个出了名的敢于斗争的巾帼青年。

青年史良爱憎分明，桀骜不驯的性格，在她一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下面讲四个有关她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七岁“抗婚”。在旧社会，很多穷苦人家为了让孩子少受苦，会在女孩很小的时候就找个较为富裕的“婆家”，定了“娃娃亲”，认为这样孩子的将来就有了依靠。史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困难，两个姐姐不幸夭折。母亲为了使史良今后能过上好日子，在她七岁那年，把她“许配”给一个姓刘的有钱人家男孩。

年幼的史良知道母亲要给她定“娃娃亲”后，在家整天

蒙头大睡，不肯吃饭，用“绝食”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最后只好又把庚帖要了回来，解除了这门“娃娃亲”。史良的倔强性格，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初露端倪的，而且在后来进入学校读书和踏上社会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个故事：充当一名驱赶不良教师的领头人。史良在“女师”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位品行不端、不



“五四”中的女杰史良

学无术的数学教师，引起了同学的强烈反感，学生们多次向校方反映都无济于事。此时谁也没想到，既是年级长又是学生会会长的史良，居然带领学生闹起了学潮，连续罢课三天，强烈要求校方换掉这个数学教师，结果被记大过一次。史良虽然受到了学校的处分，却达到了更换这名教师的目的。从此史良在学生中威望日增，很快成为学生运动领袖。

第三个故事：“五四运动”的女闯将。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曾经派出十万华工而成为战胜国，并且派出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各帝国主义战胜国

借这次和会重新分配势力范围。他们无视中国的主权，决定把战前德国强占中国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牺牲国家的主权，在这份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群情激愤。1919年5月4日，在著名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带领下，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打出“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且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

一石激起千重浪。伟大的“五四运动”迅速波及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各大城市，同时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形成巨大的抗议浪潮，也波及到江南名城常州。从小就具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史良再也坐不住了，她以女师学生会会长的身份，联合男子师范学校和江苏省立五中（现省常中）的学生代表，成立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组织罢课，带领学生走向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带动了工人罢工、店员罢市的“三罢斗争”。

由于日本坚持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窃为己有，全国乃至常州学界，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史良带头不用日货，带领同学上街宣传用国货，把抄来的日货当众焚烧。在她的影响下，女师学生纷纷把自己的“东洋布”衣服撕破焚烧。

1919年5月22日，史良带领常州学界联合会，在市立

第七国民小学开会，决议驱逐停泊在常州的日本船只，禁止日本人和船只入境。会议还组成以史良为首的演讲队，史良还动员在“女师”任教的大姐史伯随和在省常中读书的弟弟史公载，一起参加这场爱国运动。

学生演讲队在第一公园、体育场等地举行一系列爱国演讲，向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厚生机器厂（常州柴油机厂前身）一些工人不顾天气炎热，争相去听史良演讲。有一次，史良在第一公园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慷慨陈词，工人很受感动，纷纷送水给她喝。

史良姐姐史伯随在这场斗争中，也成为一名演讲家。1920年5月4日，常州学界在第一公园召开“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史伯随在会上作了题为《悲观与乐观》的演讲。当时的报纸这样评价她大姐的演讲：“尤其慷慨淋漓，全场动容”“语语自事实，痛言时局危险，凡人均宜发愤救国。讲时充足之精神，愤激之言论，实令人钦佩”。不久，大姐又在老城隍庙劝学所前发表题为《今日国民不能负责》的演讲，大批各界人士及男女学生前往听讲。所以，史良和她姐姐被人们称赞为“常州学界两朵灿烂的姊妹花”。

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每当举行游行示威时，省立五中的音乐老师刘天华带领军乐队走在队伍最前面，演奏着慷慨激昂的爱国乐曲，紧接着是省立五中和女子师范的队伍，最后是男子师范的队伍。史良手执校旗，跑前跑后，

时而招呼队伍行进，时而领头高呼口号：“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还我主权！”。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感动了常州人民，很多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史良还带领常州学生代表奔赴南京，声援北京学生运动。

第四个故事：“护校斗争”的女豪杰。史良带头参加“五四运动”的行为，遭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大肆攻击，认为女孩子上了“洋学堂”已经“破格”了，还抛头露面上街游行，发表什么演讲，言辞激烈，成何体统？于是有人策划停办女子师范学校，还得到了县政府支持。史良得知这一情况，一方面带领同学散发传单，与保守派公开辩论；一方面向全国发出通电，向省政府及教育厅发出呈文，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揭露保守势力摧残教育事业的阴谋，还带领学生大闹教育局和武进县政府。

县政府派兵准备前来镇压，还把史良父亲史刚抓来进行威胁。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史良毫不畏惧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明辨是非，不要给军阀当走狗！”在义正辞严面前，士兵纷纷退缩。此时，只见史良一个箭步，冲到县长姚绍枝面前，质问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把我父亲抓来算什么本事？”父亲也坚定地支持史良，对着姚县长说：“我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她做得对，我支持他，你休想叫我来压她，我是放任主义者！”县长怕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只好放人。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最后江苏省作出决

定：武进女子师范学校继续开办。史良带领的“护校斗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人的一生，一定会遇到很多抉择，每一个人都不例外，尤其是在青年时代；抉择的正确与否，会影响人生的成败。从职业生涯的角度看，所谓抉择，也就是将来干什么。

1922年7月，史良从“女师”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大学深造。开始是学政治，后来感到政治比较空洞，而且女子参政在旧中国也是件很难的事情。于是就改学法律，将来准备当律师。为什么要当律师呢？她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许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许多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被反动派抓了以后，很少有人为他们辩护。所以她下定决心，将来要“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去为老百姓服务，为民主革命作贡献。

“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史良后来是怎样做到的呢？



史良踏上

女律师史良

社会的头四年里，先后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镇江的省司法机关、省区长训练所、省妇女协会、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等地工作，担任过书记官、训育员、总务主任、训政科主任等官职，还曾获“少校”军衔。但是，史良却多次被迫调换工作，还遭到了两次逮捕。第一次逮捕是上大学时，因参加“五卅运动”，坐了两个月的牢，还被送进“特种医院”一个星期。另一次还是因为“常发表不合时宜的意见，有过激言论”而遭逮捕。尽管她抨击的都是国民党反动党棍和社会的黑暗，也尽管她有着扎实的文化专业和非凡的工作能力。在真理面前，史良始终不肯屈服。

社会的黑暗和她倔犟的个性，使史良在就业初期吃尽了苦头。当她终于获得从事“用以所学”的律师职业后，逐步学会了运用法律（利用旧时代法律之间的矛盾和漏洞），为受苦受难的人们打官司，伸张正义。沈均儒、蔡元培、宋庆龄等人是她的前辈，他们的言传身教，让史良逐步学会运用社会人脉关系，以及法庭辩论中的“防御”和“进攻”，沉着应对，积极申辩。为此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尽管邓中夏最后还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但史良的前期营救十分成功）、中共中央会计科长熊瑾玠、任白戈和陈卓坤等一批共产党员，还有左翼作家艾芜。

史良还坚持一条原则：为富人打官司按章收费；为穷人

打官司打折甚至分文不取，尤其对于那些受欺压和被冤枉的妇女受害者，她总是全力以赴帮助她们，往往胜诉，故此被赞誉为“妇女代言人”，还逐步成为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史良爱憎分明的性格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突出表现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与宋美龄等高层人士的交往中。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已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执委的史良，带头为抗战将士募捐，在救亡运动中她数次跳上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停止内战、共赴国难的演讲。她还发起成立了上海第一个救国团体——妇女救国会。在鲁迅安葬仪式上，她与宋庆龄、蔡元培、沈均儒、李公朴等救国会领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最难忘的是，她在一次游行示威中，因用身体掩护女同胞而被警察打伤住院。

史良在做人做事上，不慕权势，立场坚定。她与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交往中，既与之合作，又不亢不卑。史良因妇女运动而结识了宋美龄、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尤其在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里，有过较长时间的合作共事。

宋美龄十分欣赏史良的才能，经常委托史良代表她参加会议并代她讲话，还几次请史良到家里与蒋介石共进午餐，郑重其事地邀请史良加入国民党，并愿意做她的介绍人。史良也曾写文章赞赏过宋美龄。如此好的私人关系与“天赐”的政治良机，史良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宋美龄的好意，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以致在抗战胜利后，毅然与蒋家王朝决裂。

史良还是那个有柔情铁骨的女君子，在她一生中遇上许多大事，“七君子事件”就是其中一件。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逮捕“七君子”（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时，史良“巧妙地逃走了”，当局用五万大洋悬赏通缉她。史良居然在通缉令下拍了一张照片，“立此存照”以嘲弄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多月后，当她把救国会和律师工作料理完后，为了与救国会其他领袖并肩战斗，她居然从上海来到苏州监狱主动投案，国民党的检察官大吃一惊：“一个通缉犯怎么自投罗网？”检察官百思不解。



七君子群像：（从左到右）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

史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为许多受冤屈的妇女撰写状子，据理申诉，甚至挽救了一名“死囚”的生命。为此，史良与狱中众多女同胞结下了深厚友谊，也深深感动了监狱的部分女看守，使她们同情革命。再加上她在庭审与反诱降斗争中表现出的从容淡定和斩钉截铁，恰是史良柔情铁骨性格的最好写照。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史良的成长和性格演变过程，就是一面镜子。自从1927年，她在从法科大学毕业踏上社会起，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2年里，先后经历了从事律师职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为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斗的艰难曲折的光荣历程。这个历程是她从一个桀骜不驯的热血青年，逐渐成为沉着应战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史良个人成长的特殊轨迹，也折射出史良不平凡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毛主席为她题词“女中豪杰”的内涵所在。

按 语 >>>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在这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斗争中，一批常州英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一批常州人，绝大部分生活在白云溪两岸，如江苏首任代理总督庄蕴宽、武进县首任民政长屠寄、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屠元博、《苏报》馆掌门人陈范等，都是白云溪的弄潮儿；甚至当时参与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也发生在白云溪周边，如辛亥革命中常州军政分府设在玉梅河畔的常州府中学堂，武进民政署设在云溪北岸的武进县旧衙，武进司法署设在马山埠的阳湖县旧衙，等等。故此，我们选录部分与常州白云溪相关的辛亥英杰的事迹，作为《红色云溪》的附录，以帮助青少年了解中国千年之大变局，更加坚定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惜阴老人”赵凤昌

○ 王金兰

上海南阳路（旧称南洋路）是静安区的一条东西向道路，全长不到 500 米，与著名的南京西路平行，却没有车水马龙和喧嚣嘈杂。154 号曾是“惜阴堂”旧址，如今，10 多层钢筋水泥的高楼，取代了当年的花园洋房。

“惜阴堂”的主人是谁？是常州人士赵凤昌，曾经有一“民国产



赵凤昌（1856-1938）

婆”的雅号。获得这一雅号是有来历的。由于他的睿智与聪慧，化解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南北分立危机，催生了中华民国的创立。

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又字惜阴。是常州西盖赵氏的后人。据《西盖赵氏宗谱》记载：宋太祖赵匡胤长子（魏王）赵德昭的十一世孙，名赵孟堙，元代时任高邮州录事。泰定二年（1325），辞官不就，卜居武进横林西盖村。清初，赵凤昌的前辈已移居常州青山门。

历史上的青山门，与白云溪是有联系的。云溪流经北水关，与北市河相通，再与关河相连，水网纵横。赵宅就座落在青山桥北堍，水边的斗巷。赵凤昌曾师从晚清塾师余伊臣，余伊臣为学生取字“惜阴”，源自宋代理学家朱熹《惜阴》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赵凤昌从小就崇拜常州两个姓赵的人：一个是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名句的探花赵翼（1727—1814），另一个是清朝名臣曾国藩最器重的幕僚——赵烈文（1832—1894）。赵翼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写下《廿二史札记》；赵烈文作为朝廷重臣幕僚，却预言清王朝“不出五十年”行将灭亡。语出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

朝寿终正寝。

赵凤昌少年时代就立下了经世治国的志向。20岁时，他与哥哥一起去湖北谋生。有一位姓朱的有钱人心生怜悯，觉得他特别聪慧，将来能成大器，于是替他捐了一个县丞官衔。后来赵凤昌被派往广东候补，开始了宦途生涯。

赵凤昌初任广东布政史姚觐元的秘书，不久就做了两广总督曾国荃的幕僚。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到广东接替曾国荃任总督，赵凤昌留任。由于他勤奋好学，处事练达，很快便获得张之洞的赏识。后又随张之洞到了湖广。

跟随张之洞数年后，赵凤昌得到高度信任。他竟然帮张之洞代拟公文，模仿笔迹，几可乱真。遇到重要的事情，张之洞都与他商量，以至于在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

张之洞（1837—1909）是怎样的人物呢？27岁时经过殿试，获得探花，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官至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与军机大臣等要职，最终任体仁阁大学士（正一品衔）。一生功过分明，镇压过民众起义，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在近代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作出很大贡献，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

光绪十九年（1893），朝廷发生了一场大参案，指责张之洞误用赵凤昌。查办此案的两位大臣，为顾全参奏京官的面子，只能牺牲赵凤昌，认定他有“揽权招摇”的情节。光绪

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赵凤昌仅是个候补直隶知州的官衔，却惊动皇帝下旨，可见他的不同寻常。

张之洞知道赵凤昌是因自己而丢官，很过意不去，于是替他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的挂名差使，而且还派他长驻上海，办理通讯运输业务。于是，赵凤昌成了湖广总督府派往上海的“驻沪办事处主任”。

在上海滩，赵凤昌凭着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处事技巧，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在这个平台上，他编织了庞大的朋友圈与关系网。可以接触各色人物，甚至包括朝廷通缉的“要犯”——维新派人士及革命党人。同时，他还与沪上绅商及外国领事广泛结交，把所得消息及时传递给张之洞。



王西京画作《远去的足音》，悼“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至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一场血腥政变，大肆捕杀维新党人。1898年9月28日，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当众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曾与赵凤昌同在张之洞幕府工作，二人交谊最深。对于杨锐的遇难，赵凤昌颇为愤慨，他深知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已尽，反清意念由此萌生。当看到清廷只是把立宪作为一个幌子之后，赵凤昌开始明白，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的思想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凤昌在上海南洋路10号建造竣工了一幢二楼半的楼房，取名惜阴堂，自号“惜阴老人”。从此，在惜阴堂里，上演了一幕幕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

1911年
10月10日，
湖北新军在武
昌举行起义，
辛亥革命取得
成功，2000多
年的封建帝制
被推翻。在



位于上海南洋路的惜阴堂

这场斗争中，赵凤昌一无兵权，二无财力，凭什么能够受到孙中山与袁世凯南北双方的共同关注？原因在于武昌起义之前，赵凤昌已经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表现出过人的才干。例如参与策划“东南互保”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冀、鲁等地掀起了一场“扶清灭洋”的风暴，外国列强组织联军向北京进发。当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等11国宣战。八国联军借机攻入北京，皇室人员仓皇西逃。

面对即将发生的祸乱，赵凤昌非常忧虑，他说：“我们这些较为有理智的人应该出来做些事，为国家贡献自己的良策，不可坐听局势糜烂。”他与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拒绝清廷宣战诏书，倡议“东南互保”，以免战火荼毒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是犹豫，不见皇上旨意，哪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赵凤昌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之“洋电”。电报大意是：“宫室人员已经离开京城，皇上有旨，要求各督抚力保疆土，由庆亲王奕劻留京与各国会议。”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洋电”两字，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转发了洋人电报，而不是“假造圣旨”，避抄家灭门之祸。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东南互保的成功，也为赵凤昌建立了名望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又是怎样诞生的呢？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宴请客人。席间，有人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耳语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与大家告辞，说是另有邀约，先行离去。实际上，他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赵凤昌急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到的消息是：湖广总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赵凤昌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他的态度也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首先注意的是朝中重臣、外国列强对这次革命的态度。

10月27日，赵凤昌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另一封发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并劝他反对摄政王向列强借款镇压革命。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

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给外商们传了个话，大意是说：“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外商将这个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公使团宣布“起义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各国严守中立。”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交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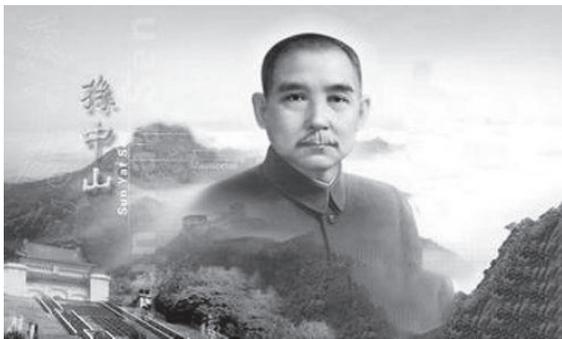
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举措。当时，清廷急令陆军大臣荫昌、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拍了电报，告诉萨镇冰，排斥满族人的说法已经取消，劝他“暂息兵力，勿残同类，致为外人所轻”。果然，萨镇冰在一向敬重的郑孝胥的规劝下按兵不动。

在湖北、上海、江苏先后宣布独立时，赵凤昌目睹其余各省还在观望，十分焦急。在赵凤昌的劝说之下，张謇（光绪二十年状元）毅然以咨议局长名义及自身威望，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呼吁各省督抚起义，彻底推翻清朝，拥护共和。

赵凤昌属于那种先知先觉的人物，开始利用媒体的力量。他请农工商部侍郎、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撰写一篇“共和国体论”的文章，引经据典，讲明共和体制不是改姓、易帜，并非降臣，让大家明白共和体制的好处，并大力宣传革命军举义旗于武昌的意义。文章一经发出，立即收到效果。如多米诺骨牌，接张謇电文后，各省纷纷独立，并派代表来到上海“惜阴堂”议事。

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海外募集革命基金，国内的革命党人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宣布独立的省份，政权纷纷落入了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的手中。政见上超越南北党见的赵凤昌，思路开阔、智谋超群，成为掌控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妥协、合作的核心人物。

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又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为实现这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

11月15日，江、浙、沪等10省区22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这就是日后国会的基础。赵凤昌等人还将“五色旗”定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国内。第二天下午就前往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后来，孙中山又多次到惜阴堂与赵凤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孙中山立即开始筹备组建临时政府。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中华民国宣告诞生。2月12日，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帝逊位，清朝267年的封建统治从此结束。

2月9日这天，孙中山给赵凤昌写了封亲笔信，诚挚地



《赵凤昌藏札》是赵凤昌、赵尊岳父子收藏、整理、装帧的书札集册

邀请赵凤昌出山辅佐，聘他为枢密顾问。不久，袁世凯的电报也到了，态度更加恭敬，邀请他赴京担任顾

问。对于两位大人物的邀请，赵凤昌均予以婉拒。

之后，赵凤昌坚持共和，反对帝制复辟，逐渐淡出政界。

1938年，赵凤昌于上海惜阴堂撒手人寰。有祭文这样写道：“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

赵凤昌在世时，精心收藏整理了大批信札，共计36函，109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库，被史学家誉为“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2010年国家图书馆刊印了《赵凤昌藏札》影印本，使许多史实拂去尘埃，呈现在人们面前。

（参考书目：吴欢·《从辛亥风云深处走来的赵凤昌》·《常州辛亥英杰》；周昂·《赵凤昌：清末民初大时代中的幕后人》·《中国周刊》）

“儒文侠武”的庄蕴宽

○ 思 与

有一位在白云溪边长大的常州人，留在了边防重镇龙州人的记忆中，他就是辛亥革命后担任代理江苏都督的庄蕴宽。

龙州(广西崇左市辖县)中山公园，树木葱茏，山壁峻峭，上有石刻“箕山”二字。山间曲径通幽，山顶筑有“浴日亭”，登高远望，江水浩渺无际。这个景区是常州人庄蕴宽在龙州为官时首建。

1907年初秋，庄蕴宽调离龙州，未及建成，取名“箕山”，自嘲“功亏一箕”。后来，历任边防督



龙州县中山公园箕山景区

办、军政要员陆续扩建园区，直至1927年建成，命名为“中山公园”。

肩负重任 兴办教育

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宏，江苏常州人。清末，入仕为官，历任晚清百色厅同知、平南知县、梧州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龙州边防督办等职。在广西任职的10多年里，他勤政为民，创办新学，编练新军，被誉为培养边疆文武人才的“祖师”。



庄蕴宽(1867—1932)

光绪三十二年(1906)，庄蕴宽升任太平思顺兵备道道尹兼镇南关监督，驻扎龙州，统领边防全军，主政边防军务。他到龙州后，先后创办了龙州实业学堂、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初级师范学堂、广西边防法政学堂以及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等。他尊重女性，提倡男女平等，破除缠足陋俗，并以他母亲的名义捐银一千两，创办了龙州崇信女子高等小学。他还在学校设立理化实验室，并从东京、上海等地购置书籍开办图书社，为普通民众开眼看世界提供硬件设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庄蕴宽到龙州县下冻乡两

庄小学视察，目睹当地教育落后，学校破败，却在大建庙宇。一怒之下，庄蕴宽下令把庙里菩萨、神像统统拆除，将庙堂扩建为学堂，并拨款两庄小学，改善教育条件。又题写一诗，表达对教育的重视：

千载蚩民失自由，江山无语暗生愁。
我来恰值东风解，爱尔青年争上游。

庄蕴宽被调离龙州后，龙州人民为纪念他巩固边防、发展边疆文化教育、提高妇女地位等重大贡献，特为他凿了一块“去思碑”，矗立在县城龙江街的文昌阁下。1910年12月，时任广西提督的陆荣廷，又在龙州中山公园对面建了一座4.2米高的庄蕴宽纪念碑，碑面镌刻“钦加二品衔、统领边防各军、太平思顺兵备道、镇



龙州庄蕴宽纪念碑

南关监督庄公蕴宽纪念碑”字样。碑文 320 字，概括了庄蕴宽在广西“儒文侠武”的功绩。

儒文侠武 反清救国

庄蕴宽身在广西边陲，深切感受到列强环伺、国弱民贫的处境。“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对清政府彻底失望，逐渐转向接受民主革命思想。1906 年，庄蕴宽在钮永建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同情革命，掩护过黄兴等人在广西的革命活动。在编练新军时，他吸收大量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士官，担任军政学各职。

广西陆军小学堂是座半军半读的学校，曾经培养了许多国家栋梁之才。李宗仁就是其中一位，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他回忆说：“我在陆小的最后两年间，革命的爆发已有山雨欲来之势，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生兵营等都是革命党人所盘踞的机关，同盟会的活动，简直成了公开的秘密。”

广西反清革命的迅速成功，与庄蕴宽等人的预谋布局密不可分。

庄蕴宽的一生说不上戎马倥偬、厮杀疆场，然而书生典兵，犹有豪情。1904 年，庄蕴宽调任广东常备军司令，奉命率领常备军剿匪。庄蕴宽带领新兵打仗，身先士卒，勇猛过人。

突然，一颗子弹把他的帽子打飞，跟随后面的士兵急得大叫：“大人趴下，大人趴下！”庄蕴宽还是冒着子弹往前冲……

战斗结束了，匪徒歼灭了，事后有人问他害怕不害怕，他风趣地说：“子弹是长眼睛的！怎么会打着我呢？”

辛亥革命后，庄蕴宽回江苏代理都督一职，后来又调北洋政府，担任都肃政司和审计院院长，当选为约法会议议员，还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

主政江苏 稳定一方

1912年1月1日上午，庄蕴宽随孙文、黄兴、胡汉民及政府筹建要员从上海火车站出发。站道旁，沪军士兵列队欢送。沿途不断有地方军民迎送，天黑时抵达南京。晚10时许，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江苏是东南要区，华东大省，在国内的影响举足轻重，江苏都督的要职由谁来担任呢？在辛亥革命中的过人表现和突出贡献，使庄蕴宽在江浙士绅名流中深孚众望。当时在上海养病的原江苏都督程德全以及张謇等人都推举庄蕴宽。1912年1月10日，民国临时政府任命庄蕴宽为代理江苏都督。

庄蕴宽代理都督的时间仅有四个月，而他颁布的政令却数十道，包括严禁赌博、通告剪辫、鼓励农业生产、发展民族工业、普及教育和革除社会陋习等等。他是想破旧立新，建立一个与封建王朝完全不同的社会。

为树立新政权形象，庄蕴宽坚持“不扰民、不增兵、不借债”的治政理念。

民国初，社会纷乱，民心不稳，庄蕴宽上任伊始，就严肃处理了“缪思敬案”与“赵乐群案”。

缪思敬原是前清督练公所兵备处提调，当上临时总统府庶务长后，假总统府名义，欺行霸市、强占民宅、非法敛财。庄蕴宽微服调查取证，核实后拘捕人犯，排除说情等干扰，将缪思敬就地正法。

赵乐群原是常州府中学堂兵操教员，常州光复后，在常州军政分府谋得司令职位。其人专横跋扈，因与常州府中学堂教师陈大复有积怨，诬告陈大复在购枪时侵吞公款，不顾时任民政长的屠寄等劝说，妄杀无辜。数月后，赵乐群被诱捕，判处死刑。

庄蕴宽通过明典刑，平冤狱，安定民心，受到好评。

代理江苏都督政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境，部下建议庄蕴宽通过发行军用券来度过难关。庄蕴宽没有同意，他认为，缺乏基金与物资担保的军用券，日后必是一张废纸，他不忍心使百姓遭受苦难。在他的任期内，江苏全省未曾滥发一张所谓军用券。

维护共和 反对复辟

民国初期的政局是不稳定的。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如愿执掌政权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复辟帝制，影响最恶劣的是刺杀了宋教



中国审计博物馆内展陈的庄蕴宽办公场景

仁。宋教仁是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参与刺杀活动的有常州人洪述祖。

会议旨在炮制新法以取代“临时约法”^①，这样可将他的越权行为合法化。作为议员的庄蕴宽，坚持“临时约法”的精神，反对总统独揽大权。这次会议表决结果为43比1，庄蕴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

1915年8月，袁世凯为实现复辟帝制梦想，授意杨度等6人组织了筹安会。不少有识之士上书政府，要求依法惩办

^①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以孙中山为首，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

杨度等，庄蕴宽所领导的肃政厅公署收到大量呈文。他不负所托，齐集公署人员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筹安会问题，决议呈请袁世凯取消筹安会。

一纸呈文使庄蕴宽成为复辟党的眼中钉。庄蕴宽置死生于度外，笑着说：“我每日坐马车上上班，如有狙击者，可由车后开枪，距离我头颅较近，易于射中目标，而且不致伤及无辜车夫。”

1915年12月，一场闹剧在北京上演，1993名所谓的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结果全票通过拥护君主制，并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宣布次年改元“洪宪”。

庄蕴宽坚守都肃政史的职责，以公函形式呈文袁世凯，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假，时代潮流不可拂”的主张，并提出取消洪宪年号、撤销大典筹备处及参政院等。面对庄蕴宽这种公然蔑视帝制的做法，袁世凯极为不满，想以20万银元支票收买他，庄蕴宽却撕毁支票，以明志向。事后，庄蕴宽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联络同志旧识，谋求江苏方面响应反袁斗争。他要为建立以民为本、前途光明的政府而奋斗。

主持故宫 勇护国宝

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时，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幕典礼，主持典礼的主席是庄蕴宽。此日正值双十节，北



故宫博物院网上“全景故宫”

京城万人空巷，人潮涌向故宫。历经 600 年兴衰荣辱的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

在军阀割据时期，难以计数的贪婪之徒，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新生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守护者不得不面对接踵而来的重重挑战。

1926 年 3 月，段祺瑞政府以煽动共产学说为由，下令通缉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易培基等人，两人被迫离京南下避难。这时，500 多名护宫员工纷纷索要欠薪。庄蕴宽拒绝了段祺瑞政府的资助，他通过熊希龄^②介绍，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因中国政府信誉不佳，外国银行拒绝提供贷款。庄蕴宽毅然以个人名义贷款三万元，这才平息了“索薪风潮”。

从此，庄蕴宽作为故宫“维持会”的副会长，成为故宫

^②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祖籍江西丰城石滩。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

博物院的实际负责人。

1926年4月23日，直鲁联军两名军官带着卫兵，分乘两辆汽车冲到神武门，声称在明天将派兵驻扎故宫。庄蕴宽向其上司通报，表示博物院不反对驻军保护故宫，但必须要有手续，强迫驻军，万万不可。庄蕴宽带领故宫的守卫者们，在大门口赫然张贴布告：严禁军队驻扎！

此事刚刚过去不久，10月下旬的一天，入京的奉军张宗昌又令部下夜闯故宫，名谓“借宿”。庄蕴宽安排护宫人员严加把守，坚持不让奉军“借宿”故宫。张宗昌怀恨在心，于12月1日，指使亲信、宪兵司令王琦，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庄蕴宽。友人及时搭救，庄蕴宽才幸免于难。

面对种种压力，庄蕴宽始终没有退却。正是因为有庄蕴宽为首的守护者舍身庇护，故宫在动荡的时局中安然无恙。

1929年，庄蕴宽应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的一再邀请，非常不舍地离开了故宫博物院，南下省城镇江，担任《江苏通志》编纂委员会总纂。

庄蕴宽出生在宁波莫家



庄蕴宽故居“欢喜坚固室”

弄，3岁才回常州，就读于云溪之畔的庄氏塾庄。长大成人，闯遍天下，直到晚年，重回常州。1930年，庄蕴宽在庄家场（邮电路2号）构筑“欢喜坚固室”，这是一座西式洋房，楼后有老屋四间，庄蕴宽在此居住至终老。斯人已去，此楼尚存，“儒文侠武”的形象永远铭刻在家乡人民心中。

（参考书目：顾敏琪．《辛亥革命前后的庄蕴宽》·《常州辛亥英杰》；薛元明著、庄研审订．《国士无双——庄蕴宽传》）

屠寄：新思想的传播者

○ 张浩典

旧时常州，城中有一条弄堂叫临川里，位置就在现在的新世纪商城附近。临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与常州有何关系呢？说起来还真有一段故事。据光绪《武进阳湖合志》记载：宋德祐元年（1275），常州守将王安节在保卫常州的抗元斗争中，英勇顽强，奋力抗敌，最



临川里写生（张俊彦）

后为国捐躯，葬于西门王守沿。王安节的四世孙王伯侑是明代正统年间举人，后来常州为曾祖守墓，住在武进县衙前，因为王安节与王伯侑是江西临川人，这里就被叫做临川里。临川里东至半山亭，西接北大街，全长 100 余米，弄的南面就是著名的白云溪。

临川里除了有王姓，还有从江西来的屠姓，1856 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 5 月 18 日），屠寄出生在临川里。

屠寄父亲屠康璿靠文笔为生，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家中经常断炊。家庭虽然清贫，父亲对屠寄的管教却很严格。屠寄 6 岁那年，有一次在外面玩耍，拾到一只木鱼，便拿回家敲白相。父亲知道后，大怒，斥责说：“别人的遗失之物，怎么能够随便拾取呢？人家靠诵经念佛，获得生活费用，你拾了这个木鱼，岂不是断了人家的生计？”屠寄听了这番教诲，知道自己有错，于是跟随父亲等候在拾到木鱼的地方，



屠寄（1856—1921）

一连等了三天，无人来找，他们只得把木鱼放在原处。屠寄晚年时，常以此事教导儿孙：“我生平不苟去取，以气节自励，盖得自幼年庭训。”

屠寄，原名庾，字敬山，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绪十八年（1892）考取进士，历任工部主事、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京师大学

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县知县等职。工诗词、骈文，长于史地之学，尤长于蒙古史。著作有《蒙兀儿史记》160卷、《黑龙江舆地图》《黑龙江舆图志》《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等。

1902年冬至1903年春，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以举行演说会等形式宣传革命，主要成员蒋维乔、陈范、汪文溥与陈撷芬等，他们都是常州人，后来与屠寄取得了联系，在家乡经常开展活动。

1902年秋，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回常的何海樵，与杨秉铨、谢匿青、谢仁冰等在育志学堂（今新坊桥小学）组织藏书阅报社，公推屠寄为总理，每星期集合志同道合者到阅报社演说。

1903年2月，屠寄等又发起成立常州演说会。常州演说会的宗旨秉承三条：一是养成爱国思想，二是振兴地方教育，三是改变社会风俗。

常州演说会创办之初，真正能够演说的人很少。到了寒假，许多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回到家乡，参加演说，风气因此大开。因听众太多，育志学堂已经容纳不下，只得转移到武阳公学（今局前街小学）。从1903年农历正月初七开始，连续六天，在武阳公学天天演说，很受民众欢迎，听众有时一天超过500人。屠寄也经常亲自到会，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够结合时势，从国家如何“救亡图存”开始讲起，强调“国

家速强、国民速智”，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莫如兴学”。

常州演说会的演说活动，屠寄发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在育志学堂，还是在武阳公学，听众绝大多数是男子，少有妇女参加。为此，演说活动逐步从学堂走向社会、走向家庭，举办广场演说与家庭演说等。

常州有坐瑁筵的风俗，新婚大喜之日的晚上，男方要置办宴席礼请新娘，左右设置数席，邀请女方亲戚作陪。胡泰生的弟弟胡韵生、胡新生有感于常州女学不振，决定利用胡泰生家里举办坐瑁筵的机会，特意邀请常州演说会的程瑶生，在介绍全体会员到场时前来演说。那天，演说会全体会员来到胡家，瑁筵坐定，会员依次进入中厅，首先由杨君宣读祝词，全体会员行拱手礼，表示祝贺。接着由庄君演说，内容为古今婚礼之异同，再由杨君演说，提出常州急需兴办女学。蒋君演说也是提倡兴办女学的内容，提出应该先肃清女子缠足的弊端。程君接着演说：“女子求学当如男子，现今女子不如男子，有损女权，不利社会。”演说结束，主人胡韵生先生表示答谢，会员回谢后退出。事后有论者评论：虽此一举，“倡吾常女学之先声尔！”

就在屠寄组织常州演说会的同时，何海樵、蒋维乔、庄百俞、杨仲达、庄仲希、杨秉铨、瞿纯伯、何志霄等人，又在1903年1月29日发起成立常州体育会，提倡“尚武精神”。体育会提出，如要强国，必须先强身，而要强身，必须先练

习体操。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民间除有武术(拳术)外还没有体育的概念。

体育会吸收了20多位青年人入会,借武阳公立小学堂场地训练,有时列队上街“出操”,“以动社会观感”,一时观者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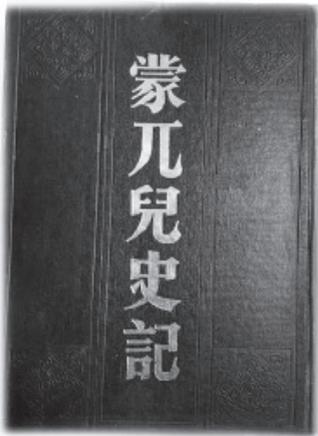
由于常州演说会与体育会的宗旨相近,部分成员也相同,于是两会常常一起举办活动,先由体育会会员教习体操,后

由演说会会员发表演说。内容涉及社会改良、移风易俗、崇尚节俭、破除迷信等。

在常州演说会的大力倡导下,1903年5月10日,常州还成立了妇女“不缠足会”,许志毅、庄百俞在会上先后演说,强调必须注重女界,提倡先不缠足,然后再办女学。

屠寄为谋求女子独立,身体力行,1904年,终于创办了争存女子初等小学堂,1906年还在校内增设了师范班。这个师范班后来发展为武进师范学校(常州师范学校)。

有一天,武阳公学堂董兼总教习(校长)华世芳(字若溪)收到一位地方权绅的来信,信中说:“刚才有人来说,近日学堂太乱了,……我的子弟虽然已经报名,也不愿到这



屠寄以20余年时间编成蒙古史巨著《蒙兀儿史记》,奠定史学大家地位。

里来读书了。今天，又有人对我说，某某几家已到学堂报名，忽然转到其他学校去了。”接着，这位权绅在信中对常州演说会和体育会进行攻击，说他们教习体操是“做痴样”，举行演说是“说痴话”。权绅所说学堂太乱就是剑指演说会和体育会。

权绅的信不仅指责演说会和体育会，还对武阳公学总教习华世芳大加责备，说他“身为堂董，而一任喧宾夺主，不能不责贤者之漫不经心”。这位权绅提出，以后有人来此演说，必须先将底稿呈送审核，符合宗旨，方可允许演讲，否则将底稿扣留。

为什么演说会和体育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原来以屠寄为首的新派传播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倡导新风尚，呼吁男女平等，不可避免地触痛了封建传统势力。他们从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极力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于是向相关学校与官府施加压力，阻扰演说会与体育会的活动。

华世芳把权绅的信转给了演说会会员杨秉铨，杨秉铨将信又给了蒋维乔，大家不予理睬。权绅见此计不成，又散布流言，说演说会会员都是大逆不道之人，并怂恿武进、阳湖两县县令对他们进行惩罚。

面对守旧派的猖狂进攻，常州演说会毫不退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演说会会员复信武阳公学华世芳，对守旧派的言论逐一进行了批驳。

如此一来，弄得武阳公学总教习华世芳左右为难，华世芳便劝说常州演说会与常州体育会迁移到其他地方活动，但常州演说会、常州体育会坚决不同意，仍按原计划，将活动进行到正月十五日，方才结束。

这年正月下旬，寒假回常的学生大都返回学堂继续学业，而在常州从事教育工作的常州演说会会员和常州体育会会员，依然于每星期照常举行演说活动和教习体操活动。

屠寄提倡的反对缠足、兴办女学一事，同样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激烈反对，遇到的压力甚至更大。武进知县吴其昌、阳湖知县翁延年对不缠足会的主张，不敢直面斥责，只得贴出布告，假借女子赌博一事，说女子由于不缠足，使得女子赌博之风日益炽烈，进而牵连到兴办女学，胡说上海女子学堂已经奉令禁止。

面对封建势力一派胡言，评论者针锋相对，进行批驳，痛斥两位知县的欺骗行径：倘若稍识事务，应该知道女子赌博和兴办女学完全不是一码事，不可相提并论，说上海女学停办完全是谎言。实际上，上海女学如城内务本学堂、爱国学校并没有停办，学生报名络绎不绝，而且又开办了沪南文化学堂。评论者以事实为依据，大声疾呼，反对缠足、兴办女学之举万万不能停。

1911年，屠寄从外地回到常州，以他极高的社会威望，担任了武阳教育会会长、武阳农会会长，团结地方革命势力，

积极响应辛亥革命，领导了常州光复的斗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在与上海、苏州联络的同时，积极筹划组织常州军政分府。11月7日，县商会、县教育会、县农会在局前街先贤祠（今局前街小学）开会，屠寄当选民政署民政长。

当日晚上，屠寄与江苏都督委任的常州军政分府司令何健等在常州府中学堂开会，部署第二天各项工作进程。当晚确定：由农团通知各团体、商民悬挂白旗，宣告常州光复，拍发电报通电全国；由农团护送何健司令至府署就职。

到了半夜，地方武装江防营围攻常州府中学堂，意在将革命势力一网打尽，夺取常州地方政权。当时，屠寄想方设法避开，越过学校围墙，登上墙外的城墙，但在跳下城墙时不幸足部受伤，不能行走。刚好有天宁寺收租船停在护城河边，僧人将屠寄送到天宁寺方丈室。方丈冶开清镛雇了小船，将屠寄送到东横林，换乘火车去苏州治疗。

11月9日，常州宣告光复。同日，常州军政分府正式成立，阳湖县并入武进县，县署驻于平易坊内的原武进县衙，屠寄成为第一任民政署民政长（县长）。司法署则驻在原阳湖县衙。不久，屠寄扶伤返常，到任视事，本着革命精神，努力推进民政事业，常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疏浚北塘河，是屠寄对常州人民最后的贡献。身为公推工程总董，他终日“行走雨中，沿河巡视，口讲手挥，略不休息”，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于工程竣工四月后病故。常州人民始终记住屠寄对家乡的历史贡献，高大的铜像矗立在北塘河水利风景区，供人们瞻仰。

孟森：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 段国强 王金兰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

白云溪水流经北水关，与北市河相通，又与北塘河相连。在青山门外的北塘河西岸，有东、西孟家村，因孟姓集居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南宋德祐元年（1275），孟子的五十二世孙孟性（字太初，号养静），因担任教育官员（教职）而定居毗陵，成为常州孟氏始迁祖。

“孟”是贵姓，常州孟氏宗祠的堂号为愿学堂，红漆大门，与众不同。另外，在白云溪北离仁育桥不远的化龙巷，建有亚圣祠，这是常州城内唯一的孟庙，亚圣祠（孟庙）的建立，大概与孟性卜居附近有关。

孟子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民比帝王更重要。孟子传至七十一世，一个男儿在常州北门呱呱降生，他就是后来成为积极推动建立共和制新政体的孟森。

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17岁那年，父亲病逝，持家的重担落在孟森的肩上。好在他已经获得廪生的职衔，公家给一些膳食补贴，又可以当塾师，有微薄的收入。在他的督教下，两个弟弟孟昭常、孟鑫也先后中举。大弟孟昭常后来成为法学家、实业家；二弟孟鑫因病早逝，留下遗腹子孟宪承，后来成为著名的教育学家。

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担任校长的是常州人何嗣坤。第二年，学校就开始招生。胸怀大志的孟森闻讯后，立即与大弟孟昭常前往上海，追寻新学，兄弟俩双双入学。孟森先是以师范生身份兼为外院教员，继而兼任译书事务，后来主持了南洋公学译书院。学校为他配一个日本人做助手，孟森与日本助手互教互学，为以后留学日本打好了语言基础。

孟森在南洋公学译学馆工作期间，翻译了日本人稻村新

六著的多种军事书籍，如《步兵操典》《日本陆兵学校章程汇编提纲》《日本宪兵志》等。孟森为什么要把日本军队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民众呢？他是希望唤醒读者，正视日本维新以后的强大，让中国民众从中有所启示借鉴。

1905年春天，孟森应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的邀请，到广西边关督署担任文案一职。孟森根据郑孝胥在广西任内积存的文牍，编写了一本《广西边事旁记》，记录了中法战争后广西边疆实况和清末社会改革的实践，其中不乏对郑孝胥整治边事的褒扬。这是孟森的第一部史学著作，也是第一部政法论著。

这次广西之行，是他考察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重要实



孟森与郑孝胥（左）、吴怡泉（右）合影

践。赴广西前，他曾赋诗给友人，其中有

“四十年来天地闭，八千里外路途偏”、“怅望千秋一搔首，虎头燕颌事何年”等句，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广西的治边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清王朝体制的弊病，中国欲图强，必先议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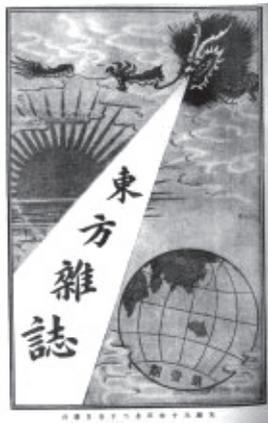
体！

借它山之石以攻玉，1906年3月，孟森与弟弟孟昭常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孟森选择了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一年后毕业回国。

再说说中国国内的形势。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压力，下诏“预备立宪”，为实行“君主立宪”作准备。12月16日，立宪派主要代表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联络江、浙、闽三省的立宪党人和实业界人物，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立宪团体。

立宪派与革命党是有矛盾分歧的，主要分歧在哪里？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运用和平的政治改良手段，推进中国的宪政；希望通过限制君主权力，使国家机关政令纳入宪政轨道。革命派则主张暴力革命，试图运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推翻现行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共和政府，颁布宪法，建立统一国家。

1907年上半年，孟森与孟昭常学成回国，二人立即投入到立宪运动的队伍中。为了搭建推进政体改革的舆论平台，孟森一方面与弟弟创办《预备立宪公会报》，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另一方面，进入商务印书馆，



清末《东方杂志》

接办《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始创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是现代史上刊龄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化期刊。《东方杂志》栏目原来比较简单，内容也不丰富。孟森接手后，调整体例，革新版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最为突出的是，增设“宪政篇”，改版“大事记”。

原来的“大事记”附于卷末杂俎（杂录）一栏，改版后被提升到卷首第一板块。同时用不同字号划分成基本事实与深度信息两个层次，眉目清晰。

例如“大事记”载“初三日，达赖喇嘛抵京”，下附400多字短文，追溯明代以来中央政权管理和约束西藏地方政权的制度，记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觊觎，提出自己对西藏政策的看法。

新辟的宪政篇栏目均由孟森亲自撰文，介绍西方国家的立宪制度，论述中国如何走立宪之路，针对时弊，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东方杂志》与《预备立宪公会报》成为立宪运动的重要喉舌。后来，孟森当选江苏咨议局书记长，辞去了主编一职。他利用余暇，仍然常给《东方杂志》写稿。

1908年7月8日，清政府迫于全国立宪的呼声，决定先从地方自治开始，由资政院向全国颁布咨议局（省议会）及议员选举章程。孟森率先在上海（时属江苏）江苏教育会法政讲习所，举办全国培训班，他为培训班撰写了《法学通论》

《城镇乡地方自治详解》等书籍，成为全国开展立宪政治的指南。

1909年9月1日，江苏咨议局成立，张謇被推选为咨议局局长，孟森为书记长。10月，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有了合法活动的讲坛。1910年，咨议局组织了三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要求清政府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启动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活动有百万民众参与，征集到20多万人的签名。孟森代表江苏，担负起联络协调与组织工作。请愿运动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威。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愚不可及地颁布了“内阁官制”，公布了第一届内阁名单。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



清皇族内阁合影

汉人仅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室成员。这种“组阁”使立宪派大失所望，称之为“皇族内阁”。清廷将民心彻底驱赶向自己的对立面。

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了全民推翻清皇朝的总动员令。

孟森目睹清政府的腐败，迅速放弃君主立宪立场，走上拥护民主共和之路。为此，他去惜荫堂找赵凤昌，商谈革命党人与立宪派联合、清帝退位等问题。二人商量好后，孟森出面牵线搭桥，促成了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手。在清政府组织兵力反扑的关键时刻，上海、江苏、浙江宣布独立。江浙沪立宪派的转向，加速了清皇朝的灭亡。

辛亥革命爆发后，孟森不仅在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政治合作中起着桥梁作用，还为江浙沪联军攻打盘踞南京的张勋拟定通电讨伐檄文。

11月22日，《申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名义，公开发誓师檄文。文中蕴含了孟森的济世情怀：“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

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孟森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院议员。7月，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在议

决政府组织形式时，孟森竭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并由内阁控制国家实际权力，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袁世凯不甘心大权旁落，暗中指使亲信游说、收买议员。最后竟以多数票赞成通过实行总统制的议案。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于同年10月公布，不到一个月，袁世凯就开始向限制其权力的人开刀。他先是强行撤销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陷于瘫痪状态；随后要求国民党议员，宣布脱离国民党后才能离开北京。孟森虽然是进步党议员，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被列入通缉名单。孟森在被通缉的当夜，伪装成商贩，逃离京城，到了上海，躲进弟弟孟昭常民友社的仓库里。

后来，议会恢复活动，孟森再次北上，任宪法研究会会员。1923年，他又亲历了曹锟贿选的丑剧。这年6月，曹锟指使党羽，采取各种手段“逼宫”，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为自己上台扫清道路。曹锟既想登上总统宝座，又要披上合法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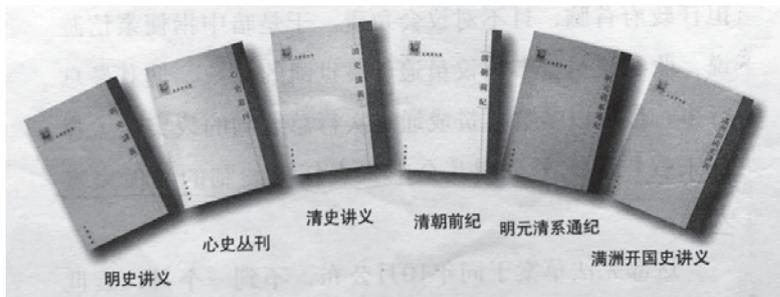
民国第一部宪法在天坛起草

衣，于是就用巨额贿赂国会议员，甚至用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议长，最终当上了总统。

孟森看清了北洋政府的嘴脸，连夜离开北京，逃到上海，在《申报》发表了《民主国之宪法》一文，阐发“主权在民”的思想。直到北伐革命成功，孟森才重新踏上政坛，当选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后应邀到江苏省政府任秘书和民政厅秘书长。

孟森是政论家，也是法学家，更是一个清史学家。1929年起，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担任副教授，开设清史一课。1931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受聘于历史系教授并兼系主任，讲授满洲开国史。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孟森患病住进了医院。面对山河破碎的祖国，日忧夜思，晚间必听电台广播，关心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局，希望听到有关抗战胜利的消息。遗憾的是，孟森没有等到这一天，1938年1月14日，他走完了



孟森的著作宏富



1937年，北京大學慶祝孟心史先生七十大壽紀念合影

人生最后的路程，永远闭上了眼睛。

孟森去世的消息传到云南，迁至昆明的北大史学系师生十分悲痛，专门为先生开了追悼会，以遥祭的方式表示对这位史学大师的哀悼。

（参考书目：孙家红．《辛亥前后的孟森》·《常州辛亥英杰》；宗清元．《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孟森》；《常州名人传记之九》）

陈范与上海《苏报》

○ 王金兰

晚清时期，上海滩出现有名的一刊一报，一刊就是著名的《东方杂志》，一报就是为民主革命鼓与呼的《苏报》。《苏报》报馆的主人是来自常州的陈范。

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出身的陈范，告别常州白云渡上的陈家大院，泛舟江河，千里迢迢来到江西，赴任铅山县知县。

铅山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古有“隔河二宰相，百里三状元，一门九进士”之誉。县内有鹅



鹅湖书院

湖寺，南宋淳熙二年（1175），这里曾举行过著名的辩论会，论坛的主角是朱熹（理学家）和陆九渊（心学开创者）。

陈范来到这样一个儒风蔚然的地方为官，他当然非常乐意，也不敢有半点怠慢。

当时这里有三大弊政：一是被人称作“打油火”的假命案，不法讼师与官府勾结，包揽官司，敲诈勒索；二是以参加基督教、天主教为靠山的“靠十字”，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三是在科试场中内外联手作弊的“打联手”。

初入仕途的陈范，胸怀革新政治、澄清天下的抱负，面对铅山的弊政，决心一一整顿。他在铅山前后近六年，励精图治，为民请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同时，也遭到地方恶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上司也大为不满。上司是谁？是江西巡抚德馨，满洲镶红旗人，有名的大贪官。陈范不畏顶头上司，不“孝敬”德馨巡抚，还从心底瞧不起他。

当时天主教在这里很有势力，教案也时有发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铅山、弋阳两县一千多人焚毁河口天主教堂，酿成河口教案。德馨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将陈范弹劾去职。

陈范离开铅山时，当地士民纷纷远送，他感动至极，于是赋诗一首：

民气凋残生计穷，六年受牧愧无功。

纵多美意少良法，不道與情諒隱衷。

陈范(1860-1913)，原名彝范，字叔柔，或作叔畴，号梦坡，祖籍湖南衡山。父亲陈钟英（字怀庭），举人，曾任浙江富阳县令，当过浙江巡抚杨昌潜的幕僚。母亲赵蕉雨是名人赵烈文的妹妹，出身宦宦之家，善诗文书画。

陈范长兄陈鼎是光绪六年(1880)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予编修官职，后因戊戌政变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幼弟陈韬中举后，在外地为官。

陈范从铅山落职后，返回白云溪，整理母亲的诗文书画遗作，睹物思人，不免悲从中来，而白云溪上依旧日日笙歌，夜夜画舫。他不愿意在家耗费年华，于是把目光投向300里外的上海滩。

上海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已成为全



陈范（中）与家人

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会。大批的移民蜂拥而至，其中包括抛弃科举的知识分子。城市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现代报业的发展，使商业报刊拥有广告源泉、读者群与作者队伍。在上海创刊最早的报纸是外文报纸《字林西报》，后来又有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申报》等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上海谋生的陈范，一日从朋友那里得知《苏报》欲出售。这是一家创刊于1896年的日商报纸，最初的经办人是一名叫胡璋的画家，《苏报》由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报纸所载大多是市井琐事，内容陈腐，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报纸因销售不畅，亏损严重，难以为继。胡璋于是把《苏报》全盘出让，陈范果断地买下。

陈范为何选择办报作为自己的职业呢？在清末，报人介于士子与商人之间，经营得当，既不失体面，又有不菲的收入。罢官后的陈范，生活上清苦，精神上更是寂寥。如果办报，一方面可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也可宣扬自己的政见，达到“以清议救天下”的目的。

陈范接管《苏报》后，就面临着稿源匮乏、销售不畅的困境，随时有倒闭的危险。他把报馆迁到棋盘街中市，又聘请妹夫汪文溥为主笔。汪文溥是举人出身，曾任湖南醴陵县知县。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女儿陈蕨芬也赶来馆中帮忙。

报纸靠什么生存？陈范抓住“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时政动态”作为生存的法器。

陈范办《苏报》，正值戊戌政变后，持续了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舆论普遍低调，甚至一时沉寂。而陈范毅然坚持维新立场，先后发表了《商君传》《铁血宰相俾斯麦传》《泰西教育学沿革小史》《论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等文章，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倡导改革，显现出鲜明的个性和胆略。

1900年1月24日，慈禧准备废黜具有维新思想的光绪皇帝。上海绅商学界1200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也公然反对慈禧的这一做法，发出“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大声疾呼。

1902年11月，发生了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雳”的“墨水瓶事件”。从表面看，是学生的恶作剧，其实不然。上海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初十《苏报》

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引起了陈范和《苏报》的关注。《苏报》率先报道这件事的真相，赞扬学生的正义举动，斥责校方和顽固教习的愚昧、蛮横。后来，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事件，《苏报》也给予了报道，抨击学校当局干涉言论自由。

《苏报》在1903年1月8日刊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中间有一段的大意是：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经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已经看到了窗外柔和美丽的风光，再想把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苏报》敢于报道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因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始拥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力。

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已在1902年4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这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陈范也是成员之一。教育会开会，陈范任评议员。

为帮助罢学学生继续求学，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陈范参加了开社典礼。他们定期在上海张园集会演说，讨论教育问题，发表革命言论。

爱国学社的经费不足，就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一篇评论，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作为报酬。陈范有了稿源，学社又有了经费，两全其美。于是《苏报》成为爱国学社发表言论的园地，张园的演说盛会也经常出现在《苏报》报端。

《苏报》在上海滩立住脚，除有爱国学社稿源的支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范慧眼识珠。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时间是1903年5月。章士钊曾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思想比较开化。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苏报》宣传革命，反对改良。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内容更加充实精练，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报界之林。

6月7日，章士钊在《苏报》上发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矛头直指清朝大吏。《苏报》又连续发表了“新书介绍”，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刊登《序〈革命军〉》《读〈革命军〉》等有影响的文章。从此，苏报每天都有惊世骇俗之论。

6月29日，《苏报》以《驳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



章士钊（1881—1973）

摘要刊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使革命宣传达到了高潮。文章其中大意是：连性命都操纵在慈禧手里的光绪皇帝，想实行改革立宪简直是白日做梦。真要立宪，必须革命，合众共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此文一出，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等报刊立即转载，

广为传播。

《苏报》针砭时弊的激烈言论，早已引起了当道者的忌恨。1903年6月，清廷下旨：“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两江总督魏光焘便派遣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要他联络租界当局共同查办爱国学社和《苏报》。

朝廷本以为惩办《苏报》报馆诸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没想到《苏报》地处租界，官府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与报馆诸人打官司。

俞明震是开明人士，他与“惜荫老人”赵凤昌联手，暗中为陈范等人开脱，相关人员纷纷走避。

章太炎得到消息后，并不理会。6月30日，当警探手持拘票到爱国学社指名挨次查询时，章太炎说：“别人都没有，章炳麟是我。”

第二天，邹容步行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称：“我邹容。”巡捕们很是惊讶，看到面前站着的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未必能识字，岂能作《革



邹容（1885—1905）于1903年发表《革命军》，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命军》，喝令他快走。邹容说：“你不信，把《革命军》的书拿来，我背给你听。”邹容也入狱了。

7月7日中午，《苏报》出了最后一期之后被封闭。这就是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根据大清律例，这类案件一般是按照谋反处理，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和株连九族，而苏报案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

1904年5月，苏报被判永久停刊；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处监禁三年和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钱允生、陈吉甫、龙积之三人释放，陈范次子陈仲彝保释。

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章太炎有幸经受住监狱苦役，3年后出狱。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但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销行更广，国内革命风潮更盛。

《苏报》案发生后，陈范家破人亡：长子陈焜在案发后出走，不知所终；次子陈仲彝释放后，逃到广西河源，死在广东客馆；未过门的“续弦”退去婚约；陈范带着两个女儿，在友人的帮助下逃亡日本。

在日本期间，陈范参加了冯自由、梁慕光等人在横滨组织的革命团体，筹集资金，声援国内的反清斗争；又结识了在横滨领导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孙中山对陈范《苏报》的业绩大为赞赏，称道：敢在清朝虎口之下如此直面论道，以死相争，确属不易。

1905年夏天，陈范从香港回到上海，寓居客店时被两江总督端方的侦骑发现。他们找借口将陈范逮捕，关押一年有余。后经多方营救，才被取保释放。为避朝廷跟踪迫害，陈范从此隐姓埋名，避居湖南醴陵的妹婿汪文溥处，在此以诗文会友，广结爱国志士，以图再起。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地革命党人起兵响应，陈范与汪文溥一起参加了湘桂援鄂联军，走上武装反清斗争的第一线。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范与汪文溥重回上海报界。陈范任《太平洋报》笔政，接连发表《言论足可危民国乎》《恤满略论》《论女子参政权》《议员负旷古未有之重任》等政论文章，宣扬共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靠写诗文和小说糊口。

民国建立后第二年（1913）春，陈范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但他依然关心国事。临终前十日，陈范向汪文溥出示重病期间所作的3篇时论。弥留之际，二女儿陈信芳从日本归来，陈范悲喜交加。5月16日，一代报人陈范在贫病中与世长辞，终年54岁。

（参考书目：《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周宇清·《〈苏报〉馆主陈范》·《常州辛亥英杰》）

报坛女杰陈撷芬

○ 思 与



陈撷芬（1883—1923）

“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维新。”这是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所作《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诗的首两句。

1899年冬，上海滩出现了“一把火”：内容新鲜活泼、文字犀利大胆的半月刊《女报》（后更名为《女学报》），呈现在读者眼前。它不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但从形式上看，它是装订成册的第一份妇女期刊；从内容上看，它是第一份从宣传女权到鼓吹革命的报刊，《女报》开拓了中国女性报刊畅言革命的先河。很难想象，这个玩火人竟然是16岁的女学生陈撷芬。

1883年，陈撷芬出生于常州白云溪畔，自幼聪颖好学，

读书习文，喜欢诗词小品。1891年，她随父亲到江西铅山县，在这里接受传统教育，曾跟从著名诗人、书画家潘飞声学诗。后来，父亲从知县任上落职，返回家乡又饮白云溪水。几年后，全家迁往上海。

在华洋夹杂的大上海，陈撷芬就读于著名教会女校中西女塾，学习了近代科学知识，较早接触到“男女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近代思想，中英两国语言运用自如。

1902年，蔡元培、蒋观云等创办的，以培养革命女性为目的的中国近代早期女学堂——“爱国女校”开学，陈撷芬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在中国教育会影响下，陈撷芬在《女报》馆内开办了“自立女学塾”，亲自授课。1903年，她应聘担任了爱国女校校长。这样的经历，塑就了陈撷芬“性磊落，博学多能，素抱爱国热忱”的品格。父亲陈范育有陈撷芬兄妹四人，他尤其喜欢女儿，曾作诗曰：“两男性顽钝，惟此女表表，期为第一流……”陈撷芬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回溯历史。

《女报》创刊的一年前，戊戌变法运动刚刚失败，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官话女学报》被迫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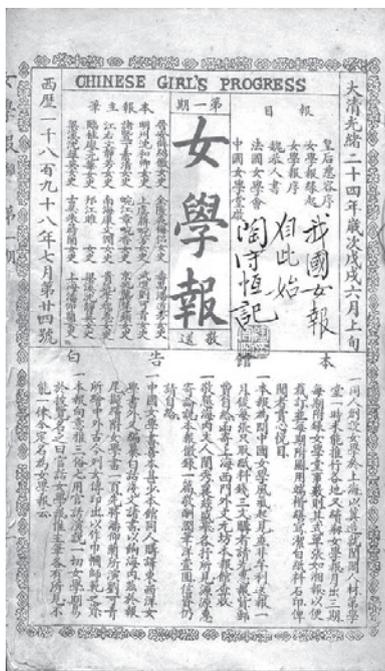


著名教会女校中西女塾

这是由上海女学会创刊于1898年7月的旬刊（后改名《女学报》）。报长63.5厘米，高55.1厘米，可以裁叠成四页装订。主笔有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悠仙及经正女学教习孙蕴华等。内容包括女学、修身、教育、家事、体操、官话、汉文、洋文、史学、地理、算学、格致、裁缝等。《女学报》办报宗旨是“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宣传维新变法，反对缠足，提倡女学，争取女权，希望“起二万沉埋之囚狱，革千年无理之陋风”，挑战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礼教。清皇朝怎么会容得下这一“大逆不道”的报刊？

一年后(1899)问世的《女报》，与《官话女学报》有相似的办报理念，它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陈撷芬父亲陈范，此时是《苏报》馆的馆主。早在《女报》创办前，陈撷芬已有在《苏报》练笔经历与办报的实践。《女报》草创时，她写了许多鼓吹妇女平等、自由、独立的新闻，如《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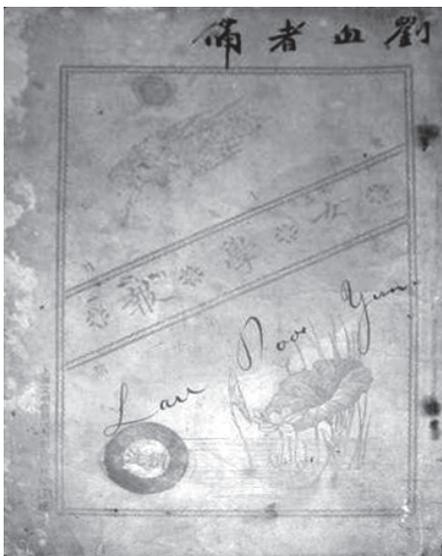
第一份《官话女学报》

人政党》《女子从军》《女子经商》等，鼓励女性成为社会活动中的一员。由于稿源不足等原因，没有多久就停刊了。

1902年5月8日，在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影响下，在父亲的帮助下，《女报》（月刊）得以复刊，并由《苏报》馆代为发行。《女报》每期20页，有论说、白话演说、新闻、最新眉语、中外女界汇志、女界近史、译件、尺素、词翰等栏目。陈撷芬作为主编，自己撰写了许多重要稿件，另有一批专门供稿者，如杜清池、陈班仙、菡初等，她们都是当时女界中的活跃分子。文章中有“女史”、“女士”字样署名的作者就占了一半以上。作者中虽然也有男性，其中不乏社会名流，但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女性手中。

陈撷芬注重报刊形式的推陈出新。在报刊的封面上，除有文字介绍，还有图片映衬，给人一种十分活泼的感觉。在宣传女学上，既有文字描述，也有插图配合，图文并茂，深受读者欢迎。如《上海务本女学校图》《上海爱国女学校教习学生合影》等，形象直观地把女学展现给读者。

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处于政论报纸时期，大多数报纸偏重于政论，而轻时事新闻。陈撷芬别具一格，让时事新闻成为报刊的主角。她以主编兼记者的身份，撰写刊登了很多宣传女权、提倡女学的政治新闻。另外，在翻译（译件）栏目中，主要介绍西方的女子教育理论与实践，如《女子教育论》《斯氏女德新说》《泰西妇女近代史》以及外国女名人的传记、



陈撷芬的《女学报》封面有图片映衬

演说、小说等。

陈撷芬很重视《女报》栏目的变动，目的是面对读者需求。最值得一提的是“演说”栏目，《女报》停刊复出的第一期，陈撷芬特意在这一栏发表《白话演说的缘故》一文加以说明。陈撷芬说：“为什么还要添这一门白话演说呢？因为论说、新闻、

章程都是书上的文理，有那些闺中同伴不愿意看的，还有那些小孩子，不会看的，所以添出这个白话演说，预备这不愿意看论说、新闻、章程的，和那些不会看论说、新闻、章程的，把这白话演说当做听戏，当做听说书，当做听讲闲话。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无事时可以消消闲，瞌睡时可以消消瞌睡，又可以当做课本，教教那些女孩子。”

“白话演说”不只是面向读者，更是面向听众，陈撷芬每期必为此撰稿。

陈撷芬写作的文笔优美，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风格泼辣。1903年2月27日，《女报》更名为《女学报》（月刊），



《女学报》刊登“上海爱国女学校教习学生合影”

除保留原栏目外，增添插画、谐译（“字面有义”音译外来词）等。《女学报》开始经常发表激烈文章，主张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要实现妇女解放，不仅要推翻封建政权，而且还要赶跑西方列强，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联系起来。她深有感触地指出：“大官则受制于朝廷，小吏则受制于大官，百姓则受制于小吏，今且举朝廷大官小吏百姓而悉受制于外人……”

《女学报》所刊文章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甚至广东、南洋都有信函前来致意。

1903年，年轻的陈撷芬应聘担任爱国女校校长，期间撰写了《独立篇》《姑息平等》《等》《元旦问答》《论女子宣讲体育》《女界之可危》《中国女子之前途》《尽力》等



陈撷芬和秋瑾等恢复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

文章。尤其是她的《独立篇》一文，如同横空出世，呼唤女性摆脱封建礼教束缚，呐喊女性抛弃妄自尊大心理，强调思想上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1903年7月，由于《苏报》鼓吹革命，报馆被封，《女学报》也被迫停刊。陈撷芬随父亲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她结识了革命志士秋瑾。

1904年11月，陈撷芬和秋瑾、林宗素等一起，恢复女界爱国团体共爱会，并改组为实行共爱会。她们制定了严格的、系统的行动纲领。会议公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亲任招待。

秋瑾欣赏陈撷芬的办报才能，对《女学报》因故停刊非常惋惜。1905年，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陈撷芬深受孙中山女权思想的影响，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之一。在

秋瑾等人的支持下，《女学报》在日本复刊出版，并委托上海《国民日报》代为发行。陈撷芬依然笔耕不辍，用“楚南女子”的笔名发表论说和传记文学，如：《沈荇死》讴歌中国第一个为新闻事业献身的记者沈荇（当年被慈禧下令廷杖而死）；《章邹囚》彰显革命志士章太炎与邹容为建立共和



因曝光“中俄密约”殉职的沈荇政体而视死如归的精神，愤怒抨击满清政府的黑暗专制。

1904年初，由于多种原因，《女学报》再次停办。

豆蔻年华的陈撷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创办女报？按她自己的话说：“我这《女报》，是为了中国二万万姊妹做的，盼望我二万万姊妹，各人尽力，做事的做事，读书的读书，劝人的劝人，不到几年，我们二万万女人，就另是一个新世界。”

陈撷芬后来就读于横滨基督教共立女学校，毕业后，嫁给了在岩仓铁道学校留学的重庆富商之子杨隽（号希仲），并随夫赴美留学。辛亥革命前夕，他们返回上海。

民国创立后，陈撷芬活跃于上海女界，为女子参政奔走。1912年3月，陈撷芬和汤国梨、吴芝瑛等各界妇女100余人

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为女子从事社会活动和参与政事上书孙中山大总统，得到孙中山的赞赏与支持。“南北议和”告成后，陈撷芬随夫入川，淡出国人视线。

杨隽夫妇后来生活在重庆。陈撷芬与丈夫一起创办了杨氏依仁学校，培育家族亲友子女；又创设贫儿院，收养贫苦儿童，陈撷芬担任校长，并亲授外语课。陈撷芬英年早逝，年仅40岁。

（参考书目：《辛亥革命中的常州人》）

民主斗士何海樵的故事

○ 王金兰

与白云溪相接的外子城河北岸，有东西走向的一条里弄，当地人称之为马山埠。马山埠东起白云渡，西至县直街。很久以前，武进县迎春乡（马迹山）的山民到城里销售山货、柴草时，船只大多在此停泊，于是就有了这个地名。

马山埠 38 号是辛亥革命先驱何海樵先生故居。城市的变迁，抹平了旧时的痕迹，先生亲



何海樵先生手植百年牡丹



江南水师学堂旧址

手种植的牡丹，已于1992年移植在文笔塔东侧的牡丹园中。

5月的江南，暖风拂面，牡丹花已凋谢。站在这株树龄140年的牡丹

前，仍见根粗茎壮，枝繁叶茂，傲立花丛中，蓄芳待来年。唯有牡丹真国色，从中可见先生之品性。

何士准（1877—1934），字文标，号海樵，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海樵性格豪爽，小时候喜欢听塾师讲岳飞精忠报国和文天祥慷慨就义等古代英雄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逐渐成长为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在人生志向的选择上，远远偏离了父亲的期望。父亲希望儿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文谋生，而他偏偏喜欢舞棒弄枪，以武强身图报国。

何海樵有一个弟弟叫何山渔，二人一起如愿考入设在南京的近代海军学校——江南水师学堂，分派在管轮门（科），学习轮机专业。

何海樵学习认真刻苦，在校学习力学、水学、火学、绘

图与轮机知识，当时属于高精尖的学科，同时还学习枪炮操练、鱼雷布阵等军事课程。学校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何氏兄弟在这座熔炉里开阔了眼界，成为探索时代变革的激进学生。

当年，正是“庚子国变”后，中国主权彻底沦丧，百姓受尽屈辱，有识之士迫切地寻求振兴国家的道路。何海樵与丹徒赵声、福州郑权、无锡秦毓鉴和翁友巩等，经常一起聚会，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后来，他们都成为辛亥革命的志士。

何海樵等在学校发起成立了“知耻学社”，畅谈革命，痛陈国耻，图谋反清。并在同学中呼吁：“中国要想图强，首先要知耻！只有知耻，才会觉醒；只有知耻，才会立志。”

1902年，何海樵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怀着反清强国的理想，经同乡蒋维乔引荐到了上海，加入了刚成立的爱国学社，任兵操教员。每逢周末，爱国学社都要组织集会演说，倡议革命，宣传爱国思想。后来，他又把上海兴起的革命浪潮传播到常州。

为了启迪民智，1903年



武阳公立小学堂

初，何海樵借过年之际，与在外求学回常过年的杨秉铨、谢匿青、张伯伦、谢仁冰等在育志学堂组织了藏书阅报社与体育会。大家把自己搜集的书报拿来，奉献给民众，组建报刊资料的公共平台。他们还多次举办倡言新思想的演说沙龙，倾听的民众多达 500 余人。讲到慷慨激昂处，台上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亘古未有的新风，席卷了古老的常州城。听众蜂拥而至，以致育志学堂无法容纳，不得不将演讲场所移到场地比较空旷的武阳公学（今局前街小学）操场上。

同时成立的体育会又起什么作用呢？体育会又称体育传习所，何海樵等人创办的目的是“提倡尚武精神”。参与创办的有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的蒋维乔，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的庄启、杨仲达等。1月29日，体育会（体育传习所）在育志学堂成立，会员 32 人。何海樵等人借武阳公学的一块空地，集中训练学员。因长棉袍的服式、后脑上的辫子对开展训练不便，于是对学员的装束作了统一规定：上身一律为短袄，下身一律着黑裤；后脑辫子盘在前额，用黑布或黑纱扎牢，一副武侠打扮。经过 5 天训练，队员要领基本掌握，步伐整齐，于是列队上街，游行于闹市之中。一时间，闭塞的南北大街热闹非凡，观者如潮。

寒假结束后，何海樵回到上海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

什么是“拒俄运动”呢？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军队先后撤离，只有俄军毁约拒不撤走，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沙

俄的野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03年4月29日，留日学生秦毓鉴、叶澜、钮永建等人，首先在东京集会，聚集500余名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致电上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要求协助。爱国学社师生立即响应。何海樵等师生除了在张园参加拒俄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外，还组建了国内第一支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

6月，清廷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苏报》，爱国学社受到牵连，被迫解散。何海樵远渡重洋赴日本，到士官学校求学。这时，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已被强令解散，改名为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的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张园

成为反清革命的政治团体。何海樵入会后结识了黄兴、杨笃生、陈天华、刘成禺等革命党人，更加坚定了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念。

晚清，暗杀风潮兴盛，始作俑者是晚清政府。清廷对于革命党的暗杀手段多样，逼迫革命党人采取同样手法来推进他们的革命事业。

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原是一些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年仅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他们表示出慷慨赴义的必死决心，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义侠悲壮，更有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

1904年暑期，何海樵、杨笃生、胡晴胜、周来苏、汤重希六位留日学生，在日本的横滨秘密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将目标对准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核心人物。他们认为独裁专制的慈禧太后是中国深陷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应该成为计划的第一目标。暗杀团要筹集资金，何海樵想到了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何海樵来到梁启超寓所，请求梁先生资助一笔组织暗杀慈禧太后的资金。何海樵慷慨激昂地说：“时下（目前）异族恶狮（指清廷）踩在我们头上，洋人横行中国，汉奸为虎作伥，我同胞在重重罗网下做牛做马，受苦受难，凡是热血青年，谁能对此无动于衷？不以暴力的暗杀手段去对付这些敌人，

国家何以存？百姓何以活？”梁启超被何海樵的一番话感动了，当即资助他们一笔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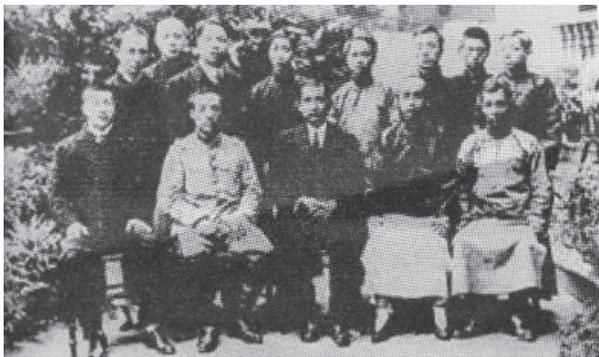
何海樵得到梁启超的资助，不仅解决了经费问题，而且大受激励。他们躲在横滨偏僻的临海山腰，租了一间房子，秘密试制炸药。炸药研制成功后，立即回国实施计划。

回国后，他们先在天津租了一间房屋，采购药料、铁弹、电线、电器等物品。然后一起赴北京，在草头胡同租屋住下。

在北京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的近河道路上，烈日下，风雨中，他们装扮成流动的商贩，暗中侦察慈禧回宫的动静。他们在慈禧往返的道路上事先埋好地雷，引爆的电线通到芦苇丛中。

令人失望的是，连续等了近4个月，都没有慈禧返宫的消息。这年正值慈禧七十岁寿辰，她在颐和园避暑，竟然居住了5个月之久。何海樵等人筹措的经费已经用完，无法继续在此等候，只得暂时离京。

何海樵回到上海，继续扩大暗杀团的队伍。何海樵首先发展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不久又发展章士钊、钟观光、刘师培等，想等待时机，继续行事。1904年11月19日，正当何海樵等准备再次潜入北京行动之际，上海发生了刘师培、万福华等反清革命志士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事件，暗杀团成员相继被捕。何海樵侥幸逃脱，避走日本。暗杀活动成为泡影。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在血的教训面前，何海樵等人开始认识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

推翻清政权的手段，还是要依靠军队发动的武装起义。

1904年11月，何海樵到日本后，与黄兴取得联系，一起参加海外的革命活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的成立，使国内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何海樵出席会议，成为首批同盟会会员。在会上，他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等一批革命者，深受他们的影响。从此放弃暴力暗杀，追随黄兴组织武装起义，成为黄兴的参谋。

辛亥革命前夕，曾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的屠元博，请何海樵速回常州，共谋光复大事。何海樵回到常州后，与屠元博一起组建了常州的革命核心力量——十六人秘密结社。常州光复前夜，屠元博、何海樵、屠寄等凭借强大的政治阵容，在地方民主选举中，独占了新政权所有领导职务，屠寄担任武进民政长，何海樵出任武进警察所所长。

何海樵没有辜负民众的重托。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兵痞、偷盗现象一度猖獗。何海樵毫不手软，迎头痛击，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他在武进民政署工作期间，还办成了一件事情。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举行，何海樵向中国筹备会全力推荐常州梳篦，得到筹备

会的认可。他又亲自将常州梳篦带到美国旧金山参展，并捧回了国际银质奖。由于有了这次参展，常州梳篦名扬海外，在1926年费城国际博览会上，又获得金质奖。

后来，何海樵一度前往广东，在孙中山军政府的兵工厂任职。1924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他受国民党派遣，回到江苏，与陈去病秘密成立了江苏省国民党地下组织，发展国民党党员，指导各县筹建国民党基层组织，为配合国民



常州梳篦获巴拿马和平展览会银质奖、费城国际博览会金质奖

革命军北伐作出了贡献。

北伐成功后，何海樵任丹阳县县长等职，后因在查禁鸦片、整肃恶霸势力等方面得罪了强势人物，被调入国民党党史研究部门。1934年何海樵先生去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了追悼会。

（参考书目：《常州辛亥风云录》）

屠元博倡导革命

○ 张浩典

1909年，以清朝纪年，是宣统元年。此时的清朝，已是摇摇欲坠、风雨飘零之势。地方政权也是日落西山，暮气沉沉。为了挽救时局，当权者不得不实行一些所谓“新政”，如成立民意机构江苏咨议局。咨议局成立后，常州府中学堂监督（校长）屠元博当选为议员。1910年4月，又当选为常驻议员。



屠元博（1879-1918）

屠元博依据省咨议局关于在各县设置农会的决定，与另一位常州籍常驻议员朱稚竹（常州府中学堂总务）一起，决定发起成立武进、阳湖县农会（简称武阳农会）。

武阳农会召开筹备会议时，阳湖县县令伊立勋受常州地

方上“旧派”代表人物的指使，当场表示反对，他质问屠元博、朱稚竹等人：“你们发起成立县农会，有什么根据？”朱稚竹随即回答：“咨议局议决案说明，议员回到本籍，人人都有发起之责，这就是根据。”

屠元博在筹备会议上，以咨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登台发言，痛责官府：“你们身为朝廷命官，不仅不提倡建立农会，我们议员发起建立农会，你们反而蓄意加以破坏，是何居心？”在屠元博和朱稚竹的鼓动下，各乡乡董也纷纷起来责难阳湖县令，县令见势不妙，只得认错，灰溜溜地溜出了会场。

1910年7月，武阳县农会成立，屠元博父亲屠寄当选会长。

农会成立后，计划训练农团，借用常州府中学堂兵操课用枪，教以枪法，建立革命武装。别看这些兵操课用枪，它可是金陵制造局1894年制造的五响后膛，名曰“快利”。

屠元博（1879—1918），名宽。江苏常州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自小在常州县学读书，十分聪明，讨人喜欢。1902年去日本留学，入千叶医科专门学校学习。

屠元博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抗俄铁血会，准备回国作战，保卫祖国，屠元博积极参与其中。在他留存至今的仅有的文字，便是此时创作的两首诗，内容慷慨激昂，表达了满腔的报国之情，《无题》其一：

榆关连日吼寒鞞，易水萧萧番马嘶，
悔少横磨十万剑，一声长啸上边西。

屠元博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底回国后，任天津师范学堂教务长。1907年11月，常州府中学堂创办，回到家乡，担任监督（校长）。



玉梅桥畔，常州府中学堂

辛亥革命期间，常州府中学堂成为常州革命势力的秘密机关。屠元博一面主持校务，一面积极宣传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秋瑾和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师生受其影响，有10多位教师参与了光复常州的革命活动。中学堂的学生思想活跃，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张太雷，当时就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受屠元博等进步师长的熏陶，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为以后走上革

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课后，他们经常到学校附近的红梅阁、文笔塔、舫舟亭说古道今，议论时政，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青年时代的钱穆当时也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他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回忆了他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后，与同学杨权一起密谋革命的情形：他们了解了太湖的地形，知道苏州、无锡、宜兴一带港汊分歧，陆地上又多山岩洞穴，便于躲藏。计划在渔民船中设立家塾，教其子女，晓以民族大义，引导参与革命。从钱穆的回忆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常州府中学堂内革命氛围之浓郁，学生革命热情之高涨。

屠元博推进革命是有步骤计划的，他与革命同志秘密商议，决定革命程序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集合地方革命力量，打倒地方上的官绅专制；第二步，与各地革命党人取得联络，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

在这一革命程序的指导下，屠元博利用兼任县劝学所视学的身



常州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居中倚石者）和教师们合影

份，到各乡考察指导推行新式教育时，暗中物色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灌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成员共16人，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屠元博、朱稚竹为总干事，负责外交设计筹款；刘百能负责训练农民团练；伍博纯、吴樵长、吕叔元、夏善曾负责文牍；段孟陶、何海樵、戴笠耕负责宣传；傅越济、奚九如、卜惠临、周季平、刘培因、章子安负责外交。

“秘密结社”的成立，标志着常州革命力量领导核心的形成，在光复常州的斗争中，16人秘密结社起了骨干作用。当时，常州府中学堂教职员中约有一半人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参与了常州光复活动。16人秘密结社中，常州府中学堂教职员就有5人，近三分之一。除监督屠元博外，还有庶务朱稚竹、国文教员吴樵长、兵操教员刘伯能、文书夏善曾等，常州府中学堂教职员中，童斐、陈士辛、赵不党、何少敏等人也参与了常州光复的斗争。

10月11日，是江苏咨议局常驻议员会期，屠元博、朱稚竹到南京开会，得知武昌于10月10日爆发起义，二人激动不已，第二天随即赶回常州，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发展局势。会议决定屠元博赶往上海，朱稚竹赶赴苏州，与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其余同志组织各乡农团待命。

11月3日，上海宣布独立。11月5日，苏州宣布独立。常州方面，屠元博组织近城的德泽、循理、依东、安东、怀北、

孝仁、丰西、安尚等8乡农团在6日、7日进城，散驻各街市，以维持城内治安，200余人在7日晚上进驻常州府中学堂，住在大会堂楼上。同时，革命势力积极筹建常州军政分府，议决军政分府司令呈请都督委任，民政署民政长、课长由县商会、县教育会、县农会三个法团投票选举。

11月7日，县商会、县教育会与县农会在局前街先贤祠的县教育会开会，选举屠寄为民政署民政长。屠元博在会上还宣布了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日前颁发的委任状：何健任常州军政分府司令。

当天傍晚，常州军政分府司令何健乘火车抵达常州，屠元博等人率农团赴车站迎至府中学堂。晚餐后随即开会，屠元博向何健介绍了常州军政分府人事选举情况，接着部署第二天各项工作的进程：由农团通知各团体、商民一律悬挂白旗，宣告常州光复；安排人员去电报局发报通电全国；由农团护送何健司令至府署就职。

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就等第二天天明。半夜时分，常州府中学堂突然响起“轰”一声的爆炸声，校门外顿时火光冲天。起初，大家以为遭遇失火，急忙赶去扑救。不一会，围墙外面枪声大作，此时才知道府中学堂已被人包围。屠元博与何健司令沉着应对，命令农团团丁下楼散开埋伏，意气自定。围攻者见校内始终不发一枪，怀疑有埋伏，而且社会上早有传闻：革命党人好多枪支弹药藏于校内，因此不敢轻举妄动，

贸然进攻，只是在外面放放枪而已。

此时的屠元博与何健，并不知道外面的底细，放枪者究竟是谁？包围人数究竟有多少？于是采取坚守校内，不对外出击。双方一直对峙到天亮，围攻者自行撤离。后来才知道，围政府中学堂是“旧派”恽祖祁率领的江防营，意在一网打尽革命势力，夺取常州地方政权。

第二天，何健司令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告知常州江防营已经退去，恽祖祁出逃，中学堂安全无恙，但考虑到地方的安全，请求都督派兵前来常州。

11月9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从苏州发兵，由营长朱熙率军前来，驻扎在常州府中学堂。此时，常州全城悬挂白旗，府、县官吏闻风而逃。这天，常州宣告光复，军政分府正式成立，何健就任司令，屠元博担任参谋长。

1912年12月12日，屠元博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众议院议员。1913年4月，辞去常州中学校长职务，北上就任。“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解散众议院，屠元博只好离京，前往天津，开始从事实业。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黯然去世，国会恢复，屠元博再任议员。1918年10月10日，屠元博因病在天津逝世，年仅39岁。

1919年6月22日，为纪念屠元博开创常州近代教育事业和辛亥革命时期光复常州的杰出贡献，常州中学与校友会举行追悼会，并建纪念塔于校内，童伯章校长撰书铭文。纪

念塔为金山石质，高约4米，呈四方四棱柱形，上面镌刻“屠元博先生之纪念塔”九个大字。



屠元博纪念塔